

话说中国

百年记忆

卷二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北洋军阀新格局	(1)
革命成功,孙中山却空前的感到孤独.....	(1)
南方阵营失去了两大主将	(6)
湖南是南北阵营相峙的过渡地带.....	(15)
陆荣廷抢到广东督军一职.....	(19)
段黎府院之争.....	(25)
段祺瑞从心眼里瞧不起黎元洪.....	(25)
张作霖崛起于奉天.....	(33)
冯国璋北上调停黎段政争.....	(37)
督军团的形成,是黎元洪失败的根源	(45)
黎元洪跌的那一跤就越大.....	(51)
辫子军张勋决定孤注一掷.....	(55)
徐树铮的机会来了.....	(61)
北洋军阀新势力划分.....	(66)
南北战、和,曹锟是关键人物.....	(66)
南北统一的机会失去了.....	(70)
七省反皖同盟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	(74)
张作霖将了徐树铮一军.....	(79)

从直奉联合到直奉战争的关键	(86)
张、段、孙及直联盟最怕自己人	(95)
冯玉祥回师北京	(101)
戊戌维新的百日纪事	(107)
维新派的上台	(107)
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113)
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	(126)
政变中的失败者和胜利者	(135)
中华革命党始末	(143)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143)
中华革命党的言论机关	(149)
沪军镇守使郑汝成伏诛	(153)
吴先梅剪除蒋土方	(154)
策反苏州独立的曲折	(157)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陈其美的补遗	(159)
辛亥革命杂记	(162)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167)

北洋军阀新格局

革命成功，孙中山却空前的感到孤独

在当时的反袁势力中，分成两大派系，一派为中山先生领导之中华革命党人的革命力量；一派为唐、陆之三省军力。后一派力量，以唐继尧为中心，他名义上也尊中山先生为精神领袖，但实际上并不奉为领袖，宁可拥护有职无实之黎元洪。中华革命党人，则五军事实力和地盘，只有散潜各地之党人，密谋起义，而又成果不显著。有的人则以骗款为事，并不起事。于此情况下，中山先生在唐系军事迅进过程中，也力图有大作为，欲占据一块根据地。先时倾注于广东，但龙济光镇压党人不遗余力，朱执信等虽占领数十处城镇，未能控制大部地区，成效不大。后则倾全力于上海，曾分电各地，实现此策。但上海又是迟迟不动，陈其美未能将军事计划落实。

袁世凯洪宪称帝后，东南方面所不放心的，就是陈其美，因为陈在上海有实力有基础，又富于组织能力，其号召声势并不下于蔡锷。自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起义后，袁所最担心的，是怕陈其美回到上海响应。如果东南和西南联为一气，

大局就拱手让人了；为了保全东南，势必要除掉陈。袁称帝后，冯国璋早就离心离德，但冯要巩固东南，尤其江苏是自己的势力范围；陈其美是冯的最大威胁力量，冯要降陈，和袁的立场是一致的。

云南起义后，陈其美在上海策动各地起义。袁世凯特驻重兵于上海，不敢他调；同时暗中布置，要暗杀陈以除心腹之患。

南京浦口商埠筹备督办蔡某是袁世凯心腹，袁命蔡物色一个可靠的人筹划暗杀陈其美的工作。蔡和张宗昌是赌友，两人均精于赌博，因此相知甚深。有一天蔡约张打牌，张赴约时只见蔡一人，很是奇怪，于是蔡把他引入内室；郑重问张有没有胆子替老头子（指袁）干一件重要工作。张这时屈居冯国璋部副官长之职，颇不得意，正想往上爬，一听袁有密令，立即答允。于是蔡乃去电北京，第二天袁有密电给冯国璋，命张宗昌克日来京。冯乃令张即日去北京一行。张晋京见到袁，袁即授以杀陈其美任务，且予以大洋5万元。张返南京，冯询以赴京经过，张对冯说：“大总统交我一个任务，是极秘密的，可是我对督师却不能不说，总统要我找人刺杀陈英士。”冯听张所说，即表示支持，因为陈其美在上海对冯亦是一大威胁。

张宗昌于是携巨款赴沪，可是如何实现刺陈计划，亦颇费周章，因为陈在上海的活动也很谨慎，北洋的人是无法接近的。正当他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时，却在一个偶然机会中碰到了曾当过他的排长，但被他斥革的同乡程子安，程见到张极力表示感激，因为程接到家书，知道张回掖县时曾经去

谒见程母，且送了300大洋，所以这次在上海见到同乡老长官，非常亲切。张问程现干何事？程说在陈其美处跑腿，混混日子而已。张进一步询问，程言及在陈左右颇受排挤，极不得意。张闻程言为之心动，乃相约第二天赴长三堂子欢聚。第二天相晤，酒酣耳热，张悄悄对程言及刺陈事，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劝程负责策划一切，程亦欣然慨允，遂积极布置。

在程子安的拉拢下，另一个叛徒李海秋被拉下了水。欺骗陈其美，说是有“鸿丰煤矿公司”要向日商中日实业公司贷款，请陈介绍签订合同，合同成立后，可以出十分之四的款辅助革命。其实根本无此公司，是由程子安假造出来的。陈因经费困难，无及细思，便同意了。1916年5月18日下午2时许，陈抱病从渔阳里寓所乘人力车到萨坡赛路14号总机关办公。这个总部，是日人山田纯三郎租赁的。一楼为客厅、食堂，二楼山田所住，三楼为总部。陈刚一上车，车夫就问是到萨坡赛路吗？陈其美顺口答是，但心中甚疑。及到总部后又对吴忠信说及此事，吴亦认为奇怪，但全无疑及李海秋之事。不久，许国霖等三个中国人和两个日本人一同来到总部客厅。大家刚一人坐，李海秋即告说忘带合同，起身出门去取。就在此时，闯入两个汉子，一个为张宗昌的营长，对准陈其美连续射击，陈中弹倒地而亡，丁景梁等人亦负伤。混乱中凶手逃走。

陈死后，山田却将陈尸抛到门外，不许连累。蒋介石闻讯赶来，雇车载陈尸回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十三号自己寓所。陈身无分文，只留20元于身后。蒋于5月20日为陈亲撰祭

文。自称为陈之义弟。

陈其美之死，使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及东南的势力遭受开重的挫折。事实上，孙中山本人已无力再重新在上海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山东。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党的领袖是居正。山东紧临京津地区，孙中山一改过去南方发动起义的惯例而选择山东，可见其心情之迫切。

居正和吴大洲等在山东潍县、高密、周村一带组织了武装力量，居正称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不久吴大洲改称山东护国军。山东的反袁力量大为膨胀，5月上旬民军进展到济南附近，劝促山东将军靳云鹏宣布独立，如果靳云鹏拒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靳见民军力量极大，不敢拒绝，乃用缓兵之计，他伪称极赞成倒袁，但山东不能和云南、贵州相比，何况地理上又不毗连，没有独立的必要，只有敦促袁下台，如果袁不答复，山东全省军政界人物就以总辞职来对付袁。当前为了地方安靖，民军应各守原防，如果侵犯政府军防地，政府被迫只好兵戎相见。这时山东境内的袁军和民军旗鼓相当，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中。靳云鹏在北洋军系中，和冯国璋、段祺瑞有密切关系，洪宪帝制后，他们都对袁离心离德，当山东民军力量逐渐强大后，遂借此致电劝袁辞职让贤，如果没有满意答复，只好宣布独立。5月29日袁召靳人京讨论退位问题，靳奉命即行，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东军务一职，改派第五师师长张怀芝继任。这一来山东的独立就流产了。在袁世凯死后不久，山东的护国军也解散了。

在1916年这一年的时间里，孙中山是个极度孤独、又极

端热情的人，他的孤独来自于他的内心。他从未为自己的信仰而动摇，但是他有点怀疑，他不知道自己所信仰的这些东西能否在所有的人心中扎根。他领导他的党徒在所有可能的地方举事，而每次换来的都是死不瞑目和人头落地，这是血淋淋的事实。他的神经已经紧绷得过了头。这是他一生中最彷徨的时期，也是漫长的思索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他没有太久的时间和闲逸的心情去马上感悟什么，因为时局的发展已到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但是他确实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一幕幕悲剧和丑剧：他一定要去找那个他找不到但又坚信能找到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他现在还说不清楚。

袁世凯一死，中华革命党的义务也就尽完了。孙中山先生马上想到了改组的问题，在政治上，这也是一着胜棋。因为中华革命党成立于海外，又是秘密行事，因此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相反，国民党的名声却是众人皆知。由袁世凯的死而恢复国民党，在政治上首先就占了先机。

1916年10月25日，孙中山指示以国民党名义在国内重新组党，按中华革命党章程办理入党手续。这是恢复国民党名称的开始。孙中山也有了在国内的一脚站立之地。自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局势之复杂、权力更迭之快，可能历史上也无出其右者。这是一个潜流与主流相撞，混乱与秩序并存，杀手与投机者猖獗的时代。可能任何人也把握不了自己，也可能任何人都能主宰自己：从淑女到妓女、从顶端到地狱、从辫子到西装，都仅是一步之遥。一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从一个世纪跨到另一个世纪，从一种文明脱胎换骨到另一种文

明。

唯独孙中山先生在坚持着他自己。即使直接引起袁世凯死亡的蔡愕，他所想的与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也是两回事。他是梁启超的系统，由君宪派改为共和派，也是主张以北洋军阀系统的人物组建共和国，从清帝至北洋军阀，均用旧官僚建新共和，对于中山先生的真正从反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正牌民主革命派，则是完全排斥的，这仍是中山先生革命派与梁启超保皇派斗争的延续与变化，而人物营垒，则依然如故。这种用旧官僚实行新共和的路子。自然是行不通，不过仍是个假共和而已。黎元洪也是旧官僚系统。唐继尧是个骑墙派，最后也倒向旧官僚系统，而为 1926 年至 1928 年之蒋氏北伐所淘汰。蒋则由革命党转化为新官僚派，一样地排斥民主与共和，而实行个人专制的封建老套。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思想，像个大熔炉，把革命党人蒋介石也熔化了。

就在这些人在历史的前台尽力地表演自己之时，有一个人带着一种学说从地下涌了出来，并形成了一股潮流，这个人叫陈独秀。

南方阵营失去了两大主将

一个人的一生也许会充满了悲剧，尽管他是一个成功的一生。黄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的悲剧来自“10”这个神秘的数字。1874 年 10 月 25 日，他生于湖南榔黎，他之所为天下闻是因为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义，民国 5 年的 10 月 10

日，黄兴在上海突然间胃大出血，从此走上了黄泉之路。

黄兴在美国决定重新投身国内革命后不久，即从美国赶到日本，又从日本赶往上海，他准备这一次倾己之全力，不成功则成仁。然而事与愿违，当他赶到上海的时候，袁世凯已经等不及再来一个人为他掘墓了，在一夜之间竟然先归了天。革命的形势刚刚热起来，却因为袁的死而凝固住了。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军阀都在抢地盘，国民党阵营中，黄兴力不从心，陈其美英年早逝，蒋介石羽翼未丰，天下大势，十之八九不在手中，怎不叫人心急如焚！

作为党的领袖，孙中山此时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本来革命党人在各地虽无大片土地，但也占据了不少实地，为国家考虑，孙中山解散了这些军队，尤其是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使国民党完全脱离了军队。军队既然丧失，在政治上说话的份量自然就轻了。

黄兴一生最荣耀的时光当属武昌起义。但实质上黄兴指挥武昌起义时并没有打胜仗，几场战役都惨败和退守的，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才使革命有了转机。黄兴一生参与的暴动、起义不计其数，但鲜有成功的。本来这次历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但是袁世凯不争气又死得那么早。从根本上来说，黄兴的失败在于没有用党的原则建立一支完整的武装。黄兴所指挥的军队，要么是临时拼凑的，要么是乌合之众，可惜一位将才，以终生的遗憾离开人世。

黄兴在病中之时，蔡锷由四川经上海去日本，两位元勋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就是黄兴的病房。

蔡锷此时也身染重病。两个人的见面是头一次，也是最

后一次，如果这次会面时两个人都生龙活虎，并能联手共事，结局可能就不大一样了。

蔡锷走后，黄兴的病一天比一天加重，10月31日下午，与世长辞。孙中山和唐绍仪通电全国，通告黄丧。

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下半旗一日志哀。

护国讨袁第一大功的蔡锷，则在黄兴逝世后8天病逝日本。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备极辛劳，染患喉疾。已至不能讲话的地步，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人，体温高达39度，夜不能寐。蔡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虽然病魔困扰他，可是他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极伤脑筋的事，非他本人处理不可。因此，他抱病任事，要求北京政府支付护国军的欠款200万元。

7月4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第二天，法国医生检视结果，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的可贵处在于：虽以身为天下先，却功成不居，自始迄终坚定这个主张。袁世凯死后，蔡功业盖世，名满天下，然而他从不汲汲于名位权利。

7月21日蔡率幕僚数人，轻车简从，首途赴成都，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请他做湖南都督的电报，他分别回电辞谢。8月1日蔡锷入成都，抱病就任四川督军，成都人民额手称庆。这时的成都，因为兵连祸结，人心浮动，物价飞涨，币制不稳，蔡接事后，物价立即回跌，钞票价值上涨。川中有五老七贤不远数百里赶来成都，愿任顾问。蔡锷抵达

成都后，他的本意只是象征式接受任命，加以他的喉病和肺病都日益严重，乃于8月5日辞去职务，专赴上海治病。

蔡锷对于“治蜀”并不是没有抱负，只因为他想以功成身退，不争权利为天下倡，所以薄川督而不为。

8月蔡抵达上海，下榻哈同花园，他不愿人们把他当成一个伟大人物来欢迎，因此他设法把自己隐密起来，仅到梁启超的礼庐一行，师生二人把臂欢谈，相对歔歔。

段祺瑞电请梁启超转劝蔡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蔡没有忘记以前袁召他去北京，便成为政治俘虏的往事，因此他推托说：北京繁嚣，不适宜于养病。

9月8日蔡由上海启程赴日本。抵神户时，日本记者群趋访问，蔡以手指喉，不能作答。

蔡的喉疾和肺病，因托延过久，抵达日本后已是病人膏肓，群医束手，药石无效。

11月8日，蔡自知不起，由左右扶起看窗外飞机，黯然而对好友蒋方震说：“我是不行了，我不能死于对外作战的疆场上，真是死不瞑目，我死后有一事想拜托兄。”蒋问是何事？蔡已无气无力，喘息地说：“我死后，千万薄葬，让我九泉无愧！”蔡回到病榻，即请蒋方震代笔遗电：

-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 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 三、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罗、戴两君核实是请恤奖，以昭奖励；
 -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 就是这一天，这位一代伟人，视宝贵如浮云，功成而不

居的护国元勋蔡锷将军与世永诀了。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年仅 35 岁。

蔡锷死后，他的红粉知己小凤仙，作挽联两幅，当时传遍了天下。

第一联是：

不幸周郎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第二联是：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帽子上有鸡毛帚的北洋高级军官一齐包围了段祺瑞。段说：“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

袁世凯生前由于洪宪称帝而和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发生严重的矛盾，特别是袁、段之间的矛盾，几乎达到了快要破裂的程度。可是袁一死，段近水楼台继承了北洋军系的领导地位，他对袁的怨恨也立刻化为乌有。不只没有怨恨，他还极力地对袁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因为段要以北洋军系正统的继承人自居，他就必须要保全封建的传统。

袁世凯之死，只是死了一个北洋派的老祖宗，他的得意门生和化身，却是无数个袁世凯活在世上。

段取代袁而为北洋派领袖后，北洋派便不像袁在世之日那么完整，以后的日子是北洋派逐渐走向分裂的局面，首先是直系和皖系，以后是南北战争，北与北战争。这一幕历史很像东汉末年董卓死后，他的凉州军阀们纷争的局面，它留给人们是无比的恶劣印象。倘若民国初年没有这一幕，而是蓬勃建设，中国怎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

袁断气时，除了接受顾命的四位大臣外，其他在北京的袁系要人虽都闻讯赶至，却未能参加讨论继承人会议。金匾石屋名单揭晓后，四位顾命大臣就讨论继承人问题，一致请徐世昌表示意见。

徐世昌是著名的老狐狸，他说：“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依我的愚见，根据《约法》，应推副总统继任。”他和袁临终前口气一样，没有划分《约法》的新旧，然而这不是他神志不清，而是他高明之处。因为《约法》不论新旧，黎都有资格继承总统，这是法理方面。至于形势上，袁死前一团糟的局面，袁死后如何善其后呢？拥黎来过渡，护国军方面会同意的，也避免使北洋派居于炉火之上，黎有声望却没有实力，又是北洋派的政治俘虏，利用他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是个最好的打算。

徐世昌虽是北洋系的重臣，可是在北京，北洋实权都是抓在段祺瑞手中，徐又怕段有总统自为之意，怕自己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因此徐望了段一眼，补充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究竟怎么办，还是取决于总理吧！”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段，等他开口，然而他却沉默不作声，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见后院的哭泣声。这样挨了一刻钟，才听到段极其简单地说了一句话：“很好，我和相国的意见一致。”这话说完，局面才算定了。

袁停尸在居仁堂前的春藕斋，徐、段等下令分别通知各部总长和袁有特殊关系的人，不多时，到了20多人，曹汝霖提议先向灵前祭奠一下，于是设了香烛祭品，各人向袁的遗体先行三鞠躬礼。在行礼的人群中，段看见了张国淦，马上

抓了他的手说：“乾若，随我来，我们去看副总统去。”张国淦字乾若，湖北人，他是袁系中代表袁和黎联系的人。段拉住张上了自己的汽车，只对司机说了一句话：“东厂胡同。”由春藕斋到黎寓居的东厂胡同途中，段一言不发，脸部表情凝重，使张如坠五里雾中，他未参加刚才的四巨头会议，也不知道袁断气前所说“约法”两字，更不知道金匱石屋的名单，所以他摸不清楚段拖了他去看黎元洪的真意何在？

段的心情很复杂，所以他像哑巴一样不开口。凭心而论，他最瞧不起黎。在清末年，他的官爵比黎高得多了，在北洋系中他也是袁以下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袁死后却要他举北洋系拥护黎为总统，内心实在太想不通，然而形势比人还强，当前形势，又非拥黎不可，所以他表情非常凝重。

段祺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又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

黎已知袁逝世，这时听说段来了，便赶着跑了出来，两人在黎客厅中的一幕，非常戏剧性，客厅内摆着长方形的楠木桌子，黎走人客厅像个木偶似地坐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40分钟，段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6月6日这一天在北京城内是紧张而混乱的。这天午夜，

黎的湖北同乡陆军次长蒋作宾来了一个电话给黎：“外边情形很不好。”黎听到没了主意，不知外边出了什么岔子。老实说北洋军人究竟会怎样变，谁也难预料，这时最重要的问题是继承人问题，黎想来想去非常不安，他把张国淦找来，要他打一个电话问段一下。张拨通了段的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段的副官，他说：“总理没有工夫听电话。”黎站在电话机旁很焦躁，催张说：“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如此说了，副官跑去报告段，等了一会儿，那边回答说：“如果是要紧事，总理说请你当面来谈谈。”黎赶快对张说：“去，去，你快点去告诉他，我不要做总统。”张驱车到了国务院，直奔总理办公室，这时虽已午夜，国务院却灯火辉煌，尤其是总理办公室挤满了人，都是些带鸡毛帚、穿军服的高级武人。段忙得喘不过气来，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包围他的人，把张拉到另外一间小屋子里。张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情形。”段面色坚定而傲慢地说：“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不管有什么天大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张想多知道一点情况，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段捏着拳头在桌子上一击，狠狠地说：“他要管，就让他管。”他是谁呢？张为之茫然。段说完这句话，又匆匆忙忙地回到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张国淦由国务院赶到东厂胡同黎寓，黎正急得像热锅蚂蚁一样，张把段很坚决的支持黎做总统的话讲了出来，却没有讲后半段。黎仍觉得这局面不佳，他对张说：“乾若，这情形不妙，我们姑且在沙发上躺一夜吧！”这时，黎身边只有一个副官唐冰如。

第二天一早，黎又促张到国务院，这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原来那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身穿军服的北洋系高级军官一齐包围了段，他们要举徐世昌或段祺瑞为总统，他们坚决反对北洋系以外的人，尤其是南方人为总统。幸而段的态度很坚定，才把一天风云吹散。

段见到张后，就把已经拟好的通电给张看，张看见电稿上这样写着：“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指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段这个电报当然是安抚北洋系的，然而张国淦对段说：“这何苦来呢！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总统都奉送了，何必让受人情的人不痛快呢。”段想了一会，乃提起笔删去这一段难听的话。

张国淦在袁、段一方面看来，是联黎的一条线索，而在黎看起来，却又是联袁或段的一条线索，他屡有求去之意，双方都苦苦留他。他曾经批评冯国璋“不左不右”，而他周旋于黎与北洋派领袖之间，却有是左右做人难。

6月7日，黎在东厂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

黎元洪虽然做了总统，可是他没有实际力量，既非北洋系，又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在北洋诸帅看来，黎不值得受他们拥戴；在国民党人看来，黎在二次革命后背叛国民党，不是真正革命党人。可是也有他的优良条件；，他与人无争，出名的好好先生，做人方面他占了这个便宜，同时他又是现任副总统，继任总统近水楼台，水到渠成。

黎就职后，又恢复辛亥年被选为鄂军大都督一样，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决定权力，只在公文上签字盖章，成为段与北

洋系一个政治傀儡。

洪宪垮台，袁世凯去世，梁启超和蔡愕这师生二人便成为当时人望。黎元洪做了光杆总统后，极望能拉拢护国方面的力量，倚为支援，于是有人向黎建议，礼聘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如梁北上，以梁当时的人望和西南护国军方面的实力，足以牵制段祺瑞。黎颇以为然，于7月1日致电梁启超，请他入京。

梁启超是聪明人，何尝不知道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根本未加考虑就婉辞复谢了，断了黎元洪之念。

湖南是南北阵营相峙的过渡地带

湖南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处于南北相峙的过渡地带，因此在全国形势变化中，相当引人注目。正是由于这种位置，不同流派不同潮流和不同背景的权力倾轧在这里交汇，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的权力、思想中心之一。早期的黄兴、蔡锷、谭嗣同等，出身湖南；后来中共历史上的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等，也皆出身湖南。

在袁世凯死后，湖南基本上属于南方阵营，但是在湖南驻扎的军队，却是鱼目混珠。湖南独立时，北洋军第六师在湘西，安武军在岳州，汤芑铭率一个混成旅驻扎在长沙附近。同时，广西护国军已有一部分到达衡阳和宝庆，陆荣廷以护国军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身份，于6月初由广州开到湖南，进驻衡州。在湖南内部，好武的湖南人在赵恒惕的指挥下成

立了湘军两个师，湘西一带的民军也开到长沙附近成立了一个师。这是个剑拔弩张的局面，袁军与护国军无法和平相处，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汤芑铭的处境十分艰难，既不能指挥驻扎在湘西、湖北的袁军，又不能指挥湖南的民军和桂、粤的客军。最糟的是湖南人恨透了这个人杀人的汤屠户，因此各路民军围攻长沙，以及国民党人要用手枪和炸弹对付汤的风声传遍了长沙城。7月4日深夜汤芑铭在四面楚歌中离开了长沙。

汤芑铭走后，湘军已成立了三个师，师长是陈复初、赵恒惕、陈忠洵。曾继梧以湘军第一军长暂代湖南都督。随后程潜以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名义由云南到了湖南，他的部队也改为湘军第四师。汤芑铭的离去，并未减轻湖南的火药味，而7月6日北京政府又发表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宦未到任前，派陆荣廷署理督军和省长。这个命令使湖南更加复杂了。

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激烈反对，湖南人赶走了一个北洋军阀，断不容又来一个北洋军阀，因此湖南各界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都督。为什么推刘呢？因为刘入熙以前做过广西藩台，与桂军陆荣廷颇有渊源，想通过刘的关系取得桂军协助以拒北洋军。

陆荣廷支持湖南人民这个行动，因为桂军也不希望北洋军大举进驻湖南。北军入湘问题引起了湖南人民和滇军、桂军的反对，其他党派人士如熊希龄、范源濂等则希望调蔡锷回到湖南，国民党人士则希望以甫由美返国的黄兴担任。可是蔡、黄两人均无意于湘督。黄兴推荐谭延闿以自代。谭在

各方都有很好的人缘，不过和北洋系的关系不够深。

这时，穷途末路的陈宦知道自己不适宜于督湘，因此自动表示辞去湘督，而段祺瑞也了解，如果硬性派北军入湘，必会引起战争，段觉得这个用兵时间尚未成熟。因此他于7月16日改派刘人熙为湖南督军，并下令把第六师由湘西调回江西，第七师由四川调往洛阳，第三师也由四川调回岳州。

段祺瑞本来预定的计划是派第三师师长曹锟继陈宦以后任湖南督军，可是，段自己觉得他在北京的基础尚未稳定，必须靠一个可靠的北洋大将在自己身边，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因此选中了曹锟。曹一直给人印象是“老实人”，所以段调曹为直系督军。同时把7月间开回岳州的第三师分批调回北方。

这并不等于段完全放弃湖南，因为他又安了一个棋子在湖南，他派他的内亲吴光新率领北军第三旅接防岳州。这当然是埋伏吴做为将来湘督的打算。天下事如要人莫知，除非己莫为。段内定吴为湘督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湖南，当然又引起湖南全省激烈的反对，甚至公开宣称为了抗拒北军。不惜一战。

段这才了解湖南的强硬，于是在8月3日下令改派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所谓的“署”是暂代的意思，段这命令中，派谭为省长暂代督军，即表示将来还要派一个督军，所以段这期间给谭的电报都是称谭为省长。

谭延闿是反袁的，他在湖南很得人望。癸丑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承当一切湖南的责任，袁调他和赵恒惕赴京。赵被囚，他亦形同软禁，有这段经过，更使他在湖南受人爱戴。

湖南人对于湘督一职很敏感，这是因为汤芑铭杀戮太甚

所招致，而湖南人甚至西南护国军方面，反对北洋军再入湖南的态度，则尤其坚决，不过北洋军留在岳州已是既成事实，所以当时等于有一个默契，只要北军不越过洞庭湖，似乎双方就能和平共存下去。

谭延闿 8 月 20 日就任湘督。

北京政府任命各省督军命令颁布后，首先发生了冯国璋和张勋互争地盘的纠纷。冯、张两人都是袁时代的“上将军”，不过冯在北洋派中的资望远在张勋之上。张勋的地盘在安徽，他的总部则在徐州，并将陇海线徐州以东的广大地区据为己有，这些地区是属于江苏的，冯国璋对此久已不能忍受。袁世凯末期，袁正想利用冯、张两人的利害矛盾以便从中操纵，冯鉴于袁的态度，所以只得隐忍，袁死后，督军命令又发表，冯认为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因此电请张勋移驻安庆以符定制。那知张勋却告诉冯，他除了安徽督军一职外，还兼长江巡阅使，江苏是在长江流域内，长江巡阅使驻防徐州怎能说不符定制。冯接了这个电报，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竟气得向北京政府辞职。

冯辞职当然是一种姿态，是敦促北京下令张勋让徐州，然而北京政府这时又哪儿有力量贯彻这种行动，只能委婉地劝张自动让防，张勋根本不理。8 月 29 日，冯再电北京政府，历数辫子军在徐海一带横行不法种种，使人民痛苦不堪，冯身为江苏督军，不能坐视不理，加以张对政府命令置之不理，政府应该处理。于是北京政府再度劝告张勋移驻安庆，那知张勋也来一个辞职手段要胁，他电告北京政府宁可辞去安徽督军，也不会让徐州。冯、张的纠纷只好不了了之了。

这是很妙的现象，安徽省督军的驻地，不在安徽而在江苏，省长的驻地也不在省会安庆而在蚌埠，安庆只设有督军和省长的驻省办事处。安徽的民政、财政、教育等庶政当然是在省会安庆，于是省政诸事每天要用函电向蚌埠请示处理。安徽省长倪嗣冲，也是一个骄横不法的军阀，他怎么说也不肯离开蚌埠。北京政府虽然一再敦促他把省长公署迁至安庆，他也来个相应不理。

陆荣廷抢到广东督军一职

广东是革命的发源地，龙济光虽然盘踞广东，可是革命的火种却在四处潜伏。自广西举义后，广东就在不稳中，陈炯明攻入惠州，但被龙军击败，可是陈部却散在粤东，自称护国军，对外宣称拥黄兴为总司令，另有徐勤军、魏邦平军、林虎军、朱执信军、邓铿军、叶夏声军、何海鸣军、李耀汉陆兰卿军等等，风云景从，遍地皆兵。在这种情况下，龙济光只好宣布独立。

龙济光的独立是很勉强的，他是在广西护国军和广东各地民军四面包围下被迫宣布独立的。在宣布独立时，他取得了袁世凯的秘密指示和谅解。所以他虽然独立了，却仍然和袁有密电往来，请袁飞调北洋军由海道开至广东以解救他的危机，袁死后，他又与继承袁的段祺瑞取得了密切联系。

讨袁战斗中，云南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取道广西和广东向江西进兵。李烈钧率领张开儒、方声涛两个梯团，

于5月12日开到肇庆。这时袁世凯还未死，龙济光当然心里极不愿意出兵北伐，又拒绝滇军通过广州，他所持的理由是害怕引起误会，主客两军自相冲突。陆荣廷也害怕在广东境内引起这种冲突，因而主张对龙妥协，和龙商定滇军假道广东的路线，由肇庆经三水到琶江口，转乘火车到韶关，避免经过广州。但是6月7日张开儒梯团到达韶关时，袁已去世，龙借此理由，电令韶关镇守使朱福全闭门不纳，迫使滇军露宿城外，龙军又在城上架炮轰击，因此爆发了北江战争。

6月9日龙便擅自宣告取消独立，因为他内心一直认为自己是北洋系，所以心甘情愿倒向北京政府，他认为北洋军系是全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依赖北洋系作靠山，他就不怕滇军和桂军，他认为必须要把滇军和桂军驱逐出广东，他才能在广东安枕，所以他在取消独立的同时，秘密电请段内阁要求段三路出兵“援粤”，除由海道运输北洋军来粤外，并令江西、福建两省的北洋军由陆路开进广东，帮他夹击滇军，先击败滇军再驱逐桂军。龙济光的愿望是不让滇、桂军假道广东北伐，这和段祺瑞的内心打算相同，段当然不愿见西南护国军扩大力量，所以在龙济光取消独立后，北京政府发表命令对龙的行动大加赞扬，认为他“具有世界之眼光”。6月21日，北京政府又派龙济光兼任广东巡按使。段内阁的三路援粤计划也在加紧部署中。

段祺瑞当然不欢喜护国军继续北行，所以接受了龙的乞援电，并电令江西督军李纯就近调遣北洋军第六师全部开往赣南；福建督军李厚基率军开往闽南；并派萨镇冰率海军以保护外侨为名开往广州，伺机消灭滇军，以保全广东为北洋

势力范围。李纯已有江西，李厚基已有福建，既然有自己的地盘，对于广东就不太感兴趣，所以对段的命令阳奉阴违，只是象征地派兵，其目的是防堵滇军侵入赣、闽。

李烈钧率领的滇军在韶州遭遇龙济光的济军攻击，全军极为愤慨，乃发动猛烈攻击，于5年6月7日攻入韶州。龙派军增援，7月3日又被滇军在源潭予以痛击，济军大败，桂军莫荣新乘机由西路攻入三水，龙被迫放弃一切，集中兵力困守广州。

由于广东形势的变化，段内阁乃于7月6日发表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命令时，借机对广东问题作一大调动，将李烈钧调到北京“另有任用”，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同时又任命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未到广东前，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在这个人事命令中，包含了很多阴谋，第一调李烈钧入京是调虎离山，移开了广东北洋派正面的敌人；第二桂军虽然也和龙济光为敌，可是态度不似李烈钧那么顽强，所以发表陆荣廷为广东督军，就可以软化桂军；第三又派陆荣廷署理湖南督军，是阻止陆到广东接任督军，使龙济光可以继续留在广东督军位子上，以待北洋军的来援。这是一石两鸟的妙计，对滇军是调虎离山，桂军是缓兵之计。

就段来说，对广东问题已是煞费苦心了。

段祺瑞对广东的安排引起广东人士激烈的反对，以唐绍仪、梁启超、王宠惠为首的各党各派代表，纷纷电请北京政府罢免这个广东人民的公敌龙济光。于是段乃借口“粤事真相不明”，加派刚由湖南逃出来的汤芑铭为广东查办使，并派

海军上将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借海军来向敌对方面镇压。

汤芑铭和黎元洪、段祺瑞都有相当关系。由于他是湖北人，和黎元洪是同乡，又同为海军学生出身。袁世凯未死前，汤芑铭和冯国璋都是主张袁退位的，冯这样主张，是为了自己想借南方支持登上总统宝座，汤则是自始至终主张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因为这个原故，黎内心对汤极有好感。段祺瑞对汤也不坏。段知道汤这个人不会投靠国民党，所以也对汤有好感，加以段这时正要借重汤芑铭的哥哥、进步党领袖汤化龙在国会内相助，所以拉拢汤芑铭，也是拉拢汤化龙。

黎本想邀汤芑铭赴北京为海军总长，段却派了他为广东查办使。段这个安排是师袁的，袁世凯在癸丑二次革命时，曾派汤为湖南查办使，率领一部分军舰开到洞庭湖，随后即发表他为湖南都督。广东人士深怕段也来这一手，则赶走了一个杀人魔王，又来了一个杀人魔王，因此也坚决反对汤到广东。

陆荣廷如何呢？他的桂军本是向广东和湖南两方面发展的，他在广东，不像滇军那样和济军尖锐化，他利用滇军和济军力敌，就带领了一部分桂军开进湖南，把湖南控制在他的手里。

拿湖南和广东相比，湖南地当要冲，内部情况复杂，财源不及广东富饶，两者相较，鱼与熊掌不可得而兼，当然舍湖南而取广东，因此，7月10日陆荣廷不理睬北京命令他暂署湖南督军的命令，由衡州连夜班师回桂，集中主力准备开赴广东。

段祺瑞在北京听说陆荣廷由湘班师回桂，正准备入粤的

消息后，大为不安，这与他的安排恰恰相反，他本是一套假戏，而陆则是认了真要假戏真做。于是他在7月29日以国务院名义秘密发电，征求各省北洋军阀对处理广东问题表示意见。这又是师法袁世凯的，利用北洋军阀，引起他们对南方各省有兴趣。

段祺瑞既然以袁世凯的继承人自居，当然最痛恨李烈钧，认为李是北洋系的死敌，他调李入京是勉强装出客气的样子，李不受调，他就想借机翻脸。他的秘书长徐树铮了解他的私心，未经讨论和通过，把催促赣、闽两省出兵“讨伐”李烈钧的通电发出。

这时，在徐州的张勋也发出通电痛斥李烈钧，主张赣、闽两省出兵“援粤”，接着倪嗣冲电请北京政府下令“讨伐”李烈钧。北方各省立即随声附和。

段以为用中央的威信向李烈钧摊牌，他有北洋军阀为后盾，如果李烈钧不听命令，就是反抗政府，背叛国家，他便可以号召全国，鸣鼓而攻。可是时间上不帮助段，这时陆荣廷已迅速带兵到了肇庆，龙济光在滇、桂军双重压力下，乃被迫提出卸职条件：（一）济军2万人（虚报）以上，应编为两师；（二）请拨付军饷和移防经费300万；（三）督办两广矿务，应选择两广扼要地点屯驻济军，在济军驻防区内，其他各军须撤出；（四）督办两广矿务公署应照督军公署的规模，直隶中央，本省长官无权调度。

李烈钧这时留在广东已无价值，且留下变成众矢之的，所以便于8月17日通电解除职务，在粤境内的滇军由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直接统辖。8月22日李烈钧和滇军告别，

到肇庆会晤陆荣廷后，取道香港赴上海。

龙济光讨到饷款后率兵移驻琼州（海南岛）。陆荣廷则迟至10月才在肇庆就职广东督军。

1917年3月27日，广东督军陆荣廷到了北京，这是护国战争后西南派军人亲自到北京来的第一人。陆是由上海取道津浦路北来的，22日在南京会见了冯国璋，24日火车经过蚌埠时会见了倪嗣冲，倪陪同他到徐州会见了张勋。张勋和他早年曾在苏元春营中同事，因此，把他当作亲密的友人，亲自到车站来迎接。张勋十分感慨地说：“咱们弟兄俩多年不见面，当年的老同事只剩下了咱们俩，而咱们俩也都是老头子了。”他情意殷殷地邀请陆荣廷下车到巡间使署盘桓几天。段对陆寄以很大的期望，想把他拉过来作为在西南各省中的得力爪牙，像以前拉拢龙济光一样，黎对陆也很重视。国会议员因为陆有“再造共和”的虚誉，特于4月5日在迎宾馆公宴执行。

陆逢人表示他不贪名、不贪利、不争权位，不要地盘，愿意“解甲归田”。他推荐部下陈炳锜、谭浩明继任广东、广西两省督军；示意北京政府撤换与他不能合作的广东省长朱庆澜。黎、段都懂得他所需要的是更高的权位和更大的地盘，便于4月10日发表命令任陆为两广巡阅使，并根据他的请求以陈炳锜为广东省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省督军。这是继长江巡阅使张勋之后的第二个巡间使。但是张勋不能节制长江各省，陆荣廷却能节制广东、广西两省。从此，巡阅使就成为驾乎督军之上的一个大头衔了。陆在命令发表后，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然回南方去了。

段黎府院之争

段祺瑞从心眼里瞧不起黎元洪

黎元洪的一生，是幸运也不是不幸，他在辛亥起义时糊涂地做了民国元勋，又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莫名其妙地坐上了总统宝座。袁世凯在做民国总统时，感觉到做得很舒服，因此逐渐产生了总统不如皇帝的错误观念，一念之差演成“洪宪称帝”的悲剧。黎元洪则是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

黎、段两人有新仇，也有旧恨，旧恨是当黎以副总统身份兼领湖北都督时，段奉袁的密令以绑票方式来武汉，押他上火车，结束了黎在湖北的局面，从此黎在北京做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新仇是段虽拥黎继任总统，可是在袁死后段去见黎时，一言不发，面孔冷酷有如对待一个陌生的政敌。

至于段呢？压根就瞧不起黎，因为在清朝时，段曾做过统制（等于师长地位）、军统（等于军长地位）和提督，并且署理过湖广总督，可是黎那时才不过是一个协统（等于旅长地位）；到了袁世凯时代，段则是北洋系首屈一指的大将，而

黎虽是副总统，在段眼中，不过因缘时会，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北京后只是个政治俘虏；袁死后，黎的总统是段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段不支持黎，黎根本登不上总统的宝座。他在袁死的当天晚上告诉黎派来探听消息的张国淦说：“我姓段的支持黎，就是一句话，不会让姓黎的落空。”

因为段有这些观念，所以完全不把黎放在眼中，黎则看段有如瓦刺在背。黎、段之间便因此无法谐合。

黎接在总统后，对当时的各项问题由不问而要问，由要问而多问，他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事必须过问，这对段是无法忍受的。段本已苦于国会给他的困扰，使他不能独断独行，再加上黎元洪遇事总是掣他的肘，使他感到非常受不了。他有时向他的亲信抱怨时：“我是要他来盖章签字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的头上。”

黎、段交恶，首先表现在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上。

段祺瑞的亲信中，最获信任的是被称为“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由段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10年回国，被段委任为总参谋，成为段的心腹，参与机密。1914年任陆军部次长。徐树铮由于深得段的宠信，大有少年得志之慨，加之文采风流，恃才做物，十分自负。袁世凯对他也时觉头疼。

段在此次出任内阁总理后，即托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向黎元洪提出任徐树铮为院秘书长。张国淦以为决无问题，不料刚向黎提出，黎就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不但不能共事，且怕见他，我见了他，就如芒刺在背。”原来黎元洪对冯国璋于5月1日发出解决时局办法后，徐树铮到黎宅催促他与徐世昌、段祺瑞一同署名复电赞成时那种

盛气凌人、声色俱厉的豪横作风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张国淦问明原委后，劝黎说：“彼虽倔强，究属军人爽直一派，总统何不包涵。”黎仍不同意，说：“我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张国淦无法，只好去找徐世昌说项。徐世昌劝黎说：“总理用人，总统并非不可驳回，惟秘书长不当驳回。”经过徐世昌的劝说，黎最后勉强答应，同意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但提出徐每日到府见他时，要由张国淦陪同，黎元洪不单独见徐。

徐树铮上任后，立刻显现出那种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他自恃有段祺瑞为后台，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中。秘书长负责府院之间的沟通，本应将国务院议决的重大事件形成公文与命令呈报总统，说明理由，得总统同意，方能请总统用印发布，但徐树铮根本不向黎元洪说明理由，即催黎元洪盖印。黎如询问，徐则肆意顶撞。

1916年9月间发生的内务部与平政院之间的争执，将府院之争的各方各面均牵涉在内，黎元洪与段祺瑞也各自走向前台，进行了一番较量。9月8日，孙洪伊整顿内务部，裁减了一批高级部员。这批人对孙洪伊自然不满。徐树铮此时已同孙洪伊势同水火，必欲去孙而后快，见有机可乘，遂鼓动这批人上诉平政院，称孙洪伊违法裁员。平政院受理后裁定撤销内务部原令，仍准被裁人员回部供职。孙洪伊拒绝这个裁定，黎元洪也支持孙洪伊的意见。徐树铮有鉴于此，便赶紧与段祺瑞商议，拟定了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决的命令，送府盖印。孙洪伊严词拒绝副署，并正式呈请黎元洪将此案提交国会。黎元洪也不予盖印，并批示孙洪伊的呈文“准咨国

会解决”。此后，府、院之间就此问题送来退去多次，由于各执己见，均无结果。段祺瑞非常恼火，坚持要黎元洪盖印，否则就是不信任内阁或者干脆是破坏责任内阁制。这样，内务部与国务院的争执就变成黎、段之间的冲突。

由于黎、孙不肯让步，老羞成怒的段祺瑞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于10月18日呈请将孙洪伊免职。这一天徐树铮拿着写有“孙洪伊着即免职”字样，由段祺瑞已副署好的命令，要黎元洪盖印。黎见后既惊骇又愤怒，向徐树铮嚷道：“你们说的算话，我说的便不是话么！”此后，徐树铮又几次入府催促，甚至威胁说，如果孙洪伊不肯去职，就不许孙进国务院大门，但黎元洪仍不为所动，形成僵持局面。

段祺瑞已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将孙洪伊清出国务院，借机给黎元洪一个教训。10月24日，段一反常轨，亲自来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仍然拒绝。这时段已按捺不住怒火，气势汹汹地说：“总统不肯免孙伯兰（孙洪伊字伯兰）的职，就请免我的职吧！”说完回院，即令人起草辞呈。段祺瑞以辞职要挟，击中了黎元洪的痛处，他知道如果段真的辞职，那他的总统恐怕也当到了头。于是态度开始软化，提出可让孙洪伊自动辞职，以免孙面子上过不去。但孙洪伊偏偏认定免职听诸总统，辞职绝对不肯，除非是内阁总辞职。黎元洪又请王士珍作说客，提出可不免孙职，而以专使的名义送孙出洋考察，部务由次长代理，以使双方都有台阶可下，但是孙却认为无必要出洋。段祺瑞方面也传出风声，说如果孙肯辞去内务总长一职，保全了段的面子的话，可以让孙任全国水利总裁或外放省长，孙洪伊也不为所动。他说：“政治家要硬

干，无论若何牺牲，决不辞职。”“什么官我都不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

孙洪伊坚决不肯辞职，段祺瑞又非要将孙赶出内阁，认为非此不足以维持总理威信。完全顺从段的要求，黎元洪的总统威信又必然受损。黎此时真可谓焦头烂额。黎手下的策士们见段、徐如此专横，就主张索性把事情干到底，推倒段内阁，用北洋派的另一元老徐世昌取而代之。遂派王士珍赴河南辉县，邀请在水竹村的徐世昌赴京组阁。

黎元洪及其策士认为，段氏的政治资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威望则高于段，却不知在北洋派里，军权才是威望。徐世昌不是不想出山，但他知道仅凭“元老”个头衔是坐不稳总理交椅的。所以黎元洪一顾茅庐，徐借故推托，要观一观风向。他致电南京的冯国璋，商讨调解时局的方法。冯不置可否，但冯已向黎元洪作过表示：“非孙去位，不足平政潮。”段祺瑞虽然宣称愿把内阁让出，可徐世昌知道这不是段祺瑞的真话，段的谋士、研究系议员已代段表示了意见。只有辫子帅张勋表示愿意拥戴徐世昌，不过张勋醉翁之意决不在酒而在他的大清主子。而且徐世昌知道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看不出大势的顺道，他不愿冒天之大不韪，跟张勋搅在一起。经过一番思虑，当11月初黎元洪代表二顾茅庐时，徐世昌提“不入政界”、“拥护元首”、“维持合肥”三项条件，要黎答应后才动身。

11月16日，徐世昌抵京，次日黎元洪即到徐世昌在东四五条胡同的私宅拜访，请徐出面组阁，但徐不允，并一再转移话头，说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黎回到总统府

后，非常沮丧。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峰向黎建议，采取生米先做成熟饭的方法，先发表徐世昌为总理，段祺瑞气量狭小，一定会负气离职，这样徐就可以从容上台。他们认定徐世昌已有意，只是犹抱琵琶罢了。也有人主张利用已渐趋明显的直皖矛盾，将冯国璋召到北京，将代表西南势力的陆荣廷也召到北京，再宣布免段令。但黎均不赞成，因为这时徐世昌已托王士珍告诉黎元洪：段总理万不可去，孙伯兰当然要走，丁世峰与徐树铮同时更凋。但是黎元洪府中的策士们却不以为然，他们觉得黎太不果断，就决定采取措施，将黎也逼上梁山。于是他们不经黎的同意，给冯国璋发去电报，称徐世昌已应允出山，要冯回电祝贺，从而造成一种既成事实的气氛。然而狡猾的冯国璋早已洞悉徐不肯取段自代，不仅不上圈套，反而回电主张维持段内阁，这样实际上是将黎的逐段计划送入了死胡同。

19日，徐世昌正式向府、院提出调解方法，将孙洪伊、徐树铮同时去职，而以与府、院均有关系的张国淦任国务院秘书长，以融洽府院关系。段祺瑞表示同意，黎元洪既然不能推倒段内阁，则舍此之外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20日，黎元洪终于在免孙洪伊内务总长之职的命令上盖印，22日，徐树铮也在段的授意下辞职。

在军事上，府院之争也有一番不同寻常的较量。

黎任总统后，军事幕僚有哈汉章、金永多、蒋作宾等。军事幕僚们经常建议黎必须掌握兵权，他们的理由是：“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军事，大元帅没有军权，总统有什么做的价

值？’这些话黎很听得进去，他把自己的总统地位和袁世凯做总统时候一比，觉得袁当时何等威风，自己今日何等可怜，自己虽不想大权独揽，可是要制止军人的跋扈擅专，则应该把军权抓在自己上。黎这个意图和段完全对立。段认为袁世凯当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全国陆军统率办事处”以集中军权，段的解释是：他以内阁总理身份而掌握全国政权，又以陆军总长身份而掌握全国军权。段今日的地位是建筑在军事独裁上，他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就因为他有军权，如果让总统管军权，他岂不是手无寸铁，总统一纸命令就可以撤换了他吗。所以这一点他是誓死必争的。

民国元年宋教仁所致力且因此而丧生的理想——责任内阁制，到了袁死后，竟在段祺瑞组阁时实现。因此，这一期间的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力，恰恰和袁时代相反，黎虽能忍让，可是也有限度。段的强项，在袁世凯末期已表现出来，他对袁都敢使气，何况他平时就瞧不起黎元洪，如今两人共事，他更不把黎放在眼中了。

北洋时代军阀割据局面，是逐渐形成的，其实凭心而论，袁不愿见军阀割据，尾大不掉。无奈军人霸占地盘后，袁的利益和他们的一致时，他们就奉行命令，不一致时，他们就可以不理睬。因此割据的形势是自然形成的。

在袁世凯时代，他曾授意黎元洪发出主张各省军民分治，和废督裁兵的通电，袁希望借此试探能否在各省行得通，只要各省不坚决反对，袁意思是先将都督和民政长两个职务分开，然后着手裁兵，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各省军队一律直属中央，把各省军阀割据的局面转变成中央（袁一个人）集权

的局面。当然这个计划是得不到各省军阀的支持，不过这是一股正流，全国明达之士都支持废督裁兵的计划。这个计划虽孕死腹中，然而黎却因此而获得虚名。

黎自己当总统后，自然而然更想贯彻这个主张，所以他极力推行这个计划，他虽然是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可是他并不甘以没有实权而自居，他认为当年他提出这个主张时，全国都有共鸣，袁死后天下大变，在此时旧调重弹，或者可以行得通的。在裁兵这一点上，段祺瑞是完全站在黎这一边的，这当然由于利害上的一致，而非见解上的雷同。所以北京政府在军务院撤销后，立即发出“收束军队”的号召，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派出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从战事发生后扩充的新编军队，北京要求所有军队都应接受北京政府的直接管理。

同时规定中央军是正规军；中央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地方军，同时在素质上也优于地方军。这时，北洋军多已有了正式番号，西南各省的军队则被列入暂编性质。北洋军既然是正规的中央军，自然可以随时调赴各省驻防，可是地方军就不能任意活动。根据这个原则，段祺瑞在袁死后，还想继续让北洋军留驻西南境内的已成之局，这便造成了更混乱的情势。

段祺瑞要求西南各省裁军也未达到目的，因为这时只是表面上的和平和统一，事实上西南各省对北京仍采取一种貌合神离的态度，继续把持税款、扩充军队。

不只是各省不肯听命中央，甚至平素以笔杆为武器的进步党也想在西南地区建立私有武力，这可以从梁启超给他信

徒的信中看出这种野心：“吾侪自命为稳健派者，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不为人所利用。”进步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组织，只是通过梁启超和蔡锷的关系，在四川和贵州有点力量，后来由于岑春煊和陆荣廷的关系而在两广有点力量。梁启超很想把四川、贵州和云南变成进步党的根据地，建立武力基础，把进步党变成一个有实力、有根据地的党派，以便在中央争取更大的权力。

张作霖崛起于奉天

袁称帝时，湖北和奉天都闹出将帅不和的纠纷，现在追叙一下。原来湖北将军是袁的干殿下段芝贵，可是会办军务的王占元不把小段放在眼中，要想迫小段离鄂；奉天将军是张锡奎，袁世凯的把兄，曾招安张作霖和冯德麟，袁把老把兄从直隶都督调为奉天都督，是因为张锡奎对张作霖、冯德麟二人有恩，派别人督奉，怕这两位师长反对，派张锡奎督奉，一方面张在关外时久，有威名，又与张、冯二将有旧，应该是人地相宜。怎知时移势易，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当张、冯两人发觉这位老长官之来奉天，是因为靠他们二人作为政治资本，他们对待老长官的态度都颇为冷淡。

张锡奎和段芝贵都受到部下悍将的白眼相加，他们都向袁哭诉，尤其是小段（当时人称段芝贵为小段，以别于段祺瑞），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面泣，段芝贵的父亲段有恒，在

当年张作霖受抚时，是张的保人，所以袁认为让张、段二人对调，或许可以缓和一下，民国4年8月18日，袁发表命令，鄂、奉两督对调。

段芝贵来奉接事时，先赴张作霖司令部下榻，以示和张的交谊深厚。这时小段是袁的红人，是北洋军由拥护洪宪帝制的第一号人物，又是段祺瑞的本家和同乡，加上小段的父亲又于张作霖有恩，因此张作霖遂不便拒绝小段上任，心里虽十二万分不愿意，姑且把一股子怨气按捺下去。

另外，张竟一口承允，拍胸愿为前锋。袁觉得张究竟是绿林出身有侠义之气。

张答应出兵后，要解决出兵的技术问题，袁特别关照陆军统率办事处，对张的需要优先解决，补充饷械，尽量方便，怎知饷械到手后，他却突然变了脸，他翻脸后可更厉害，因为他手上有段上将军亏空数百万元的证据，这都是奉天的血汗脂膏，他要代人民清算这笔帐。5年4月20日，小段潜赴北京哭诉，袁劝他委曲一点先回任所，再作计较。这时袁获得密报，张作霖正命袁金铠起草什么奉天保安会的章程，袁想到辛亥革命时，奉天也产生了一个保安会来和清廷脱离关系，组织保安会便是变相的独立，袁这时候对南方的爆炸局势已经很伤脑筋，自然怕北方也出乱子，而腹背受敌，他知道已无时间拖延了，4月22日他发表命令，任命甘七师师长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任命甘八师师长冯德麟为军务帮办。

在冯德麟而言，他绝对不承认这个事实，他认为和张作霖的地位是平等的，五分高低。他又是个火辣辣的脾气，所

以在袁发表奉天军事首长任命，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而冯德麟为低了一级的军务帮办后，冯便大为不满。

张作霖把握住时机，赶走了段芝贵，争到了盛京将军，就是奉天督军了，怎知从他奉到将军新命那一天起，他就苦恼万分，原来和他同时发表新命的军务帮办、第廿八师师长冯德麟，认为自己和张一样身价，驱逐小段时，冯也曾在防区广宁呼应，如今只得一个空洞的军务帮办，大为不满，因此赌气不肯就职，张就将军职时，冯也不肯去道贺。

张作霖从一个赌徒起家，混到这一步，已是很不易了。

张作霖，字雨亭，辽宁海城人，绿林出身。其父开小商铺，是个赌徒。张作霖 14 岁时，其父因赌与人结仇被打死。张作霖 16 岁出入赌场，不务正业。甲午战争时当过清兵，后“携械潜逃”回家仍在赌局混迹。一次因赌输无钱还债，偷猎又被人抓住羞辱，无以自容于乡里，遂加入董大虎匪伙。后在地方组织“保险队”，为富商保嫖，主要伙伴有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

张作霖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土匪，并且善于投机钻营。1902 年 9 月，他自愿接受清廷的收编，立誓效忠清廷。1903 年 8 月，张作霖任游击马队营管带，张景惠任帮带，汤玉麟、张作相任哨官。又因剿灭土匪有功升任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在政治上显露头角还是从屠杀革命党人开始的。1912 年 1 月，张作霖亲自策划杀害了奉天著名革命党人张榕。此后接连几天张作霖都派兵在省城搜捕和杀害革命青年；掀起了一场“杀秃子”的恐怖活动。由于张作霖效忠清廷有功，清皇朝任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并将其所部改为

二十四镇（师）。张作霖感激涕零，更加积极地反对共和，甚至提出“武装勤工”。

袁世凯篡权后，张作霖立即致电袁世凯，明确表示：“大总统已为公选全权，为天下之人贺。”张作霖以武力支持袁世凯定都北京，取悦于袁。于是1912年9月，袁将张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任张作霖为中将师长。

和冯德麟相比，张作霖是个有心机的人。在对外关系上，他一直和北京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还善于从日本人那儿得到帮助，他的胃口还不仅仅是一个奉天和东三省，甚至都曾想到了北京，因此，张需要真的和冯合作，冯则是和张假合作。不久，冯就在他的防区内把张所委派的各县警察局长，一概拘禁起来，要他们供出曾花了多少红包买缺，他宣称要向张算帐。这是过去张作霖采取这种手段对付段芝贵而迫段下台的手段，冯现在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接着，他又发出通电，率领全军将士辞职，电云：“张督为人极英明，能实心整顿军事。麟所部将士均属下，宜即退避贤路。”武人通电辞职，向例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法，冯这次率领全军辞职，则是武人辞职中的一个创格。张实在受不了，乃郑重问冯究竟目的何在？冯开出条件是要兼任省长，张到了最后关头，自然不肯让步，他坚决地拒绝了冯。

段祺瑞当了有权有责的国务总理后，他看到关外两虎相争不下，乃电邀冯人京面商要政，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冯当然不会中计，来一个相应不理。奉天公法团吁请双方和衷共济，以大局为重，万勿走向极端，张将军答应不诉诸武力，可是奉天全省空气紧张，刁斗森严，夜无行人，局势异常严

重。民国6年2月28日，段内阁请出了最崇高的调人，就是以前招安张、冯两军的奉天最高军政首长赵洋巽，这位赵次帅搭乘三等火车到了奉天。此公于民国2年就任清史馆总裁时，由济南到天津，由天津到北京都是坐的三等火车，在北京城内只坐人力车不坐汽车。

赵抵奉天后，张作霖立即专程趋访，第二天（6月1日）赵去探访冯。由于他的声望，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都派参谋长来谒赵，赵乃召集调解会议，可是终无所成。3月6日冯又回到广宁根据地，调解事也告终止。

奉天张、冯之争是袁死前后关外一件大事。

冯国璋北上调停黎段政争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7年春已进入最后阶段。其间，日本借西方列强大战之际，加强侵略中国，未参战的美国力图与日本在侵华中展开竞争，英、法、俄等协约国曾诱使中国参战，因日本反对而作罢。现在美国企图抢先一步拉中国步其后尘，对德绝交，以便使中国摆脱日本的控制。2月4日，美国照会中国政府，拉拢黎元洪，“希望与美国采取一致立场”，表示愿意借款给中国作参战经费。段祺瑞也力主对德宣战，他想利用对德宣战之机，勾结日本，借款练军，扩充实力。段向日本政府表示均以“诚意”相接，日本政府对段深表满意。

黎元洪对美国有好感，希望在外交上得到美国的支持，

以与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黎、段是反映美、日帝国主义不同利益的代理人。美国转而指使黎元洪抵制中国参战。段祺瑞率领阁员谒黎元洪，说明对德外交方针，由绝交而宣战，再行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认为绝交、宣战，尚非其时。于是，段与黎展开了一场舌战。

段祺瑞为了对德国绝交问题密电各省军政大员征求意见，黎也密电全国名流广征意见。结果所得的答复都是反对对德绝交。

名流如：孙中山先生、唐绍仪、章炳麟、谭人凤、康有为、马君武等。

北洋军系如：冯国璋露骨地反对，其他反对的有张勋、倪嗣冲、王占元等，他们主张坚决中立。

即使在此情况下，段祺瑞也一意孤行。在他的操纵下，内阁会议和国会均通过了此案。至此，段、黎之争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为了调解二人的纷争，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身份北上北京

冯北上途中，在津浦路上分别会见了倪嗣冲、张勋和张怀芝。倪嗣冲陪同冯过徐州访问，辫帅张勋亲至车站欢迎，随即在长江巡阅使署举行一次会谈。冯在徐州表示他的政见是中国应在对德问题上严守中立，这主张是和张勋、倪嗣冲主张完全相同。冯的火车过山东济南时，张怀芝上车迎候，并陪同到德州，然后才折返济南。22日冯到了天津，朱家宝也上车陪送到黄村，当晚抵达北京。

北京政府给这位新当选的副总统以盛大的欢迎，黎元洪请冯下榻总统府，冯为了避免与黎过分接近而引起段的误会，

所以执意下榻禁卫军司令部，当晚黎就亲赴禁卫军司令部答拜。

冯之入京，黎、段双方都认为自己方面多了一个帮手：黎认为冯在对德问题上两人意见一致，冯是副总统，正、副总统的立场该是一致的；段则认为冯是北洋袍泽，究竟还是一家人，不应该反对自家人去支持老黎这个外人。冯入京后态度确有转变，由极端反对而逐渐转变为赞成对德绝交，可是他于廿五日在五条胡同在徐世昌私邸和北洋巨头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会议会谈后，发现黎、段两个外交意见处于两个极端，于是他就不再表示他的意见，只说他是为了疏通府、院意见与研究德问题而来的。

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这时拼命在中国活动，希望中国不要和德绝交，他知道冯反对和德绝交，所以非常想拉拢冯，特在公使馆内备在盛宴款待冯，冯避嫌不肯赴宴。

朝中议论不定，且以私愤介入国家政策上，这是民国初年最不幸的现象。

2月28日，段命陆徵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关于权利方面，段内阁所提出者：（一）逐步提高关税，中国方面改订货价表后，关税由原有的值百抽五增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后，再产为值百抽12.5；（二）缓付庚子赔款，除德国赔款永远撤销外。协约国赔款缓付十年，在此时间内不加利息；（三）废止《辛丑条约》关于军事的部分，即废止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中国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国在使馆区域及京奉路马家堡至山海关之段驻兵等条款。关于义务

方面，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中国不派兵到欧洲，而只担任以原料及劳工供给协约国。

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对中国方面所提的条件进行了会谈，公推法、比两国公使为代表，向陆徵祥回答说，各国对以上各条原则上赞成，具体办法应当另行研究，并且催促中国政府先行采取对德宣战的步骤。

同时，日本政府派非正式代表到中国，首先与中国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启超等进行会谈，竭力鼓动中国对德绝交宣战，并且代达本野外相的意见，中国政府应毅然宣布对德绝交，事前不必向协约国提出讨价还价的条件。日本政府派遣非正式代表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其中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寺内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则是到中国来秘密协商“经济援助”的。同时，英、俄、法各国公使也纷纷访问梁启超，进行同样活动。

3月4日段偕同全体阁员（只有外长伍廷芳没有参加，因伍廷芳已提出辞呈了）到总统府，请黎在政府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同时请黎把给驻日公使电报发出去。黎却很认真地说：“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可草率将事，因此要多加考虑。”接着黎并强调：“各省军人都反对对德宣战，对德绝交就是宣战的先声，应当先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

段气得脸都变了色，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协约国方面不止一次地催促我们对德绝交。”

黎也激动地说：“如果我们听从协约国的命令，我们就不是一个有主权的独立国了。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

和的特权，我今天既然是总统，就该对一切负责任。”

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支持段的。他抢着发言，言词非常激烈，他说：“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简直像专制皇帝一样了。”范说到此，竟不顾体制，情不自禁地把手在台子上重重一拍，并且说：“总统简直优柔误国！”这话一出顿时使空气非常紧张，黎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幸而张国淦赶快缓和局势，他劝范对总统不可失去礼貌，更不可感情用事，应当心平气和地讨论国是。

那一边段也按捺不住，他盛气凌人地说：“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和我作梗，国会又处处找我麻烦，和我背道而弛，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于是段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向黎半鞠躬，然后退出，全体阁员自然也跟着总理一块退了出来。黎则像一个木头人，既不开口，且一动也不动地僵坐在总统位上，眼望着段和全体阁员退席。

这天（3月4日）的晚上，段没有通知任何人，即挂专车由京赴津，冯国璋正在出席陆军军官的欢迎会，得知这个消息，便匆忙地赶到东车站来劝段，请他以大局为重，不要负气出走。段说：“这个人（指黎）太不好共事了，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和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制，总统既然有特权，内阁还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何必还要尸位素餐呢？”他不顾冯的劝告，悻悻然跨上了火车前往天津，抵天津后下榻意租界段芝贵私邸。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国务总理因和总统政见不和拂袖出京的第二个，在段以前，则是唐绍仪在民国元年因不满袁的独断独行而赴天津。

总统府方面听说段祺瑞负气出走，却是正中下怀，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已换了夏寿康，此人很会做官，从不多问一事，府内要务多由黎元洪身边的军事幕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澎等作主，哈等想借外交问题推翻段，因此在此对德绝交和宣战问题上就专和段过不去，黎本人当然也希望一个比较能合作的总理，不过他怕撤换段以后，会引起北洋军系的反感，因此他便促请徐世昌或王士珍来继任内阁总理。

黎和他的左右都知道，徐如果出山，张勋等督军团实力派是会支持徐的。可是徐是个老狐狸，在这时他怎会接受黎的邀请而得罪段，他当然敬谢不敏。黎转过头来找王士珍，王士珍也不肯跳火坑。

3月4日、5两日，协约国公使向北京政府表示对段出走一事的深切关怀。黎命陆徵祥到各国公使馆说明中国对外政策不会有什么改变，请协约国方面不必担忧。另一主面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获知黎、段这次闹翻是因为黎拒绝在对德绝交的公文上盖印，非常欣慰，因此便要求晋见总统，黎以为这时不是接见外国公使的时候，应该避嫌才是。

由于黎想请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段之策行不通，乃退而求次，打算在阁员中选择一个人代理国务总理，黎完全不想请段回任，希望借段负走出走而将错就错，不让段回京。冯国璋则劝黎对这个问题要多加考虑，不可走极端，同时自告奋勇愿到天津去劝段回京，黎不好拒绝冯的劝告，但不赞成由冯出马，认为这样一来，段便占了上风，所以黎只同意派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赴天津劝段回京。

这一天，在天津的直隶省度朱家宝向冯国璋告密，说段

已拟就了辞职出京的通电，请各省军民长官一评曲直。这是把总统和总理的政争摊开来给北洋军人评是非，也是向黎威胁的一种手段。可是，段的电报还未发出，各省军阀已有通电到北京，要求挽留段。

5日晚间黎再度邀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入府讨论政局。冯国璋把朱家宝的告密电闪烁其辞地讲了出来。这一来，黎的勇气就顿时消失了，把转而请冯亲自到天津先劝段返京。他无奈地说：“好吧！外交问题就让芝泉（段的号）主持，我完全没有意见，不过总以服从多数为宜。”

冯国璋到天津找到了段，向段说：“只要国会能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当会依法执行，决不会加以干涉。”

6日，冯偕段一同回到北京，冯到总统府向黎报告任务达成，段则回府学胡同私邸。

7日段到国务院办公，第一件公事就是把致章宗祥的电报发出，下午冯陪同段到总统府谒黎，段向黎一鞠躬，坐下来严肃地谈了一套对德绝交有利于中国的理由，如对德绝交后协约国方面承认缓付庚子赔款，修正《辛丑条约》及提高关税等。黎也严肃地听着，但没有开口谈话。

10日段出席众议院，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众议员以331票对87票表决通过。11日参议院议员以158票对35票表决通过。

冯国璋这次以副总统的身份北上，不料赶上了黎、段剧烈政争的一幕，弄得非常扫兴，也很头痛。所以当段回京后，国会又顺利投了信任票，他感到北京城实在是个是非窝，还是远避为宜。于是遂在11日离京南返。

段祺瑞的本意是为国家利益打算的，他所以坚持对德宣战，是认为协约国必胜，如果不参战，战后便分不到胜利的果实。各地军阀们反对参战，是因为怕一旦参战后，势必要抛弃了地盘、权位、财富和娇妻美妾，还要率兵远赴欧洲打仗，而敌人又是最能打仗的德陆军，所以军人们都和段唱了反调。黎元洪则是和段意气之争，所以黎对段的参战案便持反对意见。

段亲日是受曹汝霖的影响，曹汝霖被称为新交通系领袖，他说服段的理由是：“英、美虽强而远，远水难救近火，袁项城外交失败在此；日本近而强，中国内政问题未有不得日本支持而能成功者。袁舍近图远，忽视日本而亲英，结果日本反对帝制，袁进失败。”他这套理论似是而非，可是却打动了段。

后来，段听了日本公使一席话更受影响，日使说：“世界上任何国家，未有不安内而能攘外者。中国政府倘欲实现统一，日本愿借款和供给饷械，先成立模范军（注：就是后来的参战军）为中央直接之武力，借可作统一中国的力量。”段听了大为感动，他自认是袁世凯的继承人，始终没有放弃由北洋系统一中国的美梦。同时他也知道旧的北洋系已腐化到了极点，督军团只是摇旗呐喊，相互利用的工具，如果想以武力统一中国，既无可用之兵，又无可用之财。如今日本人打中了他的要害，愿意支持他武力建军统一中国，岂不是正中下怀。这就是段祺瑞亲日的原委。

督军团的形成，是黎元洪失败的根源

1916年的徐州，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避难所和各色政治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的市场。这一切是因为一个人让他们心跳和狂喜：这个人是大帅张勋，十三省军阀盟主。首先是被北京政府通缉的帝制犯顾鳌、薛大可都被“大帅”聘为机要秘书。张勋还有电报邀请杨度，孙毓筠等全部被通缉的帝制犯都到徐州来，北洋派有关的下台军人政客如陆建章、阮忠枢、龙觐光等都被“大帅”礼聘为高等顾问。暗杀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帅”的座上客。9月27日，号称“文圣”的保皇党魁康有为应“大帅”的邀请，也到徐州来进行活动。

9月21日，十三省区联合会在徐州召开，大帅张勋是这次会议的主角，当大批军阀怀着各自的目的来到徐州时，张勋派绿呢大轿前往车站迎接。会议在巡阅署大客厅举行，会议决定，推举张勋为十三省区的大盟主。这个十三省区联合会即是人们常说的督军团。

9月22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由蚌埠赶到徐州来，亲自参加会议。在倪的建议下，当天的会议改为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认为仅仅制定章程而不采取行动是不够的，因此建议解散国会，废止旧《约法》，罢免西南派唐绍仪、孙洪伊、谷钟秀、陈锦涛、张耀曾五总长，并将此项决议通告北京政府，限于三日内答复。这些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中

华民国一脚踢翻，改为中华军国，并向西南各省采取战斗姿态，因此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顾虑，认为没有取得本省督军的授权，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国会”改为“除去国会中暴乱分子”，但是大家仍然作不得主，因此当天的会议没有结果就散了。

这些说明：徐州会议的目的不仅在于组织一个对抗国会、国民党和西南各省的军事同盟，而且也在于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权，为各省军阀割据订下更有力的基础。这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内，凡有损害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都认为是共同敌人而以武力对付。

徐州会议主要存在张勋与冯国璋之间的矛盾，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好的。冯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并不是甘心充当张勋的助手，而是利川徐州会议酝酿政变，企图夺取总统的地位。但张勋自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签发电报，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与自己一系的李纯、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长江三督和徐州之间不合作的态度。

张勋与其他各省军阀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由于张勋妄自尊大和独断独行，各省军阀敢怒而不敢言。张勋每发表一次意见，各省军阀只能随声附和。一次，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同意电报来迟了一步，他就大骂李破坏北洋团体，影响盟主威信，吓得李来电谢罪，并且委过于秘书办稿太迟。后来北京选举副总统，张勋命令各省盟员通电为徐世昌捧场。李很快地就有回电说：“与其推戴东海（徐），毋宁推戴我师。”

这时候各省北洋军阀纷纷仿照前清督抚的成例。称为

“某帅”，只有张勋一个人称为“大帅”。由于大盟主的威风越来越大，除了退盟的长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员逐步地下降为他的应声虫。其中有些恬不知耻地建议以后不必召集会议征求同意，一切问题经由盟主决定，大家无不乐于服从。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盟员对盟主的反对是越来越深了。

徐州由“中华军国”向前更迈进了一步，成为复活“大清帝国”的半公开活动场所了。因此，全国人民对徐州会议一致表示愤慨，南方五省督军也有通电加以斥责，黎一再促请段内阁制止督军团目无法纪的行为。

9月29日，北京政府下了一道禁止军人开会干政的命令。北京政府对禁止军人干政发表命令后，那些“唯大帅马首是瞻”的各省军阀纷纷电呈不再参加会议，并且撤回了他们派往徐州的代表。冠盖往来的徐州顿然呈现了人去楼空的冷落场面。张勋电问段，艳电是否出自总理本人的意志？回答说：“吾辈私交虽厚，公谊难容”。因此，张勋牢骚满腹地通电有关各省说：“去河北贼易，去朝迁党难！”因此，尽管张勋的气焰被压低，徐州会议不能继续召开，但是帝制派、政治阴谋家和投机政客仍然十分重视张勋的军事实力，段的策士徐树铮仍然与张密电往来，梁启超也曾到过徐州。因此，张勋还敢于以个人名义继续发出攻击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电报。当国会提出关于徐州会议的质问案时，他还敢去电恫吓国会说：“部下健儿阅报后，群情愤激，拟人京面较曲直，然后待罪阙廷。”

在徐州开会的时候，段祺瑞正在北京忙着对德断交的外

交事务，他虽然反对张勋以“盟主”自居，但是徐州开会也启发了他，1917年4月，他电召各省军阀到北京开会，企图以军事会议解决外交问题。

段祺瑞并不把反对宣战的舆论放在眼里。他知道舆论不仅可以用枪杆子压服，也可以用枪杆子制造，但是北洋督军们的反对意见却不能不顾虑。因为如果得不到这批军阀的支持，不但可能引起北洋系的分裂，导致政权的不稳，而且也无法使出用枪杆子压服舆论、制造舆论的北洋战法。段祺瑞明了这些军阀们之所以反对参战，是因为他们担心参战以后，说不定要调他们带兵去遥远的欧洲打仗，丢了现在的地盘与地位。只要将军阀们的这个担心解除，说明不但不用去欧洲作战，而且还能借得款项练兵购械，壮大实力，军阀们的态度就会转变，而转变后又可以此来胁迫国会与黎元洪。因此，段决定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将参战的“玄机”告诉这批督军。

自4月中旬开始，先后有安徽、湖北、直隶、山东、江西、福建、吉林、河南七督军和察哈尔、绥远两都统到达北京，其余各省的督军也派出代表与会。经段祺瑞及其左右亲信将“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参战奥妙向督军们灌输后，督军们马上变反对为拥护。安徽督军倪嗣冲本是反对参战的急先锋，在赴京出发时还发表了一通参战会导致亡国的言论，途中又大骂梁启超鼓吹参战是“亡国文妖”，经段开导后，一下子变为力主参战的健将，而且主张条件加入战团，越快越好。4月25日，军事会议正式开幕，当天即决支持段祺瑞的对德方。然后又联袂拜会协约国各公使。各公使

深知这批武夫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也破例设宴接待。5月1日，内阁开会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倪嗣冲等四督军闯入会场，以军界首脑的名义发布支持段的外交方针，要求内阁立即对德宣战，无条件加入协约国一方。督军们杀气腾腾语调使非段派的阁员只能把不同意见咽了回去，参战问题算是在国务会议上通过。

5月10日，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审查参战案。上午时，就已有不少手执白旗或陆军的十九星旗、或胸悬纸糊的小五色旗的人在国会附近的虎坊桥一带聚集。这些光怪陆离的队伍或称海陆军人请愿团，或称五旗公民请愿团，或称政学商界请愿团，也有的打出学界、市民请愿的旗帜。至下午一时，在众议院门首已聚集了这种五光十色的请愿团四千余人。有议员进入会场，他们就投以各种名目的请愿书和传单，如不接受或接受的动作稍慢，就被这些“公民”饱以老拳，先后有邹鲁、田桐等十余名议员遭到殴打。又有所谓的公民团“代表”谒见议长汤化龙，声言若不将参战问题完全解决，决不许议员出院门一步，出门者即殴击之。院门之外，负责治安的警宪与“公民”们和平共处，并不干涉“公民”的非法行动。而且，指挥公民团并出任公民团代表的恰恰是军警人员，这使得对此并不陌生的议员们马上想起了民国二年10月6日选举正式大总统时，“公民”们包围国会，叫喊“不将我们可心的大总统选出，就不许议员出议场一步”的一幕。

段祺瑞坚持演他的独脚戏。在几天内，他三次向国会咨文，要求国会讨论通过参战案。段自信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继续操纵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在京的督军们先

是以同乡或地区长官等名目宴请议员，又在 15 日招待参、众两院议员，为参战案疏通。会上，督军们花言巧语，情意殷殷，甚至作揖打躬，会外则不断散布如不通过参战案，就解散国会的舆论。笑里藏刀、软硬兼施。但这些手段同样无效，5 月 19 日，众议院开会复议参战案，议员提出，由于内阁残缺不全，已无法负责，即使参战案通过也不能执行。因而应先改组内阁，再讨论参战问题。

公民团事件给段造成的窘境和段与国会间短兵相接式的对峙，对黎元洪来说，不仅是使其振奋的喜讯，也是倒段的一大良机，他以冷眼观蟹的态度注视事态的发展，对段的难堪窘迫幸灾乐祸。他在公开场合决不露出任何要段下台的表示，相反却一再声称“对段总理信任到底。”“对组阁没有成见，外交听国会自由解决。”暗中，多方寻找下手之处，对段进行打击。

段祺瑞虽无辞职表示，黎元洪已开始安排段的后事，黎不打算与北洋作对，只想去掉段这个目中无人、视自己为傀儡的政敌。至于段的继承人他还准备从北洋中找。黎所瞩目的一是徐世昌，一是王士珍。但是徐世昌不仅不肯出山，甚至连出面作个调停人都不肯。16 日，黎召王士珍入公府商讨组阁问题。此时冯国璋也主张由王士珍组阁。但王回答说：“我在当初就无心问世，更何况今天这副政象。总统如果强让我干，我只有挂冠归里，连参谋长也不当了。”徐、王均不肯出面收拾乱摊子，黎只好退求其次，准备以前清官僚李经义为总理人选。李经义是清末重臣李鸿章的侄子，与清末淮军系统，特别是张勋关系密切，虽然李也表示谦让，但态度并

不决绝。

段祺瑞也在积极活动。就其本意，他当然不愿下台，但是独脚戏又演得太辛苦。他设想到黎元洪或可不顾后果下令将其免职，也需有所准备。但段祺瑞知道黎元洪在打徐、王二人的主意，现在二人的意见如此，黎一时又找不出其他人选来，也就奈何不得自己。于是，段祺瑞放手去做，让督军团走上前台，公开威胁黎元洪与国会。

5月17日，山东督军张怀芝人见黎元洪，声称国会如反对参战，“大总统似宜立予解散”。黎回答说：“你们是军人，军人职在国防，不要干涉中央政务。约法上没有解散国会的条款，我决不能照办。”

督军们遭此挫折，认定已无法劝黎，决定公开向黎发难。

黎元洪跌的那一跤就越大

北京城内谣言不断。一会儿一种风声，或称督军们要径行宣战、或称要直接对国会采取行动。这时又收到张勋对督军团通电的复电，不仅全力赞同督军们解散国会的主张，还“惜发之为较迟耳”。政象凶险，黎元洪也有所觉察。但他另有一种逻辑。他认为宪法问题不过是督军团的借口，真正的问题在参战。而国会与段已成不两立之势，段在国会决难通过宣战案。压迫国会屈从于段的主张，在黎来说力有不及、势有不能，而且情有不愿。如果免段或段辞职，则可顺理成章。段去后，换上另一北洋派人士组阁，督军团未必一定反

对，国会也不一定坚持反对参战的态度，因此政局的症结在去段。段白行辞职当然是上上策，否则免段也未必不能行。

5月21日，黎元洪召见督军代表孟恩远、王占元，告诉他们宪法问题已请国会各派领袖代为疏通，一定会有平允的规定，大家应稍勿躁，此后言论不应出于法律之外，然后谈及国会内阁问题，黎说：“我看政局形势搞得太僵，段老支撑大局，实在艰难，为什么不趁此机会休息、躲开冲突，再找一个机会东山再起呢？现在国会与总理的关系如此恶劣，还是暂避为妙。”将免段的信息传给了外面。最后，黎又别有意味地对孟、王说：“地方秩序要紧，你们可以不顾地方，我却不能不顾地方。”言外之意，是我也可任命他人为督军或为省长。孟、王二人出府后，将情形报告督军团，督军们一致反对改组内阁。稍晚、孟与王再入总统府，陈述督军团反对段去职的意见，措词甚为激烈，但黎的态度并无改变。晚上，督军团在府学胡同段宅举行会议，认为黎元洪已明显要与北洋派血战到底，如果各督军不离京，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总统可以命令北京军警监视大家的行动，岂不成为政治俘虏而无用武之地。联名辞职也有可能引起一种相反的后果，督军在自己的地盘内以辞职为要挟手段是可以吓倒总统的，在北京辞职，如果总统一概批准而由大家的部下来接任，岂不是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成为手无寸铁的人。因此，不如在总统拒绝解散国会的时候，全体离开北京，回到防地进行反抗。

晚11时，一批督军已乘车离北京奔天津而去。

段祺瑞此时已知道黎元洪势将免去自己的总理职务，也

召集左右商讨对策，有人认为事已至此，不如暂时退却，以便东山再起，但段认为辞职后对德参战就会成泡影，更重要的是，如段辞职，督军团就失去了一个发难的口实，而且段没有直接兵权，难保这些督军们在段辞职后不去拥戴一个北洋的新首脑，因为这时北洋内部已经有了不一致的声音。鉴于此，他准备先把阁员补齐，以消除国会和黎元洪关于内阁残破、无法负责的借口。在张国淦、范源濂的建议下，段择取了与黎及公府关系密切人士如夏寿康、饶汉祥、汤芑铭等为阁员人选，以使黎能赞同。5月22日，张国淦到总统府，黎元洪询问张国淦说：“芝泉的光杆总理还能当下去吗？”张回答说：“总理正打算补充阁员。”黎冷冷地说：“恐怕全是合肥人吧！”张国淦将名单递上，黎见其中并无段派人马，脸色稍有缓和，遂将名单留下。

段祺瑞的这一招术，居然产生了效果。黎元洪原本拟好对段的免职令，见到了这份名单，又有踌躇，便没有交出。然而黎的幕僚们认为这不过是段的苦肉兼缓兵之计，要黎下定决心。这时冯国璋已有电报打来，对府、院及国会均有劝诫，不赞成越轨行动；又有传言说张勋支持督军团的电文是他人伪造；陈光远、江朝宗等已答应维持北京治安，王士珍也表示可在去段后帮黎的忙，更主要的是美国公使芮恩施已代表公使团对黎元洪表示可以作黎的后盾。考虑到这些因素，黎最后下定了免段的决心。

国务院方面，经张国淦将进公府见黎的情形介绍后，段祺瑞以为事情已有转机。5月23日中午，段持这个“超然内阁”的名单亲自去见黎元洪，不料黎态度已变。黎接过名单，

指着上列交通总长的汪大曼的名字说：“伯唐（汪的字）上次提名外交总长，已被国会否决，这次又提交国会，必定不会通过。”对其他人选，黎也颇多指责。段知黎已变卦，态度也强硬起来，说：“内阁应由总理全权组织，不能完全按国会的意见去做。”黎拂然变色，毫不客气地说：“现在国会已对你毫无信任，督军团公然干涉制先，闹得不成体统，你作为责任内阁总理，应当是责有攸归。”段说：“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担任北京秩序的维持。”黎也不示弱：“我要为国家行使权力。”段愤慨异常，气冲冲离开总统府。下午2时，黎元洪将张国淦召至府内，将拟好的三道命令交给张国淦：其一为免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以伍廷芳为代理总理；其二是以陆军次长张士钰代理陆军总长；三是任命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张国淦劝黎要慎重对待，要考虑各方面对此事的反映，黎答已均无问题。经伍廷芳副署后，三道命令于即日发表。

免段令公布后，段祺瑞于晚7时乘车去天津，黎元洪派侍从武军长荫昌代表他到车站送行，并赠段程仪一万元，意在对段安慰。但是，以段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决不会容忍黎对北洋开刀。段祺瑞在免职令公布后仍然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发布了一份通电：“……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棋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棋瑞概不能负责。特此布告。”这通电文不仅直接认黎的免段令为非法，而且明显带有煽惑鼓动之意，教唆北洋督军们以此为题目，公开反抗黎元洪。免段并不是黎元洪的胜利，而是更激烈的政争的开端。

辫子军张勋决定孤注一掷

在北京政潮涌动之时，辫子帅张勋却端坐徐州，静观事变，没有像以往那样充当反对国会的先锋。张勋越是不露声色，段祺瑞和黎元洪越是急于与之结纳，都想把张勋拉到自己的麾下，作一员大将。这不仅在于张勋握有一到八路四十营的武军，又自居为十三省联盟的盟主，举足轻重，还在于张勋在参战风波中的态度奇特。张勋公开反对对德绝交与宣战，对段也颇存轻视之心，黎以为可引为同调；但张同时也极度憎恶国会与民党，与北洋虽非嫡亲，终有较深的关系，段也认为属自己的队伍中人，于是明发邀电、暗送秋波、信使往还，不绝于途。段在召集军事会议时，曾请张勋的代表阮忠枢电邀张勋赴京，段的亲信徐树铮代表段允诺说，如果张勋来京，就推张为“领袖”，“执坛坫之牛耳”，然而张勋的谋士们从黎、段“断难并之”及督军人京推断必“有一番大捣乱”，这正是复辟清室的良机，张勋就可以定乱为名，收服人心，“借图大计”。张镇芳还提出了一项具体的方案，即利用黎的窘境，诱其下令让张勋率定武军人京“为之保护”。张勋依计而行，不理睬黎、段的一再邀请，稳坐徐州，密切注视政局的发展，一面寻找时机，一面加紧复辟的准备工作。不过作为督军团的盟主，对北京的军事会议完全不问又有失身份，所以在督军团发出威胁要解散国会的电报时，张勋复电称督军们的叫嚣“义正词严”，表示“愿为后盾”。公民团

事件后，张勋觉得时机渐渐成熟。5月21日北京的军事会议散场，张勋即用密函将督军及督军代表二十余人召到徐州，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23日，免段令发布，督军们闻讯后暴跳如雷，痛骂黎元洪及公府等人，倪嗣冲、张怀芝等人公然提出三路出兵北京、驱黎下台。张勋觉得时机已到，就说：“你们的主张我是无法办到的，师出必须有名。要维护北洋，必须另求更妥当的法子，这个法子就是将大政奉还给今上。”倪嗣冲、张怀芝马上表示誓从公后，其他人也随声附和。张勋说：“既然大家无异议，那就再好不过了。不过这件事可不是说说而已，同意了就要做到底，必须坚定不渝。”说罢让人取出一段黄绫，要督军及督军代表在上签字。会上又议定各督军回本任后，即宣布独立，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张勋则扮演白脸，为作调人预留地步。

为使督军们不致于因免段而误认自己是北洋派的对手，黎元洪在免段令发表后再次拉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和王士珍出任总理组阁。24日，黎派饶汉祥与吴笈孙赴津敦劝徐世昌。徐坚拒不见，仅叫人传语“不能入京”四个字。饶、吴二人只好返京复命。25日，黎元洪又到堂子胡同王士珍的私宅劝驾。王开始只是说自己对政治本来就淡泊，才能手腕都不及段祺瑞，不能负此艰巨之类的官话，在黎的死劝活说下才说出真话：“我与芝泉无论就私情还是朋友而论，都万难取而代之。对总统盛情，我虽然极感知遇，但出而组阁，良心上终究不安。恐世人也难以见谅，会以为我卖友求荣，实在难以承命。”最后，王只答应可在新内阁中出任陆军总长。

在徐、王都不肯出山的情况下，黎元洪只好将任命李经

义为国务总理的同意案提交国会。27、28 两天，国会参、众两院都以多数通过李的同意案。黎元洪将任命正式发表。发表前，王士珍曾向各省通电，推重李经义，要各省督军赞成。冯国璋与张勋的电报都表示同意，黎觉得可以放松一点神经，长出一口气了。

但是，正当黎元洪以为因免段引起的政治风波已经尘埃落定时，更大的一声政治风暴却倏忽而至。5 月 28 日，奉天督军张作霖和安徽省长倪嗣冲分别通电，痛骂国会，指责黎元洪任用宵小、违法免段，要求解散国会、恢复段职。电文语气凶悍，杀气腾腾。29 日，急不可耐的倪嗣冲就在蚌埠宣布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随后，河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福建、奉天等省也纷纷宣布独立，稍后又有直隶和黑龙江。在宣布独立后，这批督军就成了各自地盘上为所欲为的专制皇帝，或驱逐不合己意的官员，或截留应上缴的税款，或扩充自己的人马，或捉押境内的火车，当然名义是运兵北上，“直趋都门，为国民请命”。

这时的天津，也是波谲云诡。段在天津的私宅成了又一个反对黎及国会的大本营，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亲段政客、议员无不奔走段门。段祺瑞拟在天津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以徐世昌为大元帅，带兵入京，驱走黎元洪，然后召开临时国会，推举总统，组建内阁。段已将临时政府的名单准备妥当，又致电各省，征求意见。不料张勋对此非常不满，认为有碍于他的复辟计划，便在复电中不客气地命令说：“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这个临时政府因此而胎死腹中。

督军们的独立，对黎元洪来说虽不是晴天霹雳，却也是

始料未及。而对雄赳赳、气昂昂、磨拳擦掌的北洋督军，黎元洪坐困公府，毫无凭借。

这时，刚被国会通过的李经义也被黎元洪当成了解救时局的救星。因为李经义与张勋关系密切，所以黎元洪以为只要李走马上任，身为十三省大盟主的张勋就会表示支持，出面制止督军们向北京进军，局势就会缓解。因此，他更番不休地派人赴津，催促李经义来京组阁。但督军独立的消息使这位原本跃跃欲试的老官僚一头钻在天津租界里，不肯赴京任职。但他极力怂恿黎元洪，非有张勋北来调解，他决不就职，而且还必须与张勋“偕同到京”。

于是黎元洪迫不及待发布了请张勋入京的总统令，并派专车到徐州迎接张勋。

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十营4300余人自徐州北上，8日至天津，大队辫子军继续北进，进驻丰台、永定门、天坛一带，张本人却停在了天津。张勋是著名的复辟派，他毛遂自荐充当调人，当时的舆论就怀疑他要借机复辟清室。黎元洪虽有所闻，但病急乱投医，也就顾不了许多，况且张勋一再否认自己要复辟，声称拥护黎元洪，所以黎对张又抱有幻想。但听说辫子军大队人马要开来北京的消息后，黎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马上请徐世昌、李经义电劝张勋“减从入京”，不料劝告还未传到，更坏的消息又接踵而至。8日下午，黎派到天津迎接张勋的公府秘书长夏寿康返还北京，向黎传达了张勋的6项调停条件：一、实行责任内阁制。二、解散国会。三、解散省议会。四、惩治“四凶”。五、另定宪法。六、赦免政治犯（即洪宪帝制祸首）。要求黎在48小时

内答复，否则听任督军们“自由行动”。这时黎元洪才知道，自己请来的不是调人，而是比造反的督军们更为凶恶的敌人。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事态的发展已不容黎有其它的选择了。

得知张勋的6条件后，黎元洪立即打通了与张勋的电话，称“条件尽有磋商余地，务请早日枉驾来京，借聆教诲”。张勋回答却是“国会解散之前，决不入京”。

到了12日下午，从天津传来消息，说张勋已无可忍耐，如果是日未有解散国会的命令发表，张勋就回徐州，听任督军们自由行动。这时的黎元洪，进退维谷，苦状莫名。晚上，他在公府召开紧急会议，希图在绝境中找出办法来。终于决定由江朝宗代总理，13日，正式解散国会。

6月14日，张勋偕李经义等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入京。

张勋在北京颐指气、八面威风，已成为实际的掌政者，报章称之为“太上总统”。

张勋与督军团虽然在反对国会与黎元洪上一致，但动机各有不同。张勋意在推翻共和政体，复辟大清王朝，督军团中的皖系目的是拥戴段祺瑞，建立皖系军阀的一统天下。非皖系的督军有的是借独立以自保，有的是讨好皖系，也有的是混水摸鱼、趁火打劫，真正甘心作张勋走卒的人一个也没有。只是需要一个人作进攻国会与黎元洪的统帅，而且张勋又自认为非他莫属，督军们才对张勋表示拥戴，并且表现得颇为恭敬，听任张勋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但国会解散、黎元洪已屈服后，督军们就不愿再容忍这位大盟主跋扈了。当然，督军们还不便公开与张勋冲突，于是就使张勋所支持的

李经义作发泄的对象。反对李经义组阁。并纷纷宣布独立。

张勋也尝到了督军们发难的味道。他虽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只好一再通电各省，为李经义疏通，并拉王士珍等人一同劝说这帮桀骜的督军们取消独立。他知道这其中皖系督军骨干，又吁请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为李经义拜场。几近唇焦舌敝后，督军们总算取消了独立。6月22日，李经义宣布就职，声言他“牺牲一身勉力担责，任事之期断以三月为限”。

督军们虽然不再公开反对李经义组阁，但在徐世昌、段祺瑞的授意下，仍然抱不合作的态度，或指桑骂槐，或挑剔人选，使李焦头烂额。不仅“一流”人物不肯入阁，连二、三流人物也不愿跳火坑，内阁迟迟不能组成。

张勋对李内阁维持不成，进退失据。复辟派遗老们乘机进言，要张勋干脆一做到底，打起龙旗。他们说，统一局面已经打破，迁就调停也万难息事宁人，只有断然复辟，才能镇服颠危。只有复辟，才师出有名，有立足之地。他们分析说，如果复辟，冯国璋以稳健著称，不会有异议，广东虽有乱党，但有龙济光牵制，两广巡阅使陆荣廷有故主之思，所以不必担心。四川内讧，云、贵两省革命长莫及，也成不了气候。所以张勋“进有万全，退无一失，进有不世之功，退有不测之祸”。这批遗老们还举了古代东汉末年袁绍和此前刚跨台不久的袁世凯作例子，说明犹疑不定、首鼠两端必坏大事。相反当机立断，定获成功。这番荒唐的见解居然将张勋打动，于是张勋决定孤注一掷。恰好6月28日老牌的复辟分子康有为也潜来北京，立即被张勋迎入南河沿私宅。当晚，

即在张宅举行了秘密会议，制定了复辟计划。30日晚，张勋与复辟派的刘廷琛两人潜入清宫，与博仪的师傅陈宝琛会议，安排了复辟的步骤，然后又出宫赴江西会馆看戏，约夜半返回私宅，同时将王士珍、陈光远、江朝宗等军警要员“请”至私宅，宣布了复辟计划。与此同时，大批辫子兵进入城内。7月1日凌晨，张勋全副前清大员打扮，率王士珍、康有为等50余人乘车入清宫，拥戴废帝博仪登基，复辟闹剧正式开场。

徐树铮的机会来了

张勋拥兵入京调停前夕，在天津的张国淦曾建议黎免去李经义的总理职务，重新起用段祺瑞，以段的力量与地位牵制张勋防止张勋复辟，事为黎的左右所阻。现在复辟发生，黎颇感悔不当初，马上派公府秘书长夏寿康赴津，问计于张国淦。张说：“民国是总统手创，现在复辟发生，民国中断。此种局面，唯一的方法是请南京冯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同时起用芝泉，责成他出师讨逆，一定能成功。如果总统这样办，那么芝泉是总统所任命，他讨逆成功，自然也是总统的功劳。不然的话，中断民国是总统，恢复民国的却是段芝泉，总统置身何地？又如何面对国人？总之，不必计较此前的是非恩怨，应认真思量此后的利害。”夏寿唐回京后，将张国淦的建议告诉黎，黎思量一番，认为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于是拟就了免李任段、并令段兴师讨逆的命令和请冯国璋在南京

代行总统职权的电报，秘密派人于2日送到天津交与段祺瑞，并将电报发出。随后黎元洪到日本使馆避难。

张勋复辟给段祺瑞的重新登台提供了机会。段祺瑞虽然反对复辟清室，但并不反对解散国会和驱赶黎元洪，而且，为了借张勋之手达到解散国会、驱黎下台的目的，还有意诱引张勋进行复辟。段的亲信徐树铮曾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当张勋在北京打起龙旗后，段马上召集亲信左右商讨如何利用这一机会重返政坛，最后决定利用全国人民反复辟的局势，先声夺人，打出讨逆的旗帜，以驻马厂的第八师李长泰部和驻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再联络驻保定的第三师曹锟部组织讨逆军。7月1日晚段即赴马厂。次日，段收到了黎重任他为总理的命令，经张国淦的劝说，段觉得还是接受这一任命更划算。3日，段匆匆发表了由梁启超起草的反对复辟的通电。段的言论机关天津《大公报》也刊登消息，说黎派汤芑铭将总统印缓携至天津，并携来免李任段的命令及请冯国璋行使总统职权的电文，已由人送到马厂。同一日，冯国璋也发布了讨逆通电。次日，段、冯又合衔发布了另一则讨逆通电。在此前，已有湘、鄂、浙三省督军通电反对复辟，冯、段之后，附和者益多，已达十余省。7月5日，段祺瑞回到天津，宣布正式就任国务院总理之职。7日，冯国璋也在南京正式代理大总统。

讨逆军组成后，从7月5日开始，兵分两路北上。由于复辟不得人心，张勋的主力又被隔在徐州，无法北调，所以辫子军迅速溃败。麇集北京城内的复辟集团见大势已去，很快作鸟兽散。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城内，张勋逃入荷兰公

使馆。

张勋眼见大势已去，乃作了一个如意算盘，他想通过外交关系，率领辫子军安全地退出北京，回到徐州老巢，同时他和雷震春、张镇芳联袂向溥仪提出辞呈，溥仪小傀儡皇帝当然批准，并发表伪谕，以徐世昌组阁，在徐世昌未到京以前，由王士珍代理。这自然也是张勋的主意。

张勋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复辟美梦竟是昙花一现，而徐州会议时那些“唯大帅马首是瞻”的督军们，竟然现在用“拖”和“等着瞧”的态度来看他唱独脚戏。在大势已去的情形下，他想一走了之，他想学袁世凯，袁当年上演洪宪称帝，皇帝做不成于是转回头要做总统，张勋如今复辟不成，也想回徐州去当大帅。就在这时候，又传来辫子军徐州老巢的消息，张勋手下第一员大将，留守徐州的张文生，率领定武军六十四营通电投降，不战而屈。张文生是沛县人，与丰市的李厚基同为苏北籍的北洋军阀。定武军在徐州投降后，头上的辫子都完全剪光。

虽然闯了这滔天大祸，张勋不只有灭门之祸，也没有怎么大不了的麻烦，不过是一场赌博，把兵权和地盘输了。据说徐世昌曾向段祺瑞说：“绍轩虽为祸道，但只不过是一莽夫，请念北洋同胞之谊，穷寇莫追。”段点了头，于是徐电张勋说：“执事既不操柄，自可不负责任，至于家室财产，已与段总理商明，亦不为己甚，昌当力为保护。”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以“再造共和”的身份复任总理，又有黎的任命，当然毫无问题，但是在总统问题上，事情却变得有点复杂。依据段祺瑞3日发出的请冯代理大总统职务

的电报和冯自己宣布“谨行代理”的电报，冯国璋代行的理由是黎元洪“陷在贼中，失其自由”。那么“逆军”被平定，黎获自由后，就应当继续由黎元洪任总统。但是东山再起的段祺瑞对黎的憎恶已达极点，此时已没了国会，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也不需要再对黎敷衍。所以当有人建议迎黎复职时，段立即表示决不能再与黎共事。段还在京津铁路交通刚刚恢复、自己尚未进京时，就派陈文远率一个营的讨逆军迅速赶到北京，进驻中南海。名义上是守护公府，实际上是防止黎元洪回任。段心目中的总统人选是徐世昌，但是黎与冯均在，法理上提不出拥徐为总统的理由，而且讨逆以维护共和为出师之名，抛开黎、冯而举徐，就会减掉段“再造共和”的英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让冯继任总统。虽然冯为总统比手无寸铁的黎要难对付，但总统须在北京，这样就可以将冯调离地盘与军队，如此冯也奈何自己不得。况且这时已有军阀通电拥护冯出任总统，也不好轻易否决，在权衡了种种利弊后，段祺瑞最后还是决定迎冯继任总统。

黎的亲信与民党势力则主张仍由黎担任总统，西南各省的军阀也附和这一意见。此时的黎元洪，又是另一番心态。从府院矛盾到宣战风波，从解散国会和张勋复辟，一次次的政潮恶浪使黎元洪吃尽了苦头，心力憔悴。他深切地领教了军阀们的厉害，懂得了无兵无勇无法在政坛上立足。与段的政争步步失着，最后竟引狼入室，被迫解散国会，乃至复辟发生，虽每次事变均由军阀所促成，但每次又无不借黎之手，于情或有可原，于理则无以自解。在府院对峙、黎尚有凭借

之时，段就横眉冷对，黎已不堪忍受，现在黎已形同俘虏，而段挟平逆之余威，气焰不可一世，倘然留任，又将如何，黎不寒而栗。黎也清楚地知道，不惟段派反对自己留任，就是反段派也只是把自己留任问题作为政争的策略，况且其中有些人已公开劝他下台了。

段祺瑞准备接受冯国璋为总统，但是冯本人对此却犹豫了一段时间。

段认为冯不肯出任，黎就有复任的危险，于是又派靳云鹏带迎冯的专车南下再次劝驾。靳向冯称段一定与冯合作，维持北洋的利益与统一。冯终于抵不住大总统这项桂冠的诱惑，在他为防段而提出的以江西督军李纯调任他遗下的江苏督军一职，由陈光远任江西督军的要求被段接受后，8月1日，冯国璋进京。上午10时，黎的同乡汤化龙得到冯于12时到达的消息后。马上电话通知黎元洪，建议黎返宅与冯晤面。黎即偕唐仲寅回到东厂胡同。下午1时，冯来到黎宅，与黎商谈约半小时。冯在谈话中假意劝黎复职，黎当然知道这完全是官腔，向冯表示决不复职。冯得知黎说的真心话后敷衍几句便告辞。8月4日，冯通电宣布代理总统。

8月28日上午，沧桑的老人黎元洪离京赴津。

北洋军阀新势力划分

南北战、和，曹锟是关键人物

1918年徐世昌上台之后，任命靳云鹏为总理，主张文治天下。而文治天下首要的一件事，就是平息南北之争，和平统一天下。

为了促进南北议和，徐世昌一再拖延副总统的选举。为避免直系反对，段祺瑞意欲拉拢曹锟，就向国会推荐他为副总统。但是徐世昌却想把副总统一职留给南方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以示和谈诚意；而且他想堰武修文，不愿军人干政，担任副职，威胁和平。所以徐世昌大造和平舆论。10月23日，他让钱能训致电西南，呼吁解除南北纷争。电称：“欧战现将结束，行及东亚问题，苟内政长此纠纷，大局何堪设想？”提议“先就事实设法解纠，而法律问题俟之公议”，作为议和步骤。即双方先行停战，解决地盘争执等实际问题，而后再协商消释在约法、国会问题上的分歧。这是护法战争以来，北洋政府首次正式向西南表示和平姿态。

徐世昌派出特使赵炳麟到广西，与岑春煊、陆荣廷接洽，谋求和解。终于10月30日，岑春煊等致电北洋政府，主张

南北双方各派代表，召开对等会议，谋取对等和平。徐世昌颇感欣慰，表示赞同。

以上是徐世昌上台后酝酿南北议和所走的第一步棋，步步为营，稳健有力。他的这些和平行动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

中外人士的一致赞扬和鼓励，使徐世昌信心倍增，他毅然抓紧时机，走谋和的第二步棋——颁发南北停战令。因为议和，必先停战。但他清楚，停战令可不是他一个说了算，必须征求北洋各督军的同意。于是，他邀请各省督军到北京开会，商讨时局，对于这次会议，徐世昌有充分的自信，尽管自己是赤手空拳一文人总统，但和平是人心所向，他背后有国际势力、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不怕制不服各省实力派。

11月上旬，奉督张作霖、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豫督赵倜、皖督倪嗣冲、晋督阎锡山、吉督孟思远等人都先后应召到了北京，其他没到京的督军也派了代表来出席会议。唯独坐镇天津的直督曹锟因为没做成副总统，赌气不肯来。

在南北战争时，曹锟在南军攻占岳阳之际临危受命，委派他的兄弟新任直隶省长曹锴代理督军，自己亲自动身南下，在汉口成立了第一路总司令部，命令吴佩孚为第三师署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满怀信心地希望在这次混战中捞得副总统之位。

南北战争是3月上旬开始。北军两路各自进入湖南作战，第二路张怀芝、张敬尧所率部队，军纪涣散，作战不力，再加上两人不能很好配合，互不呼应，部队推进极为缓慢。第一路前敌总指挥吴佩孚指挥的部队连连告捷。4月4日，北

京政府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并授曹锟勋一位，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令曹锟大失所望。

段祺瑞在3月23日再次组阁。然而这次组阁却没有满足曹锟的胃口，段只是把他提升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兑现副总统之约却一点影子都没有。这次对南方用兵，他拿出第三师和三个混成旅的人马，可以说是以全部家当都作了赌注，可结果连自己亲手抢来的地盘湖南，也要吐出来，让皖系亲信张敬尧做了湖南督军，他原来也曾想像以前副总统黎元洪兼湖北都督，冯国璋兼江苏都督，自己当上副总统兼直隶督军，可是就在他南下督军时，后方却不断传来，段祺瑞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拟以徐树铮代替他的直隶督军之职。同时冯国璋也致电：“久戍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曹锟认为段施行“调虎离山”计，因此在4月4日，电辞两湖宣抚使，在未获准之前先请假一个月，口称要到信阳鸡公山“养痾”。“辞职”是北洋军阀历来用以威胁北京政府的惯用手段。曹锟请假“养痾”就是消极怠工的具体表现。并真的离开汉口回到天津。

事实上，如果曹锟真的南下立功，北京政府被控制在张作霖手中，他的副总统愿望不啻是一场春梦。曹锟觉得自己又一次上当受骗。以前，曹锟、吴佩孚对段祺瑞内阁并未直接表示态度，8月7日，吴佩孚在曹锟的支持下，突然发表了一份致江苏督军李纯的“阳电”，在电文中，痛斥武力统一是一种亡国政策，北京政府“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

吴佩孚此举，无疑是得到了曹锟的暗中支持和指挥。曹

锬早已得知，段祺瑞为了联络奉系张作霖对付其它北洋势力，公然邀请奉军人关并私下又把副总统之位允诺张作霖。这对曹锬不啻是一大闷棍，而吴佩孚的通电正是他恶气的发泄。在吴佩孚攻击段时，曹锬则接连不断地向北京政府催索欠饷，并声称“不如此不足以平其气”，两人一唱一和，配合默契。

曹、吴夹攻段政，一方面是曹锬的副总统愿望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是国内国际形势发展使然。从国内看，南方多次提出求和愿望，北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很不得人心。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反对卖国的爱国运动有了很大发展，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皖系和主战派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直军在湖南战场上处境艰难，部队继续作战，很可能会老本赔光。从国际环境看，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争夺日益激烈，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受到限制，很难大规模对段进行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曹、吴有必要同冯国璋的直系连成一体。

所以在当时全国的主和声浪中，曹锬是最举足轻重的人物。皖系没有可以打仗的硬兵，如直系主和，皖系肯定无所作为，所以徐世昌就一再电催，表示一定要等他来后才开会。千呼万唤之后，11月14日，曹锬才不情愿地赶到北京。

北洋政府同意召开南北对等和平会议后，双方开始协商议和事宜：

首先是会议地点。北洋政府原主张在南京开会，因为江苏督军李纯夙重和平，可负维护安全之责。但西南七总裁联合致电徐世昌，认为上海租界是适中的中立地点。最后经国务院与南方协商，将上海定为会议地点。

其次是会议名称，北洋政府开始提出善后会议名称，托

李纯转告西南。但西南认为“善后”二字含有对土匪的语气，不能体现对等精神，而提出以会议地点作为会议名称，称上海和平会议。北洋政府对此本无成见，表示同意南方意见，会议名称问题很快解决。

再次是会议代表。徐世昌原拟让直系苏督担任北方总代表，但皖系坚决反对，主张由王揖唐担任，以控制南北和会。徐世昌以王揖唐是众议院议长、不便参与和谈为由加以拒绝，而改提参议院副议长、旧交通系朱启钤。朱启钤是徐世昌的拜门弟子，一向主和，皖系当然不同意。南方也以朱启钤是袁世凯洪宪帝制犯而不予承认。五国公使看到三方僵持，准备提出措辞严厉的和平劝告。听到这一消息，皖系大为恐慌，才放弃争议，南方也不再反对。

南北统一的机会失去了

1919年2月20日，上海和平会议开幕。南方代表为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等。

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始。南北代表大多以前曾在北京政府共事，皆是老相识。如今坐在一起，颇感亲切，但一想到要互相谈判，未免有点儿不自在。唐绍仪此时更是感慨万分，八年前自己在上海参加南北和谈，是代表北洋政府，现在重来旧地，再行谈判，却是代表南方政府了。时势变迁，谁人能料？南北不和，政潮汹涌，自己犹如一叶扁舟，随波逐流。而南北百姓，更是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确实，南北

息战统一迫在眉睫了。

众人坐定之后，唐绍仪首先致辞，表示力当尽力谋取南北和平；朱启铃也做了类似发言。然后，双方代表起立向国旗行礼，齐呼：“中华民国万岁”、“和平统一万岁”，会议就此而散。

次日，和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陕西停战问题。因为陕西处于南北对峙的中间地带，段祺瑞的亲信许兰州以剿匪为名在陕西攻打靖国军，唐绍仪要求徐世昌命令许兰洲退回原驻地，并撤换陕督陈树藩，以解除陕西困苦。朱启铃解释徐世昌早在2月13日，就通电陕西停战，并让南方非常国会山西众议员张瑞玠赴陕监视了。至于撤换陈树藩，他以“在两军对峙之时，若先更调军事长官，恐另起波折”为由，予以拒绝，双方不欢而散。

22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再次讨论陕西问题以及全国军事问题。关于陕西问题，双方商定按照停战划界五条办法，会请张瑞玠赴陕逐一实施，得到他的报告后，再行定夺。在讨论军事问题时，南方要求公布中日军事协定，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

中日军事协定是1918年5月16日，日本与段祺瑞政府以“共同防敌”的名义签订的。按这一协定，日本向段祺瑞提供大量借款，帮助他训练参战军。8月，段祺瑞成立参战军。9月28日又与日本签订了2000万日元的借款合同。

参战借款合同签定后，共已支付给中国政府300万元，尚存1700万元。欧战结束后，参战已不成理由，参战军应予裁撤，参战借款应予取消或停支。但实际上，段祺瑞签订参

战借款、编练参战军的目的是想扩充军备、消灭异己，大搞武力统一，所以1918年12月他将参战军改为国防军，继续向日本支领借款，继续扩充编练军队。由此南方才提出了上述要求。

事关大局，朱启铃不敢轻易表态，就与唐绍仪商定，请示北洋政府后再作讨论。

最后，北洋政府复电上海和会：1. 中日军事协定日内可以抄寄和平会议阅读，并声明该约并无附件；2. 参战军和参战借款源于欧洲战争，欧战虽停，但和议尚未签字，参战军未便裁撤；参战借款尚在条约效力拘束之中，不能中途变更。

这样，磨难重重的南北和议开幕不到10天，正式会议只开5次，就因陕西停战和取消参战军、参战借款两事横生梗阻而宣告停顿，致使国会、宪法等根本问题未及讨论。和议停顿的主要责任在北方。但是，如果说徐世昌和北洋政府没有和平诚意，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徐世昌竭尽全力筹划议和，当然希望和议成功，实现南北和平统一。问题的症结在于段派从中作便，徐世昌、钱能训威令不能行。

皖系军人原本就不愿同南方议和，只是为内外形势所迫，才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要损害他们的派系利益，让南方占上风，他们决不答应。参战军问题就是其中一例。陕西问题也是他们捣鬼。和议开始后，段祺瑞密令陈树藩进攻南军，声称：“徐（世昌）氏胆小气歉，小事可通融，大事万难让步，请弟放手为之，限阴历年内务联合各军乎陕，如弟力有不足，再当以国防军相助。”并将大批军火源源不断运往陕西。所以陈树藩才有恃无恐，违令进攻。

徐世昌的这种尴尬处境，当时了解内情的人颇为理解。吴佩孚就曾指出：“陕省停战及国防军停募两条，中央迟延多日，迄未正式答复，并非言和无诚意，系因某党派从中作梗。东海受困，威信不行，故致停滞。亟应共谋良策，破除障碍，以维和局。”他说的“某党派”、“障碍”，就是指段派。这番话可谓道破天机。

虽然南方宣布和会停顿，但徐世昌决不甘心就此罢休。他重新抖擞精神，为恢复和会竭尽全力。3月3日，徐世昌措辞严厉，饬令陕西停战。

3月14日，经徐世昌批准，北洋政府向全国公布了中日军事协定全文，以满足南方要求，邀得南方谅解。

但是双方又马上因国会问题陷入僵局。南方主张恢复；日国会，解散现国会。但是南北双方在国会问题距离如此之远，根本无法接近。从4月28日起，和会实际上又陷于停滞了。唐绍仪认为和议成功无望，双方僵持，徒耗时间和精力，不由心灰意冷。5月初，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段派的妥协外交受到学生和全国舆论的猛烈攻击，使他们的处境十分不利。唐绍仪认为这是议和的有利时机，就决定做最后努力。

5月10日，唐绍仪向朱启钤提出议和条件8条。13日，在和会第八次会议上加以讨论。这8条是：1. 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2. 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约有关人员；3. 取消参战军（国防军）；4. 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5. 和会宣告1917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6. 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

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7. 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8. 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总统之日止。

朱启钤不敢答应第5项条件，会议无结果而散。当日，唐绍仪等南方代表向军政府电告会议经过和结果，以“智尽能穷”、“才力不胜重任”为由，提请辞职。朱启钤等人“深感对东海无法交代”，有负于“历年服务之信任”也于5月14日向北洋政府提出辞职。

徐世昌认为南方八项条件主要是针对段祺瑞的，而且其中多数应办、可办之事，就是国会问题，也可经双方协商导入制宪途径。所以，他决心做最后一搏，挽回和会。

5月13日。徐世昌通电北方各省军人，历述时局危殆情形，希望大家能相忍相让，支持和谈，以图南北统一对外交涉山东问题，对内平息五四学潮。但是，段派军人反对丝毫让步，力主拒绝南方八项条件，撤回北方代表。至此，徐世昌已山穷水尽，只好于5月14日在总统府召开特别会议，议决拒绝南方八项条件。

至此，南北和谈破裂。中国又失去了一次统一的机会。

七省反皖同盟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

事实上，南北和谈即使成功，在北洋内部也不可能达到统一。直皖两系的争斗，使和平只成为当时中国人民的美梦而已。

北洋派直皖两系的斗争，从1917年8月冯国璋到北京接任代理总统时已日见端倪。随着北洋军阀对南方的护法战争，两系的矛盾日益加剧。在直系冯国璋和皖系段祺瑞的角逐中，曹锟以自己的利益为导航，在冯段之间左右逢源，两面讨好。冯国璋的败亡并不意味着两系斗争的终结。1918年12月，冯国璋去逝，曹锟当然地被推上直系领袖的地位，原来风云一时的长江三督此时也唯曹锟的马首是瞻，直皖斗争遂由冯段之争演变为曹段的直接利益之争。

段祺瑞在冯国璋下台后，虽然也辞去了国务总理的职务，但仍以边防督办之名一手控制北京政府，利用日本借款和军火，通过心腹徐树铮扩展和训练自己的私人武力——参战军，到1919年6月，参战军更名为边防军时已发展到3个师4个混成旅。段祺瑞编练参战军，其动机是由于北洋大势，在袁世凯死后一分为二，二分为三。二是直系和皖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脑，曹锟为副，长江三督为骨干。皖系以段祺瑞为首脑，徐树铮为中心，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张敬尧为四大台柱，二而三是又增加了一个奉系，后来居上，鼎足而三。段祺瑞本可以成为袁世凯的继承人，整个北洋派的领袖，只因他过于刚愎自用，不能容物，信任徐树铮，遂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只好巩固皖系以自重。徐树铮当然是个很好的角色，可惜锋芒太露，专横过度，他对段的贡献最大，影响也最长。至于张敬尧之辈，既不是人才，也不是战将，而是段的重负。

奉系的崛起，一是地宜，二是段祺瑞和冯国璋明争暗斗之时，徐树铮极力献计拉拢张作霖和奉军来对付直系，给奉

系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机会。张作霖在和皖系的相互利用过程中，野心也随之日益增长，不愿接受皖系的摆布，甚至要清算徐树铮。

直系在冯国璋死后，曹锟高踞首席，得力于他的爱将——北洋后起黑马吴佩孚。直军在湖南驱兵疾进，所向无敌，这全是吴的功劳，在曹的授意下，吴佩孚陈兵不战，通电主和，争取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这样，使段祺瑞感到不但直系已在军事上政治上成为自己的劲敌，而且皖系诸将也往往以个人的地盘地位为重，不肯接受调动，几乎没有可用之兵，他所坚持的武力统一政策就无法实现。可见，段组织参战军和以前袁世凯不信任北洋派而另外建立模范军的用心如出一辙。由于战后西方国家强烈反对中国继续成立参战军，于是段祺瑞将参战军改名为边防军，随着边防军的实力日益扩大，北京附近地区不能容纳，徐树铮便看中了无人过问的西北广大地区，以此作为边防军扩充实力的基地。徐树铮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人。北京的混乱局势，使他觉得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他的一举一动又容易引起政治风波，加上段祺瑞的督办参战处已不见容于国人，因此，他利用自己担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之便，适逢外蒙古的内向问题（外蒙古许多王公有鉴于“独立失算，害怕日本乘机侵占，酝酿重新归属中国），于1919年4月17日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当时总统徐世昌非常赞成徐树铮筹边，以调虎离山，避免他留着在北京呼风唤雨，制造政潮，所以北京政府特任他为西北筹边使，同时，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授以节制内蒙、新疆、甘肃、陕西边境各种

军队的全权，并得在西北地区设立银行、发行公债、创办垦牧公司。西北筹边使在官制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大，包括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独立大权，练兵购械先行后报，西北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

曹锟当副总统的美梦完全化成泡影后，对段祺瑞的一切幻想也随之消失，深切感受到段祺瑞势力的不断扩大，势必造成自己地盘地位的越发难保，遂逐渐由暗中支持吴佩孚反对皖系变为直接出面交锋。参战军更名为边防军后，徐树铮的西北筹边做得有声有色，外蒙古撤治，徐公然以“西北王”自居，想与“东北王”张作霖分庭抗礼，这就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反感。曹锟和张作霖在北洋军阀中兵力最多，地位最高，实力最雄厚，不少北方军人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二人互争雄长，并不融洽，但由于段祺瑞在北洋派以外另建自己的武装及其亲信徐树铮专横拔扈，自恃边防军这支武力，为所欲为，使他们在共同利害关系上开始结合起来。这样直皖奉三角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倾斜。

由于曹张在反对徐树铮的共同前提下日趋接近，经过直系曹锟的暗中串联，到1919年秋冬之间，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奉天、吉林、黑龙江七省的反皖联盟业已形成。

七省反皖同盟开始时并不是直接反对段祺瑞，而是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希望段祺瑞能接受忠言，“亲君子而远小人”，所谓“小人”就是徐树铮。但段祺瑞不以外部压力而摆脱徐树铮，因为边防军是徐树铮一手编练和组成的，如果除掉徐树铮，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而置身于无权无勇的地位。段祺瑞深信徐树铮对自己忠诚可靠，不愿“自毁长城”。段祺

瑞既然不能接受七省联盟的要求——清君侧，于是局势就恶化到不可收拾，因为七省联盟的目的不达到，只好走极端，即决定由“清君侧”发展到“兵谏”的新阶段。

七省联盟计划中充当“兵谏”先锋的是与皖系电战不休的曹锟及吴佩孚。8月31日，吴佩孚与南方军政府代表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签订了《救国同盟条约》，规定如果和局无望，吴佩孚即电告内阁和曹使（曹锟），请撤防屯直，或临时另有相当处置。事实上，吴佩孚在此之前就一再电请撤防北归，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操纵下，置之不理。这是因为段祺瑞所编练的边防军，要摆在北方以自卫，没有足够的兵力接替前方防务，直军撤防北归，又将威胁北方，所以，他授以北京政府对直军要求撤防采取延宕手段。因此，七省反皖联盟不能不采取实际行动，直皖矛盾日益尖锐。

曹锟决定授意吴佩孚采取自由行动。30日，南方军政府决定秘密接济直军开拔费60万元，吴佩孚遂与南方军政府相约，直军开拔后，由湘军接收防地。吴佩孚还与南军共同组织所谓“救国同盟军”，相约倒段后共组南北统一政府。

吴佩孚采取自由行动的呼声日紧，对皖系来说，这是极严重的事情。段祺瑞认为目前时局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阻断直军北归的路线，打破直隶督军曹锟和长江三督的联系，设法谋取河南。二月中旬，段祺瑞指使河南部分军人反对河南督军赵倜，逼迫靳云鹏撤换赵倜，起用段祺瑞的内弟吴光新继任。这样一来，赵倜被逼上梁山。赵倜在直皖两系斗争中本来是采取中立态度，无所属的，现在为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必须参加到反段联合阵线，当他获悉段派长江上游警备司令

吴光新来吞并河南，积极寻求直派的支持，并将自己的“宏威军”迅速布防在京汉路南端，以抵抗吴光新部入豫，准备以牙还牙。于是反皖同盟由七省发展到八省。

吴佩孚撤防北归，意味着直皖一战。吴佩孚撤防北归，南军可以随时随地北伐进攻，这样就使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破产，同时也会直接形成对控制中央政权的皖系军人集团的致命威胁。因而，3月上旬，段授意国会补选曹锟为副总统，以挽救直军撤防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如果曹锟接受当副总统，便要保证吴佩孚不撤防。但曹锟对此已不感兴趣，8省联盟的督军都指使本省籍议员不得出席副总统选举，国会虽开会要选举副总统，却两度流产。

曹张联合倒段之势已成，虽然口头上不讲倒段，实际上只有倒段才能打开当时的政治僵局。

张作霖将了徐树铮一军

直军在湖南撤防之前，段祺瑞早已估计到这不仅仅是撤防的问题，下一步必然会发展到直皖两系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积极采取步骤，准备先发制人。段祺瑞亲自出马担任川陕剿匪总司令，率领边防军第一、三师向陕西出发，“讨伐”陕西民军和川滇靖国军。段祺瑞的这一布署，实际上是“声东击西”的策略，真正目的并不是向陕西进兵，而是准备在郑州设立总部，先驱逐河南督军赵倜，然后派军防守京汉路南段，堵塞直军归路。如果直军敢于强行通过，就在河南

平原予以迎击。段祺瑞认为在河南平原同直军作战，不但北京根据地不致受到战火的威胁，而且山东、安徽两省皖系军队可以出兵侧击直军。就在段祺瑞准备带兵出征陕西的消息传到关外，关外的张作霖立刻借口边防军出动，北京防空虚弱，要求奉军开进关来“拱卫京师”。如果北京让奉军来“拱卫”，段祺瑞只能成为张作霖手中的高级政治俘虏，这个争取主动作战的计划只得被迫放弃。

吴佩孚衡阳撤防是改变南北形势的一个惊人行动。后来吴成为北洋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由此开始。

5月20日，直军撤防开始行动，且请且退，分批北进，将主力布置在河南。5月13日，直军大将吴佩孚在郑州发出一个爆炸性的电报，分致反皖联盟各督，内容是：反对皖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吴佩孚第一次公开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这个电报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于这个建议在北方反皖联盟中引起阵阵骚乱，张作霖大为生气认为吴佩孚官卑职小，态度狂妄，但是吴佩孚是一个肯打硬仗，而其军队又能打仗，所以各路军阀对吴的过份言行，只好隐忍不言。

吴佩孚的这份电报得到南方人民团体的热烈欢迎。这时候，皖系无论在外交上、财政上、或是作战的战略地位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皖系的致命伤，一个是主张内战，不得人心；一个是亲日，全国人民痛恨日本侵略，莫不反日，皖系独倚日本为援，更是大失人心。

将领方面，皖系的徐树铮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段祺瑞因为依赖徐树铮一个，而导致直奉两系联合抗皖。皖系的将

领简直拿出不一个人物，只有徐树铮像样，所以段祺瑞在重要关头便离不开小徐。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6月17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暂时放弃他“西北王”的事业。这样，京畿一带直皖势力不分上下互相对峙着。

很具体地分析当时的局势，段祺瑞没有徐树铮，就没有那几年的煊赫声势，可是正又是因为徐树铮而使众矢集于一身，到了直皖决裂之时，形势已造成，想摆脱已是不大可能，因此非经一战不能解决。

当然，在最后5分钟，各方都尽量寻求一个能避免战争的有效方案。所以直皖战争爆发的前夕，平日笃信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的老官僚总统徐世昌感到左右为难，惶惶然想找出一条解决矛盾，挽救危局的方案，于是6月7日、14日、18日三次电召曹锟、张作霖和江苏督军李纯进京会商。岂知，李纯接电后，推说有病，婉辞拒绝。曹锟借口直军回防须加布置，无法分身。只有张作霖乘坐由两连卫队和四挺机枪保护的专车，以“和平先生”的姿态应召于19日到达北京，这是北京城的一件大事，北京全体军、警、政长军均前往车站迎接，其威风不减三年前他的亲家张勋带兵入京的盛况。张作霖一下火车声言：“目中无直系，只拥护徐总统。”其实他暗中一直联手曹锟，此举实为此地无银三百两。20日，张作霖谒见徐世昌，表示愿为直皖两系调停。21日，张作霖拜访了在直皖局势日趋紧张时请假隐居的靳云鹏总理，表示拥护内阁，请他留任（靳是张的女儿亲家，曹锟的把兄弟）。同时又去团河拜访了段祺瑞。22日，张作霖以“调停

人”的身份前赴保定，于是时局的重心顿然由北京转移到保定。

22日，曹锴在保定举行了各省督军代表会议，会议提出五项条件，请张作霖带回北京交涉：（1）解散国会；（2）靳云鹏回任国务总理；（3）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4）罢免国会三总长；（5）取消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这五个条件实际上是对北京的“最后通牒”。

23日，张作霖回到北京，段祺瑞当晚在团河设晚宴款待，段向张表示，他没有政治野心，并不想当副总统，愿意支持可以合作的北京以外的人士担任副总统，这等于暗示可以支持张作霖当选，段的目的是想促使张作霖保守中立，就可和直系一战。

张作霖见段祺瑞对保定条件迟迟不作答复，径自向段作别，说：“不解散国会，不撤换王揖唐，不动免徐树铮，吴佩孚在保定会议上有声明在先，作霖难任个人之职。”段竟暴躁地说：“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你们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同时必须罢免吴佩孚！”并要张作霖立即转告曹锴：“吴不过一师长耳，彼不服，尽可与吾兵戎相见，不畏惧也。”

同一天，保定转来消息，曹锴、吴佩孚对于北京方面的答复西北边防军改归段祺瑞直接统辖一事坚孚决反对，认为这是换汤不换药，皖系毫无诚意，不止是敷衍，简直是玩弄直系，非常愤慨，表示寸步不让。

张作霖原本是个大老粗，但粗中有细，智商很高，可是由他扮演和平使者，究竟是用非所长，何况直皖两系的成见

已深，双方距离根本无从拉近，他了解问题的症结在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这不正是直系的愿望，也是奉系的愿望，如果小徐解除兵权，其余条件谈何困难。可是，这是老段万难接受的，当年为了小徐，段不惜和他的恩师袁世凯反目，今天自然不会为了对直系让步而牺牲了小徐。小徐也没有牺牲自己挽救大局的胸襟，反而从中作梗，这种情形，张作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救了。

7月1日，曹锟以直军全体将士名义发出《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的声明，声称：“此次撤防，原为扫荡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恶感及敌对行为。”“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见，北洋原属一体，何有皖直之分”。这表明直系所反对的只是徐树铮，而不是先进泰斗段祺瑞，显然是一着政治上的妙棋，借以分化皖系的军事力量。

7月5日，段祺瑞在北京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武力讨伐曹吴。第二天，段在团河告知调停人张作霖，“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张作霖说：“这恐怕作不到吧！”段祺瑞咬牙切齿地说：“办不到也得办！你们办不到，我一定要办到！”而且极不耐烦地说：“你回你的奉天，不必管这儿闲事！”张听了一声不响就告辞而去。随即，张又悄悄离开北京，宣布“局外中立”！

8日，段祺瑞再次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开全体阁员及军政首要举行联席特别会议，个个慷慨陈辞，一片诉诸武力的呼声，其中交通总长曾毓雋声称：天下太平，人人都好，谁愿意打仗呢？现在光是交通部，不能报销的帐目就已经有两千多万，不打仗，事事都得依着曹锟、吴佩孚的办，

人家就指明要撤换咱们，到那时候，得办移交，请问咱们亏空的钱是督办拿出来呢？还是我们自己敷衍过去呢此语一出，举座激动不已。于是会议决定讨伐曹吴。并呈文总统。

段祺瑞及内阁分别是请要求惩办曹吴，徐世昌颇有难色，因为这个命令与前令大相径庭，所以不肯签署。于是，段祺瑞有恃无恐地派徐树铮带兵包围总统府，强迫徐世昌依允；并由边防军传出消息，如果免曹吴令候到晚间八时不下达，则皖军于次日上午在琉璃河首先开火。徐世昌在威迫情形下，不得已乃将内阁送呈惩办曹吴之令盖印发下，这时已是10日午前。保定方面获悉北京发表惩办曹吴命令后，军心愤激，一意主战，毫无回旋余地，调兵遣将昼夜不停，京保之间战云弥漫。9日，曹锟也在保定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任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从长辛店、杨村一带发起对皖军的进攻。布署完毕，曹锟即回天津，举行誓师礼，并以直军将士全体名义发出宣言书。吴佩孚宣言将亲率三军，直向北京，驱老段，诛小徐，设大本营于天津，设司令部于高碑店。

曹锟又致电北京外交使团，请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美、英、法西方三国迫使日本公使发表宣言，表示决不助段，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张作霖在7月9日由军粮城返回沈阳，即在10日致电段祺瑞勿再袒护徐树铮，表示“作霖忍无可忍，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民之倒悬”。11月，又致电曹锟，通知他已派第二十八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以张景惠为总司令，并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13日，便向北方各省发出《派兵入关参加

助直倒皖通电》。紧接着，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大批开进关内，分布于京奉、津浦两路和马厂、军粮城一带，摆开夹击皖军的阵势。

在此之前，段祺瑞自恃有日本人的支持，张作霖的“中立”，对战争前途表示乐观，吹嘘五天以内即可攻下保定，消灭直系曹吴，这是他自信奉军不会帮助直军，因为他认为张作霖虽然和徐树铮不和，但张和直系的曹锟、李纯也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段估计张作霖一定是在关外坐视成败。段还认为只要张作霖保持中立，他就有把握击败直军。故当他得到张作霖的声明和各地历数其罪状的通电，大惊失色，慌忙于14日压迫总统徐世昌发布“各军停战撤回原防”的命令，企图推迟战争的爆发，进一步作好迎击直奉联军的准备，但此时直皖大战已若离弦之箭。

7月14日，段祺瑞迫于情势，向“定国军”正式下达以直军的总攻击令，直皖大战正式拉开帷幕。

到17日这一天，直奉联军逼近团河，段祺瑞环宇四周，徐树铮兵败廊房，匿身六国饭店；吴光新大军溃散，被困武昌督署；段芝贵5万雄师，落了个仅以身免；曲同丰献刀投降，反口诘诘不已；国会要角纷纷作鸟兽散，四下逃遁；自己的四大台柱，全都完了，分明是众叛亲离，只剩孑然一身，固守危城，无异是唱那“李陵碑”的悲戏了。不过，这位刚愎自用、穷兵黩武的“上将军”毕竟是军旅出身，还算有点骨气，知道局势无可挽回，害怕被直军活抓遂逃回北京府学胡同自己的住所，而没有托庇于洋人的东交民巷。28日，段祺瑞辞职，撤消督办边防事务处、西北边防军名义，西北边

防军由陆军部收束解散。这样，在袁世凯死后，皖系控制中央的历史正式划上句号。

直皖战争，双方准备，前后准备三年之久，从冯国璋到京接任总统后即开始冷战，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特色——冷战期长，热战期短。直皖冷战了三年，可是真正热战起来不过三四天。尤其怪异的是，两系的阵容并不鲜明，真正敌对的，在皖系方面是段祺瑞和徐树铮指挥的边防军，在直系方面是曹锟和吴佩孚指挥的直军。其它各省的两系军人基本上是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因而战争的结果，所消灭的也只是边防军，第一个垮台的是段祺瑞。

从直奉联合到直奉战争的关键

直皖两系的政争由于皖系的失败而意外迅速地得到了解决，北方的天下终于落入曹锟、张作霖之手。深谙官道的徐世昌原以为这次段祺瑞的失败将是自己命运的又一次“柳暗花明”，“太上政府”既倒，自己以北洋派元老资格领衔，俨然成了北洋派的唯一领袖。其实曹锟、张作霖互争雄长由来已久，只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才结成联盟，共反段政。段祺瑞失败后，曹、张二人便顺理成章在继段之后北京政府的两个“太上皇”。如果直系军阀曹锟、奉系军阀张作霖不点头，北京政府对任何问题都休想进行。由于曹、张之间争权夺利，互不妥协的严重矛盾，在很多问题上，一个点头一个不点头，也使北京政府无所适从。因此北京政权不管表面上

的名信如何，此时实际上是由曹锟、张作霖二人共同执掌。徐世昌希望直奉两系军阀保持力量平衡，同时允许各省皖系军阀保持原有的地盘地位，造成北洋派“鼎足而三，共戴一家”的新局面，使他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的企图化做了一声春梦。

8月14日，曹锟和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组成的大队人马，分作两批由天津乘专列到达北京。但见车站上人山人海，鼓乐齐鸣。政府要员，各界代表几千人前来迎接。车站上黄土铺地，以迎接帝王之礼迎接这两位“功高望重”的大帅。车站到曹、张二人的临时馆舍，交通断绝，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沿途商家居住的门上，一律悬挂国旗；数以万计的市民或手执小旗，或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其场面甚为壮观。

场面的热烈并不代表实际上的争权夺利。

直奉两系早就为争夺地盘和进行政治分赃争吵不休。张作霖一再提出要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纳入奉系的势力范围内，以实现其“问鼎中原”的野心，并竭力保举复辟首犯、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任安徽督军，张景惠为山东督军，许兰洲为陕西督军。张作霖保举张勋失败后，又极力保举另一个儿女亲家鲍贵卿为安徽督军，但曹锟却极力保举冯玉祥继任。因冯玉祥是安徽人，是直系将领，由他继任，符合直系的愿望，适应当时安徽人民的要求。最后中央政府用其它利益作为交换。曹、张才同意由李纯保举的张文生任安徽督军，才算是平息此次政潮。

曹锟、张作霖来到北京，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费。大总

统徐世昌借口边防吃紧，答应给他们每人军费 1000 万元后，要他们早日回到任所，可是他们的要求未遂之前，谁也不肯轻易离开北京，最后经过总统和总理的苦口央求和劝说，分赃协定才算勉强达成。协定为：（1）撤消粤、川、湘、赣四省经略使，改任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巡阅副使；（2）任李纯为长江巡阅使，张文生为安徽督军；（3）王延桢调任领威将军，改任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 16 师师长；（4）直军各旅长一律提升为师长；（5）晋授张作霖为镇威上将军，王占元、靳云鹏、赵倜、陈光远为陆军上将，吴佩孚、王承斌授勋二位。由于曹锟在历年奖励中，已经得过勋一位陆军上将、虎威上将军、一等文虎章、一等大绶嘉禾章，无可再加，所以由总统徐世昌下令以“特令嘉将，以彰功绩”。

8 月中下旬，曹锟、张作霖、徐世昌、靳云鹏为了实现政治分赃，进一步协商，还签订了包括下面六项内容的密约：

（1）关于重大事件由政府征求曹锟、张作霖二人的意见。

（2）任用东三省以及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官吏时得采纳曹锟、张作霖二人的意见。

（3）政府对其它各机关人员的任命，曹锟、张作霖二人不得反对。

（4）如有不遵守中央政府命令的各省由曹锟、张作霖二人进行劝告。

（5）保证段祺瑞的生命和曹汝霖、陆宗舆的安全。

（6）新内阁发生动摇时，事前通知曹锟、张作霖二人。由这六项密约的内容可见，曹锟、张作霖乃是北京政府的两

个彻头彻尾的“太上皇”了。

联姻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外交工具使用。在这种婚姻中，父母具有代办其子女选择配偶的全权。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都是政治联姻的产物。民国初年，各派军阀更是大肆运用联姻这一工具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北洋军阀的鼻祖袁世凯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让段祺瑞与自己的养女结婚，让冯国璋与自己的家庭女教师结婚，藉以巩固他与北洋军中这两个最有力人物之间的个人联系。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权由曹锟、张作霖两人共同执掌。为掩盖两者之间的不睦和倾轧，保持暂时的亲密关系，在政略上，曹、张又采取了中国特有的婚姻政策，天津会议后，由靳云鹏作媒，把曹锟当时年仅7岁的女儿曹士英，许配给张作霖8岁的儿子张学思，两个“太上皇”又正式结了为儿女亲家。

曹、张共掌中央后，一时炙手可热，声势益隆。这样两位权倾当时的大帅结为亲家，其行聘的场面之宏大，不仅使当时所有的军阀政客、达官贵人瞠目结舌，且比专制时代的公侯驸马，尤要胜过几分，一时引得津门轰动，全国瞩目。

军阀之间争权夺利是其本性，任何联合都只是暂时的，包括基于政治目的的联姻。直皖战后，虽然曹、张平分秋色、共掌中央，但他们之间已是矛盾重重，且日趋尖锐化，只是曹锟认为刚刚打败皖系，还不宜与奉系马上决裂。尽管两派之间有裂痕，也企图以联姻的方式来弥合，殊不知曹、张二人的野心和欲壑决不是姻亲关系所能填平，对于他们，唯有财富和地盘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亲家是建立在集团和个人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勾结与利用，所以就很不可靠。当集团和

个人利益迫切需要的时候，姻亲关系就得让位于集团和个人利益，那么亲家也就不亲了。

在直奉上下同贺曹、张结为姻亲之时，唯有直系大将吴佩孚超然于外。平心而论，直奉联军对皖段一役的胜利，完全是吴佩孚的功劳。当时中外报章都交相赞扬，以为吴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帅才。辉煌的军事胜利，又急剧地膨胀了吴佩孚的个人野心。

吴佩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是想制造一个政治工具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料，此主张一提出，立刻便碰到了奉张的钉子，张作霖坚决反对，不惜针锋相对地当天发表通电，强词驳斥。这一件事大有闹成直奉公开分裂的危险，一时令曹锟左右为难，无法两袒，最后只好将吴、张的两份电报一概扣留。张作霖根本不把吴佩孚放在眼里，自以为奉军参加战争才是直皖战争谁胜谁败的关键。早在7月26日，张作霖到达天津的当天，就对一批西报记者公开宣称：他“所合作的是曹经略使。吴佩孚区区一个师长，我国师长多达数十名，即使我自己手下也有不少，让他们干预政治，那还成话吗？”徐世昌和靳云鹏如出一辙，认为吴佩孚职位卑小，言大而夸。靳云鹏还悻悻地说：“召开国民大会，简直是要革我们的命。”自称儒将的吴佩孚也一向瞧不起“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此次直皖之战，吴更认为张作霖仅在直系胜局已定之时，才出兵呐喊助战，区区战功，根本不配在战后与曹锟平分秋色，共掌中央。而且张作霖在直皖之战中除了收编皖系军队外，还将皖系所遗军械、重炮、辎重等物资及皖系的军械技术人员全部收回到沈阳。张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吴佩孚的

强烈不满，吴曾对直系军人说：“这是强盗行为，吾辈不可效尤。”

在枪林弹雨中粉碎了皖军，英名远扬的殊勋者吴佩孚在战后颇得人望之时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政治主张，以实现个人野心。但这样一个装饰品，当权人物看起来还是很危险的，当然要受到北京政府和奉张的一致反对。但吴佩孚没想到自己的顶头上司，自己以为肱股，视为心腹的曹大帅，也是南辕北辙，各自为政。当时曹锟见亲家张作霖对自己部下提出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他慌忙发出通电，声明：“吴佩孚所发通电，未得同意，应予撤回。”接着又电召吴佩孚速来津一谈。当吴佩孚到津后，曹锟又好言劝其少发表意见，而且告诫他说：“我们刚打完第一仗，难道又要打第二仗。”8月15日，曹锟再次电召吴到北京，并且说服他于16日前去谒见徐世昌，吴才对此绝口不谈。

吴佩孚在其声誉日涨之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居然又放了一次空炮，这才知道天下事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容易，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条件还未成熟，从此一心一意地埋头练兵，以扩大直系的军事力量。

直奉联手打败皖系，先前的北京政府也掉转方向。这样北京政府由谁组阁，就成为直奉两系军阀争夺的目标。

经过曹、张的几番争执，最后达成协议，总理一职暂让直皖战争前的原总理靳云鹏继续担任。因为靳云鹏既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又是曹锟的把兄弟，也还是吴佩孚最尊敬的老师和早年恩人。他们估计靳云鹏会把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这样双方都不会吃亏。大总统徐世昌对曹、张两人推荐

靳云鹏组阁不敢有异词，这样靳云鹏就在直奉军阀都想保持均势的局面下当上了总理。

事与愿违。由于直奉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存在着严重矛盾，所以很快就引起曹锟和张作霖双方对靳内阁的不满。曹锟认为靳内阁有亲奉疏直的倾向，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公平，欠直系军饷平均达半年以上，而欠奉系军饷仅两个月；张作霖“经略”蒙疆，从内阁那里获得了700万元，而曹锟“经略”陕西，只拿到100万元。直系军阀对这个内阁很不满意，曹锟的兄弟曹锐曾当面骂靳云鹏：“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张作霖则认为靳内阁偏向直系，指责内阁在升官分爵上不公平。张企图在长江流域安插自己的势力，可是靳云鹏慑于舆论，不敢任用那曾扮演了一曲复辟帝制丑剧的张勋。再加上长江流域一带原直系势力强大，所以靳内阁不敢秉承张作霖的旨意，相反任用了曹锟推荐的齐燮元为江苏督军，尤其使张作霖不满的是内阁竟任命吴佩孚兼任两湖巡阅使。张作霖认为这是靳内阁有意帮助曹锟扩展势力，故意与他为难，看来这个儿女亲家也靠不住，决心倒阁。

正当这时，原袁世凯的秘书长梁士诒看到直、奉两系军阀都对靳云鹏不满，抓到靳内阁在财政上的严重危机，大肆活动。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因助袁世凯称帝被通缉逃到香港，这次直皖之战，皖段一倒，他立刻大肆活动于曹、张之间，力图东山再起。

梁士诒先派人到张作霖处游说，许诺自己组阁后一定听命于张作霖，给奉军多筹军饷，并联络南方合作倒直。张作霖见梁士诒送来了这么丰厚的“见面礼”，表示可以考虑。他

在被张作霖提名后，就四处放风，表示自己组阁后，将迅速筹发直军军饷。由于梁士诒慷慨承诺，曹这时也答应暂让这位爽快的“财神”上台过把总理瘾，这样由张作霖一手扶植的梁士诒于1921年12月24日正式当上了内阁总理。总理就职当天，各军阀发来的贺电堆成了一座小山，可梁士诒翻来翻去，独不见吴佩孚的贺电，诚惶诚恐中求助于张作霖，张胸脯一拍，说道：“你尽管放手做去，不必多顾虑，一切问题自有本帅做主。”曹锴起初还认为梁士诒会兑现上台前的许诺，给直军多筹军饷，可万万没想到这个“财神”耍权术竟耍了老师头上，曹锴恼羞成怒，抓住梁内阁的亲日卖国政策招致全国反对这一时机，授意吴佩孚联络直系各省的督军，发动了一场讨梁内阁的“电报战”。1月5日，由曹锴的心腹大帅吴佩孚首先起而攻之，电文中大骂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

直系诸将在曹锴的授意下对梁士诒内阁大肆攻击，一向不甘示弱的张作霖此时决定还击。他一面对外施展“远交近攻”的手法，不停地与皖系军阀卢永祥加强联系，勾结下台的段祺瑞及其手下部将；另一方面派人至桂，联络孙中山，试图利用孙的革命威望，作为讨伐直系的政治资本，酝酿组成张、段、孙“反曹三角联盟”。同时张作霖还利用河南都督赵倜对吴佩孚的不满，大施拉拢之计。另外，张作霖为扩大奉军，派人四处招兵买马。接着张作霖就以维持京畿社会秩序为名，增派奉军入关。

面对与张作霖的尖锐矛盾，曹锴极想一战就打垮奉系，自己独霸政坛。但是，他考虑到直皖战争刚结束，如果马上

对奉系用兵，恐怕没有十足的把握取胜。因此，尽管张作霖已发兵入关，他还是想暂时不要急于和他交战，先维持一段时间的双方均衡局面，待自己的部队养精蓄锐后，再和奉军决战沙场。基此考虑，曹锟便到处放言，声称不愿和张作霖兵戎相见，亲家还是以和为贵。

究竟“联奉”还是“抗奉”，直系大将吴佩孚与曹锟的分歧很大。吴佩孚认为对于“奉匪”张作霖的公然挑衅，此时直系与其决无和解之理，主张痛击奉军。

直系首领曹锟虽然在直皖战后成为北京的太上政府，颐指气使，权倾中外。但大家都知道，曹所恃的是吴佩孚。直皖战后吴佩孚的声望如旭日东升，其发言权有时还超过了曹锟。吴佩孚驻节洛阳，洛阳几乎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只要吴一发言，总有很多人叫好，鼓掌，随声附和。坐镇保定的曹锟虽然倚赖吴佩孚，可是对吴佩孚的洛阳局面也存有戒心。尤其是曹锟的左右，时时把吴佩孚的专横向曹进谗。张作霖虽然态度强硬，气势汹汹，但考虑到此时奉系和孙中山及皖系的反曹联盟还不够成熟，尤其孙中山的北伐军正受制于陈炯明而不能出发，此联盟还不能起配合作战的作用，张作霖只得捺住火性，等待时机。对曹锟的“投之以桃”，他决定“报之以李”，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聘。曹锟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因防地逼近而引起冲突。张作霖也表示同意，就派张景惠主持关内奉军撤退事务，这一协议使直奉两系的紧张局势大见缓和。

此后不久，南方的孙中山又表示可以出兵北伐，于是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又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

批奉军人关。吴佩孚接到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曹锟为了和缓局势，在3月8日张作霖的47岁生日之时，他又派其弟曹锐以“祝寿”为名，再到沈阳乞情。张作霖才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条件：（1）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2）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3）梁士诒消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这时已下定决心要和吴佩孚拼一下，如果吴佩孚敢于反对梁士诒复职，他就以“反抗元首”、“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讨伐。

张作霖一面和曹锟谈条件，一面开始调兵遣将，从4月10日起，奉军络绎不绝地开进关来。直系诸将对于曹氏兄弟的一再退让与不抵抗早已表示极大的不满，这时奉张的大军又已压境，曹锟这才明白张作霖已下定决心，此时退让已无补于事，如再不准备交战，现有的地位也将难保。

4月中旬，直奉大战在京津地区展开。仅仅六天，以奉军惨败而终。张作霖逃回东三省“自治”，从此北京政府唯曹独尊。

张、段、孙及直联盟最怕自己人

1922年4月直奉首战，曹锟、张作霖两个太上皇斗法，结果气走了张作霖。北京政权遂为曹锟独自窃据，这时直系人物欣喜若狂，纷纷狂呼“直系即中央”。

曹锟本想立即举行行政变逐走徐世昌，自己直接跨进总统

府，但吴佩孚不主张这样做，他提出要“恢复法统，重开国会”即恢复民国约法，召集民国元年被段祺瑞解散了的国会。吴认为这样做对直系有利，因为孙中山在南方借口护法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如果恢复法统，南方政府就将失去根据而不能存在，可以不战而胜；恢复民国元年的国会后，欢迎黎元洪复职补足总统任期，这样国会和总统都可以成为直系手中的傀儡。

黎元洪这样又当上了总统。但也仅做了几个月的总统，即被曹锟一脚踢开，迫不及待的曹锟依仗自己的权势，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这是曹锟一生中最鼎盛的时期。

直奉首战只打了6天，张作霖就败退了，当时吴佩孚很想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府，但被曹锟止住了。当然，曹锟此举并不是想放虎归山，而是有多方面的考虑：一是他害怕东三省内强大的日本势力。因为张作霖一向依附日本，“日本势力所及之处，就是张作霖的安全地带，他是以日本的势力作基础而君临东三省的。”再说，曹锟手下的那10万军队经与奉军这一战，个个精疲力尽，已是强弩之末，急切需要休整。三是曹锟也想先统一关内与他对抗的南方孙中山革命军和皖系余孽，然后再出兵关外，与张作霖决一雌雄。

但是他的和奉政策很快就失败。在此情形下，他授意吴佩孚在洛阳加紧练兵，积极备战。

吴佩孚洛阳练兵，有声有色，成效很大，加上又购买了大批外国军火，使得直军如虎添翼，对此曹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心想这回张作霖即使要雪耻，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矣！

与直系整军经武的同时，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了的张作霖，退回东北后，宣布东三省“自治”，并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与北京中央政府脱离关系。

张作霖在关外卧薪尝胆两年多，练成了精兵20多万，满以为这次能与曹锟的部队一决高低，但一看上海大陆电影公司拍摄的《吴佩孚洛阳练兵实况》的纪录片，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张作霖绝没想到这两年曹锟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军队的训练，直军的战斗力不但没有减弱，相反，由于吴佩孚带兵有方，外加大批外国军火装备，直军的战斗力也大大增强，和他苦练两年多的奉军相比，其强悍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张作霖以前是门缝里瞧人——看扁了曹锟。这次可得重新估量这位曹亲家。

曹、张以一对一，张作霖并无优势，更没有必胜的把握，但为雪耻，张作霖决定联络各方反直力量共同倒曹。

张作霖首先想到了联络直皖战争中曾为曹锟手下败将的北洋元老段祺瑞。1921年直皖之战后，段祺瑞住进了天津日租界。虽然“段老虎。此战被曹锟打下了台，但其虎性难改，仍窥视着伺机而动。他身边的一批失意政客也马不停蹄地为其四处奔走，八方串联。心怀鬼胎的日本人还专门为其架设了一部与各方联络的电台。直皖战后，在曹锟与张作霖为争夺地盘与权力产生了矛盾时，段祺瑞就曾乘隙而入，暗中与张作霖联系，并授意皖系余党浙江督军卢永祥适时北上援奉。

虽然直奉首战时，段祺瑞没能帮上忙，但张作霖仍很感激，对他也念念不忘。两年的整军经武，奉军的战斗力已是今非昔比，但张作霖为确保再战曹锟时的万无一失，他决定

联段，“共倒曹、吴”。一时间“张段之间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推倒曹吴”。

张作霖一面与皖东段祺瑞、卢永祥联络，同时还派人前往广东革命政府与孙中山接洽。他希望联络孙中山合力讨伐曹、吴。孙中山从南方出兵北伐，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张作霖则由燕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

孙中山此时心里很矛盾，作为一名革命者，他一贯主张与各派军阀作坚决的斗争，但要战胜军阀离不开军事斗争，多年的革命失败，孙中山对此感受颇深，但他所拥有的军事实力与他的奋斗目标又相差甚远。凭借当时自己控制的4万缺饷少械的旧军队来消灭南北军阀，统一中国，谈何容易？注重军事斗争而自身军事力量又不足，也只能联络一派军阀来对付另一派军阀。

张作霖“联孙”是想利用孙中山的革命威望，在南方组织军队，来牵制和分散曹锟的兵力，以减轻奉军入关后的压力。鉴于张作霖频频遣使来访，孙中山从1923年秋也不断派张继、宁武、汪精卫等人到沈阳回访张作霖，进一步协商讨曹大计。

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军不但兵力少，而且武器装备差，张作霖把其纳入反直联盟后，又担心他们难以完成在南方牵制曹锟军队的重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张决定对孙中山予以援助，来增强其战斗力。有一次张作霖就给了汪精卫50万元，以后陆续又给了几十万。张作霖还曾从海路运送枪枝3万条；子弹30万发，银洋20万元，押送到广东。为报两年

前的一箭之仇，张作霖这次可是慷慨解囊，毫不吝惜。1924年孙中山又派人抵沈阳与张商讨讨曹计划，最后由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在沈阳举行“三公子会议”，正式成立了以倒曹为宗旨的“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反直三角联盟”。

曹锟“联孙”倒奉皖努力的失败，与张、段、孙反直联盟军兵戎相见就指日可待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曹锟一时束手无策，唯有一日数电，令吴佩军在洛阳加紧练兵，以防联盟军发动突然进攻。

但大战爆发之际，他却忽视了直系内部冯玉祥等将领与吴佩孚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和与矛盾。正是这一疏忽，导致他后来沦为部属的阶下囚，也从此结束了他40多年来的政治与军事生涯。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1882年生于直隶青县兴集镇，幼年移居保定，家境十分困苦。冯玉祥12岁便入伍当勤务兵，1895年接受正式军事训练，1902年进入袁世凯卫队第三营为正兵。1914年始任北洋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该旅在1917年7月张勋复辟时被任命讨逆军先头部队，攻入北京，击毁辫子军。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于是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段宣布护法军政府为“叛逆”，又令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战旅南下征讨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不料，冯玉祥南下至浦口后，不再前进。在李纯的支持下，遂通电罢战言和，惹得老段大怒，于1918年2月25日下令免除冯的旅长职务，交曹锟查办。曹锟见冯玉祥性格耿直，敢作敢为，很有军人风范，顿生爱才之心，他

接连几次到段祺瑞处去为冯调解说情。段见曹锟几次三番地前来求情，最后勉强准许冯玉祥留任，并命令冯开往湘西驻防，兼任常德镇守使，从此冯部归曹锟管辖，成了曹手下的一名大将。

曹锟对冯玉祥有知遇之恩，按理冯玉祥应该知恩图报，尽力效忠。可事实上冯玉祥虽属直系军阀集团，但对直系的不满由来已久，特别是吴佩孚、李彦青等人不择手段地对其排挤、打击，已使冯忍无可忍，这次终于来了个总爆发。

冯玉祥和直系大将吴佩孚的恩恩怨怨可以追溯到1922年，当时冯玉祥由于陕督阎相文自杀而被任命为陕西督军。正当冯埋头治理陕西军政的时候，直奉矛盾已无法解决，不得不以兵戎相见。1922年直奉之战即将爆发时，吴佩孚急电冯率全师及陕军第1师赴河南坐镇，于是冯舍弃了督军之职，赶赴河南，及时消灭了叛直附奉的河南督军赵倜，稳定了吴的后方，立下了直奉之战的首功。曹锟未和吴佩孚商量，就下令冯玉祥继任河南督军。曹锟的这一任命使向来热中豫督的吴佩孚的把兄弟张福来大失所望。吴佩孚也很不满意。于是吴佩孚把河南督军公署科长以上僚属全部派定，使冯玉祥变成了光杆督军。一时间冯、吴之间关系很紧张，以至于洛吴、汴冯虽在一条铁路线上，鸡犬相闻，但往来甚少。

由于冯吴双方落落寡合，成见已深，以至冯玉祥每次谒见，吴佩孚都故意装疯卖傻，嘻笑怒骂，使得冯玉祥啼笑皆非，欲哭无泪。

冯玉祥与吴佩孚间的关系恶化至此，已决无继续合作的可能，唯有正式决裂。曹锟见手下的两员大将成见已深，决

定调离冯玉祥出豫，以避免再发生内讧。这样冯玉祥被调任陆军检阅使，率部驻防北京。在离豫时，吴佩孚只许冯玉祥带自己所部 11 师到北京，其余 2 个混战旅留驻河南。但冯集中许多车厢，将自己的 1 个师、3 个混成旅连夜开出河南，使吴无法迫留。从此，冯、吴结下了深仇大恨。

冯玉祥为抵制吴佩孚的排挤和打击，他又暗中联络了直系内部的其他反吴将领，孙岳便是其一。

孙岳本系老同盟会会员，清朝末年就曾在曹锟的第三镇充当下级军官，因参加滦州起义被迫离职，当时曹锟对其有袒护之心，就设法掩护他逃往了南京，躲过了袁世凯的追捕。袁世凯称帝倒台后，他又重新回到曹锟的麾下。在直皖战争中，孙部作战英勇，战果卓著，深获曹锟信任。战后，孙任曹锟卫队旅旅长，成为了曹的亲信幕僚之一。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孙岳被任命为直军西路总指挥。战后，其他师旅大小军官均都升迁，唯独孙岳未予晋职。后来曹锟念其有功，任命他为“大名镇守使”，驻防大名和保定等地。本来“大名镇守使”之职就是虚名，可吴佩孚还趁机抽走了他的一个步兵团，致使孙岳对吴愤愤不平。

冯玉祥回师北京

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激烈鏖战，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可西线冯玉祥的军队此时却在从北京到古北口的路上慢悠悠“急行军”。冯玉祥在作战上向来主张兵贵神

速，先发制人，这次由于心中有“鬼”，便一反常态，出兵拖拖拉拉。冯玉祥是在吴佩孚四照堂点将时被任命为讨逆军西线总司令的，乍一看，这次部署兵力时吴佩孚很重视冯玉祥，其实不然，吴是欲借机陷害与其交恶已深的冯军于绝地。因为西线的冯军要走古北口以趋热河，那条路地形险阻，许多地方为不毛之地。路途如此艰险，吴佩孚却不给冯玉祥部发一分饷。

另两个反吴同盟孙岳、胡景翼也早对吴佩孚不满，促使他们下了最后的决心，决定借出兵张作霖之机，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

吴佩孚对冯玉祥一直存在戒心，一开始他就不想任冯为西线总司令，但曹锟却极力保荐冯玉祥。吴佩孚为了预防万一，就派第二路援军司令胡景翼监视冯，要胡发现冯有异动，可就近解决之。他哪里知道，胡早已与冯有密约在先，所以胡把吴的话和意图原原本本告诉了冯玉祥，这更加坚定了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决心。

留守后方的蒋鸿遇几乎天天把总统府的情况和前方的战局向冯汇报。这天，蒋又拍来一封急电：“前方战事紧急，吴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3师悉数调往前方增援！”第3师是吴佩孚的看家本钱，把他们留在京郊，也是为了怕北京出事，可是前线告急，吴不得不把第3师也派上前线，这一来，北京防守就完全空虚了。

10月22日晚，回京的冯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北京所有要害部门。

冯军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如此重大的行动竟然在一夜

之间神不知鬼不觉的办了个妥帖。墙外已经天翻地覆，而红墙深内的曹锟却浑然不觉。这也难怪他，前些天发来的总是直军阵地失守的战报，又加上天气变冷，身体不适，所以心里一直郁郁不乐。今天一早收到冯军已向奉军后方顺利突进的喜报，他心里才如释重负。为庆贺冯军的胜利，这天晚饭时曹锟特意多喝了几杯宫廷御酒，此时他正伴着美酒的香醇酣然入梦。

23日黎明，冯玉祥也亲自率军回到了北京。早在回师途中，冯就得知政变已经成功，总统曹锟已被囚。北京政变成功后，冯玉祥便在25日召集的军事政治会议上宣布：凡是参加政变的各部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以示国民效用。会议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会后冯、孙、胡三人还联名发表了呼吁和平的通电。

23日上午8时，吴佩孚在秦皇岛的总司令部召开了前线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会上，吴认为前方军事处于胶着状态，目前不会有多大变化；冯玉祥的军队不堪一击，救曹保权要紧。因此他主张山海关方面对奉军军事，可暂交张福来、彭寿莘两人负责，自己则速回天津，布置对冯作战，回救北京政权和保证津浦路畅通，以达到一举灭冯，并配合江、浙两省北运增援的直军杀出关外的目的。按吴所说，就是：“你们将各地守好，我回去杀冯玉祥去。等我回来，再直捣黄龙。”

23日晚8时，吴佩孚乘车直奔天津而来。

冯玉祥早就料到吴佩孚不会就此罢休，他决定先下手为强。23日晚，冯特派孙岳又到延庆楼，逼迫曹锟解除吴佩孚

的兵权。冯玉祥借曹锟的大印解除了吴佩孚的实职，不料竟被吴批之以“伪令”二字驳回，于是冯开始调遣部队分赴前方。

10月底冯玉祥趁吴的军队刚进入阵地之时，下令在张庄、杨村、北仓一带分头先发制人，发动进攻。由于吴军刚从直奉前线抽调下来，本已疲劳不堪，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冲击和包抄下，更是不堪一击。

与此同时，山海关方面的战事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此时直军主力部队由于内乱外攻，军心已经动摇，而奉军郭松龄部则趁机全线出击，切断直军后方通路，把直军主力包围在山海关和秦皇岛之间。面对奉军的凶猛攻势，代理总司令张福来则显得束手无策，就这样曹锟苦心经营多年的直系军阀在此战中彻底溃败了。

吴佩孚在奉军、国民军的夹攻下已走投无路，只好率领溃败的残部 2000 余人浮海南下，寻地安身。

曹锟被囚后，由亲冯的黄郛内阁摄政。冯玉祥没想到这只是他一厢情愿，不但奉系张作霖不买黄郛内阁的帐，就是各省直系军阀也都通电不承认这个政府。

冯玉祥被迫妥协，最后由他与张作霖、卢永祥、胡景翼、孙岳五人以联名推戴的方式，于 11 月 15 日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

直皖战后曹锟、张作霖曾共同执掌过北京政权，但合作不到两年就闹翻了脸。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又与张作霖妥协，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总执政，同样冯、张间的妥协也不会长久，很快奉张与冯玉祥就起了政争。

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军李景林最先交火，始而李景林部不敌败退，继而李景林又与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发动反攻，国民军由胜转败，在天津周围与直鲁联军打起拉锯战来。

不久奉军郭松龄部阵前倒戈反张，继之又是一声混战。倒戈的郭松龄部抵挡不住张作霖的大军猛攻，结果全军覆灭，张作霖为了报复冯玉祥勾结郭松龄反奉之恨，乃与吴佩孚、阎锡山达成联合讨冯协议，出动大军攻冯。冯玉祥为了保存国民军实力，于1926年1月1日宣布取消国民军名义，通电下野。

冯玉祥下野后，把冯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鹿钟麟等人，此时的冯军在讨冯盟军的合力攻击下，处境已十分不利，被迫由天津退守北京。段祺瑞见冯军人少力单，为保住自己的地位，也欲讨好吴佩孚，他决定配合做讨冯联盟的内应，一举消灭驻京的冯军。

正当段勾结日本人蠢蠢欲动之时，鹿钟麟决定先发制人，率部从前线回师北京，想拘禁段祺瑞，哪知段早已闻风而逃。段祺瑞执政府就此宣告垮台。

鹿钟麟赶走了段祺瑞，为了分化讨冯联盟，交好吴佩孚，他决定立即释放曹锟，并准其搬回新华宫。被囚一年多的曹锟终于恢复了自由。

曹锟恢复自由没几天，便发出通电，告诉各省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曹通电的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恢复总统职位。没想到十多天过去了，竟没有一点反应，曹锟起初很纳闷，后在旧部的点拨下，他才猛然醒悟过来，原来大家都在观望子玉老弟的态度。于是曹锟赶忙派王坦去征

求吴佩孚的意见。

吴佩孚配合张作霖把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后，根据奉吴同盟条约，由他负责主持改造北京政府。此时吴佩孚只想恢复曹锟当政时所颁布的宪法，并不想拥他复位。

吴决定由1924年9月曹所任命的颜惠庆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所以当王坦就总统复位之事前来征求意见时，吴佩孚的反应极为冷淡。他对王坦说：“三爷这人你不是不清楚，在前台他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到后台呆着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

曹锟寄予最大希望的子玉老弟都是这种态度，他觉得这次复位的希望很渺茫了。吴佩孚的犟脾气曹锟再清楚不过了，知道再去求他也没有用，只好放弃复位的幻想。

5月1日，曹锟按照吴佩孚的意思，正式发表通电补行辞职。曹锟通电辞职后，即从中南海延庆楼迁出，移居到羊市大街。中南海新华宫用黄土铺地迎来的新主人，只在那儿寄住了短短的一年零二十几天时间，就匆匆告辞了。

曹锟创下了民国总统任期最短的纪录。

戊戌维新的百日纪事

维新派的上台

前面说过，康有为领导的保国会成立后不久就涣散。这固然是因为遭到某些当权派的攻击的原故，但同时还因为这时康有为已经打通了一步登天的途径，不再需要这种群众性的组织了。他的政治活动的着眼点在于争取皇帝赞成他的主张，利用皇帝的权力来推行他的主张，这点，似乎已经开始可以做到。

由于都察院的一个官员高燮曾推荐，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受到了恭亲王奕訢的阻拦。恭亲王说，按照老例，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能接见。光绪皇帝只好下令要大臣接见康有为问话。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邀到总理衙门，同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几个大臣进行了一次关于变法问题的辩论。康有为向他们申述了他的主张，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决不能一成不变地照行“祖宗成法”，必须酌情改变，实行“新政”。李鸿章、荣禄反对他的主张。只有同光绪皇帝比较亲近的翁同龢采取同情态度，他向皇帝报告了谈话情形。这时皇帝已经读到了前一年十一

月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据梁启超说，这个上书中所说的一旦亡国，皇帝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甚至可能像明朝末代皇帝那样吊死在煤山上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皇帝。但是光绪皇帝仍然不敢违反老例召见康有为，更不敢破格擢用他，只是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搁，并且要康有为呈送他所著书。

康有为在正月初八向皇帝上了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他的第六次上书。他又把他所撰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记》送呈皇帝，意思是要皇帝以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俄国的彼得大帝为榜样。接着他又上了第七书，其中着重论述彼得大帝是如何敢于向西方学习的。后来康有为在一首诗中说：“忧时七上皇帝书”，指的就是他在直接见到光绪皇帝以前，也就是百日维新以前的这七次上书。

四月二十四日（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这可以说是一篇政治宣言，在这里，说到了“变法自强”，并有肯定“西学”的话。五天后，皇帝在颐和园内召见康有为。其所以不在紫禁城内而在郊外行宫内是为了使这次接见带有非正式的性质，以免过于违反“老例”。光绪皇帝虽然表示接受康有为的主张，但只能授康有为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样一个六品衔的小官，不过，同时又给了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这样，总算打开了他和皇帝之间的通路。在康有为受到召见后半个月，梁启超也以举人的身分被皇帝召见，他也只得到了六品卿衔，受命办理译书局事务。

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发过若干属于所谓“行新政”的诏书。在这以后，这一类的诏

书又陆续不断地大量发出，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这些诏书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撤除无事可办的衙门，裁减冗员；废除满人寄考特权，准许自谋生计。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改变武举考试制度，精练陆军；筹办后代厂；添设海军，培养海军人才。属于文教方面的主要有：开办京师大学堂，并要全国各地设立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等等。但诏书的发布并不等于事实上的执行。任免各省督抚的权力，并不操在光绪皇帝，而操在慈禧太后的手里。各省督抚对于小皇帝要他们办的和要他们提出意见的新政事项，一概都置之不理，或者作些模棱两可的回答。

光绪皇帝通过分颁布的诏书所要实行的新政究竟是什么性质，将在后面去分析。无论如何，这些诏书总是给人以一种印象；传统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不能照旧不变了。维新派的两个巨头康有为和梁启超相继受到皇帝接见，至少使维新主张不再被认为非法。这在全国的官绅和知识界中不能不引起巨大的震动。议论新政，高谈变法，成为一时的时髦的风气。在光绪皇帝广开言路的号召下，呈送给皇帝的条陈纷至沓来。七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还下了一道上谕说：“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

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这是说要向西方学习。又说“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这是说一定要变法行新政。又命令各省各州县官员要切实进行宣讲，务必使“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做到“家喻户晓”。这道诏书是谭嗣同起草的，所以维新派的色彩特别浓厚，但这时已经快到百日维新的末日了。

康有为在颐和园进见皇帝时，光绪皇帝说，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但他无权去之，也势难尽去。康有为替皇帝划的策是：“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康有为后来把他的这种主张概括为：“吾向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也就是说：不是革旧更新，而是留旧增新。他所希冀的只是靠皇帝之力让维新派逐渐挤进权力里去，在旧的官僚机构身帝设立一些并行的新机构，逐渐地使实际权力落到新机构的手中。这种方针只是极其懦弱而幼稚的梦想，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在百日维新中，从中央到地方全部原有的官僚机构丝毫未动，而且守旧势力的总头子慈禧太后还俨然驾凌于皇帝之上，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点哪怕是小小的改革，也只能是空谈，而不能真正做到。

像光绪皇帝不断发上谕一样，康有为也不断地上奏折。据他的学生麦仲华说：“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道”。在上奏折最勤的期间，几乎每天发出一封。这些奏折绝

大多数毫无成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渐渐地感到不耐烦了。他向哥哥说：“办此琐事无谓”，“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

七月二十日，光绪皇帝下令赏给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这算是实行康有为所说的擢小臣建议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四个人虽然只是以“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的名义进入军机处，但毕竟这是处于靠近皇帝的地位。光绪皇帝把各方有关新政的奏折交给他们审阅，并由他们草拟招书。一时这四个人在官场上被视为颇有点权势的人物。不过时间很短，只有十五天，百日维新结束，他们都掉了脑袋。

对于军机四卿的政治面貌，值得说一说。

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是世家子弟，他的父亲谭断洵官至湖北巡抚。他在十九岁时因父亲做官而到兰州，继又入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幕府。以后近十年间游历各地，除西北几个省外，到过直隶、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等省，对于国势民情有了很多见闻。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在上海读到了许多翻译的西书。受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更加发愤提倡新学，主张变法。他虽不是康有为的学生，但非常佩服康有为。他的政治思想在有些方面比康、梁激进一些，例如，他勇于揭露君权的残暴，敢于说：“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不过他自己并不能做叛逆者。他在思想上是个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过渡人物。他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办理新政，担任南学会的学会，因而有点声望。他鄙薄

科举，他的父亲花钱给他捐了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光绪皇帝在宣布实行新政后就召他到北京。

四卿中最年轻的林旭（1875—1898），福建侯官县人，是有名的洋务派官僚两江总督沈葆楨的孙婿，考中过举人，并入赘得内阁中书的官职。他当过坚决反对维新的守旧大臣荣禄的幕僚。但他对康有为很折服，拜康有为为老师，康有为也想利用他同荣禄拉关系。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在京城倡办闻学会，又为成立保国会奔走甚力。入军机后，他所拟文稿比较激进，与谭嗣同同为顽固守旧的官僚所深恶痛绝。

还有杨锐（1857—1898）和刘光第（1859—1898）二人则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密切关系的人，张之洞让湖南巡抚陈宝箴把他们推荐给光绪皇帝。这时张之洞是当权的洋务派领袖人物中最活跃的一个。在康、梁因主张变法维新而声名渐起的时候，张之洞曾拉拢康、梁，想使他们为己所用。前面已经说过，他还插手康、梁在上海办的《时务报》。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已越出洋务派所许可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设法破坏维新派的舆论机关。在上海《时务报》馆中掌管财政、人事权力的汪康年在光绪二十三年底挤走了梁启超，改出《昌言报》。汪康年的后台就是张之洞。《昌言报》在汪康年主持下不再刊载维新派的言论。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容许湖南巡抚陈宝箴实行大体上还是洋务派所容许的新政，但他认为《湘报》的言论越来越难以容忍了。他通知陈宝箴：“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湘报》被迫停止发表议论文章。光绪皇帝在下诏定国是以前，曾经诏令张之洞入京襄助，这是得到慈禧太后同意的。虽然由于官僚

集团内部倾轧和其他原因，张之洞没有到北京，仍旧留任湖广总督，但他在百日维新中是插了手的。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可以说就是他的代表。四川绵竹县人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他在考中举人后任内阁中书。张之洞资助他长驻北京进行活动，通过他随时了解京城的政治情况。甲午战争后，他从忧国救亡的立场出发，先后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保国会，但其实并不是个维新派。他入军机处与林旭在一起工作时，往往认为林草拟的文稿过激，强令易稿四三次，而他自己从未上过一折。四川富顺人刘光第在人军机前任刑部主事，虽然也曾参加保国会，但他标榜自己“无新旧畛域”，采取调整的态度，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

由此可见，光绪皇帝所起用的军机四卿，虽然可以说是为辅佐皇帝主持新政而组成的一个工作班子，但这其实是洋务派和维新派联合组成的。其中，站在维新派立场上的是谭嗣同、林旭二人，而张之洞的人也有两个。

所以在百日维新中，维新派好像是上台了，但这种上台其实是一种虚假的现象。远不能说，维新派已经真正参与了政权。

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

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究竟执行了什么路线，或者说可能执行什么路线，这是值得考察一下的问题。

由于光绪皇帝表示了对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情，而发

动政变扼杀百日维新的慈禧太后在一举粉碎康、梁、谭一派人的同时，把光绪皇帝看做维新派的保护人而加以贬黜，还由于失败后的康、梁竭力把光绪皇帝歌颂为他们的理想的圣主，于是读历史的人往往认为光绪皇帝是一个维新派的皇帝，也就是说，这个皇帝是代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企图实行一种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路线，只是遭到了惨败。

为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的许多新政的诏书的内容来看，拿光绪皇帝对于维新派向他提出的具体主张的态度来看，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区别，前面已多次说到。前者基本上是同买办资产阶级相结合的封建大地主政治路线，后者是软弱的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形式上是接受了康有为这一派的主张，实际上他还是在走张之洞这一派的路子。在组织上，他主要也是倚重洋务派，而不是依靠维新派。他在百日维新一开始时就想把张之洞召入京城，他的军机四卿中就有两个张之洞的人，那都不是偶然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皇帝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维新派的皇帝，而倒是可能成为一个洋务派的皇帝。光绪皇帝之所以如此，不是由他个人意志决定的。作为维新派的社会基础的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处于那样软弱的地位，对封建地位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依附关系，不能独立地打开局面，他们就不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皇帝。维新派只能在幻想中把光绪皇帝打扮成他们自己的圣主，但不能在现实中创造出这样一个皇帝来。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上皇帝第四书》中都提出了召开国会的建议，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宪法的要求，并在奏书中多次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这些都是维新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纲领，也是维新派和洋务派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康有为所说的国会虽然只是一个民选的咨询机构，谈不到为资产阶级争取立法权力，可是，他的这种主张，在百日维新的上谕中没有只字的反映。光绪皇帝允许资产阶级发言的限度，仅仅是“士民有上书言事者，……不准稽压，倘有阻搁，即以违旨惩处”。过去，士民（包括资产阶级）连上书的权利也没有，现在可以有这点权利了。但维新派对这道上谕的意义竭力加以渲染。梁启超说：“即今日全世界之国，号称最为文明者，这不闻举国士民皆可上书于其君，而惟我皇上有之，以从古最塞之国体，一变而为最进之国体，呜呼！有圣主如此，宜上下读诏书者莫不流涕也”，“州县递折，本朝已无，至于士民上书由道府代递，……此则中国四千年尧舜禹汤文武所未有者矣。呜呼！非圣主而能如是乎？”其实，仅仅允许士民上书言事，离“最为文明的”“最进之国体”，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康有为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建议是：“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这是《应诏统筹全局折》和《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的中心内容。这个“制度局”所要起的作用，在后一个奏折中说得较具体，那就是要对变法的“规模如何而起，条理如何而详，纲领如何而举，节目如何而备，宪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损益

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删，若者宜改，全体商榷，重为草定”。制度局下面又设法律局等十二个局来分管各事。很明显，康有为想使制度局成为一个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领导机构。康有为还认为：“今欲行新政，但听人言，下之部议，尤重者，或交总署枢臣会议，然大臣皆老耄守旧之人，枢垣总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其议政详善，必不可得也”。这就是说，原有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没有用处，因此要添设制度局，由维新派来掌握中央立法、行政权。

康有为关于制度局的第一次奏折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送上去以后，光绪皇帝交给总理衙门大臣“妥议具奏”。拖了两个多月，庆亲王奕訢（他这时是主持总理衙门的大臣）复奏，说些空洞的官话，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皇帝又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重议，“毋得空言搪塞”。但是，仍遭到这些大臣们的坚决抵制。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于六月十五日复奏，提出了些所谓“变通办法”，把康有为的建议在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说：“皇帝延见廷臣，于部院卿贰中，如有灼知其才误，深信其忠诚者，宜予随时召对，参酌大政。其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值日之日，主尖轮流派讲读编检八人，中赞二人，科道四人，随同到班，听候随时召见，……此制度同之变通办法也”。按这种办法，康有为所说的“草茅才士”是没有份的。对于世铎等的复奏，光绪皇帝表示同意，“奉旨允行”。康有为只好叹息说：“与我本意大相反矣”。“此折又皆成为虚文矣”。

光绪皇帝把这件公开斥责“老耄守旧之人”的奏折交给

“老耄守旧之人”去会议，把削弱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地位的主张交张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征求意见，这个做法本身就与康有为的建议精神相反。关于制度局的第二次奏折送上去以后，石沉大海，渺无信息，连下部议的待遇也没有得到。

对于康有为的重要奏议，光绪皇帝经常“下诏部议”，议来议去，或则不了了之，或则议出“变通办法”，弄得面目全非，“皆成虚文”。康有为也感觉这一点，他屡次在奏议中呼呈“臣请皇上断自圣心”、“惟皇上乾纲独揽，速断圣心”，甚至明白地提出“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可是，他始终没有觉悟到光绪皇帝对有些事情下明诏，另一些事情下部议，这种选择，一方面，反映了光绪皇帝的处境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光绪皇帝的政治态度的表现。他的处境使他只能采取这种政治态度。

梁启超认为，六月十一日的上谕令各衙门删改则例，另定简明则例，这是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的主张的一种苦心。“盖制于西后，未敢开局大修法制，先借是为嚆矢耳”，实则修改旧衙门的办事细则，同开制度局规定宪法、全面变法，是远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经济方面，康有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设通商院（或称为工商总局）和废除厘金制度。这两条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

他在《公车上书》中就提出：“似宜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管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

合公股，故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当时所谓商务，是包括工业在内的，康有为要求设商会、股份公司，主张“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这些显然是代表了要求独立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振兴商业”的口号是洋务派也赞成的，但他们的办法另是一套。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多次发出“振兴商业”的上谕。四月二十四日的上谕说：“前经该衙门（指总理衙门——引者）议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公举殷实绅商，派充局董，详定章程，但能实力遵行，自必日有起色。即着各省督抚，督率员绅，认真讲求，妥速筹办”。六月初七的上谕又说：“着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这两道上谕都说，由地方长官拣派和督率“员绅”来办商务局。“员”就是在职官员；“绅”就是卸任官僚或有科名的地主阶级头面人物。商务局必须由员绅试办而不让普通商人参加，这纯粹是洋务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的洋务派政策。

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专就商务问题上两次奏折。第一次的奏折原件已佚失，只在《自编年谱》中有记载：“六月一日，乃上商务一折，请令十八省各开商务局，先在上海、广东善堂中，公举通达时务殷实商人试办，限两月内草定章程，呈总署进呈御览，荐上海经元善、严作霖为总办，广西龙泽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抚议行。广东商务局七十二行，即举何重穗田为总办”。上面提到的光绪皇帝六月初七日的上谕，实际上否定了康有为的这项建议。他指示刘坤一、张之

洞拣派员绅试办，而不是“公举通达时务殷实商人试办”。

六月十五日，康有为又上了一道《条陈商务折》。在这次奏折中，他代表商人申诉了得不到政府保护，反而受到官方欺压的痛苦：“商官商律不设，故无以定价值之低昂，治倒账之控诉，治伙友之倒亏，治滑奸之诬骗。银钱无定价，则受平色之困。行规不与官通，则官可任意遏抑。体制又与商隔，则胥吏可借端欺市场信息”。根据这种情况，康有为提出：“窃谓朝廷若不设立商部，乞即以总理衙门领之，令各省皆设立商务局，皆直隶于总理衙门，由商人公举殷实谙练之才数人办理，或仿照广东有育堂商董轮办章程办理”。他希望借北京总理衙门的大官的权威来使商人摆脱地方官员的欺压，希望各省商务局完全由商人来办理。但是就在这一天，光绪皇帝的上谕重申，要求“各省督抚”设立商务局，选派员绅开办”，与康有为所上奏书的调子显然不同。

七月初五，光绪皇帝又发出“训农通商”的上谕。这道上谕虽然说要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但并不是康有为的由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商务的主张。当时，商务应由中央机关统管还是由各省分办，是维新派和洋务派争论的问题之一。维新派主张由中央机关统管，反映了民族资本要求冲破分割状态下的封建制度给发展工商业所造成的各种障碍。洋务派地方官仍主张分办，目的则在于发展和巩固自己的经营权势。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规定，农工商总局大臣的任务仅仅是“随时考察”，并无权指挥各省农工商分局；各省设立的农工商分局则是由督抚选派绅士管理。被任为督理农工商总局的三个官员，不过是赏给三品卿衔的道一级的官员，当然管不

了各省督抚。而且这三个官员都是洋务派所信任的人，与维新派毫无瓜葛。所以这道“训农通商”的上谕是完全适合洋务派的需要的。

康有为关于废除厘金的建议，也遭到光绪皇帝的拒绝。对于厘金制度，当时已是怨声载道。这种苛暴的税收勒索，严重阻碍商品流通，窒息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在七月间的《奏请裁撤厘金片》中说：“若夫内地害商之政，莫甚至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卡厂日增，密如织网，吏役日多，托为巢穴，每省厘卡百数，吏役数千，……胥役咆哮恐吓，锁拿逼辱，小民畏累，皆如数而偿，得脏放行，饱其私囊，否则船货充没，锁禁交加，或且鬻卖子女，以偿罚款，如斯之类，殆难悉数”。他认为：“似此弊政，病国害民，岂皇上爱戴元元，通商惠工之意？宜决裁之，以嘉惠商民。”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专门发了一道关于厘金问题的上谕，其中说：“即如厘金一事，起自军兴，为东南各省饷项所从出，经曾国藩、胡林翼厘定章程，法称最善，行之既久，经理不得其人，遂致弊端丛集，利折秋毫，徒滋纷扰。值此帑藏奇绌，需饷浩繁，户部职领度支，当思如何兴利除弊，如何开源节流，统筹全局，力任其难。总之理财之道，取之农不若取之商，用吏役不若用士人，不外从前创办厘金之良法”。这道上谕实际上是 为厘金制度辩护，同康有为的看法南辕北辙。在这个问题上，光绪皇帝显然不能代表要求自由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文教方面，康有为最重要的建议是改革科举制度。百日维新开始后，他所上的第一道奏折就是要求废除八股，改

试策论。在康有为看来，八股改成策论，不只是个形式问题，而且要在内容上进行根本改革。他要求通过策论的考试，“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指点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这是要把西方引进策论之国。

光绪皇帝于五月初五下令废除了八股。但是，所采取的办法却是废形式而不废内容。上谕中说：“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紧接着马上又说：“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竞逞博辩，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至意。”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彻头彻尾是洋务派的主张。五月十六日张之洞发出了《妥议科举新章折》。所谓“妥议”，就是说康有为之议不妥。这封章奏与康有为的建议针锋相对。六月初一，光绪皇帝发出上谕，大事表扬张之洞的奏折，同意了张之洞所提出的乡会试分三场考试、第三场试四书五经的方案。对两派的改革科举制度上的争论，光绪皇帝的上谕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务派。

光绪皇帝并不是完全不采纳维新派的建议。例如广开言路是维新派所竭力主张的，这个建议光绪皇帝采纳了。禁止缠足是维新派大力提倡的，光绪皇帝也发了上谕支持。但这些都只是次要的问题。在重大问题上，维新派的建议是没有被采纳的。

有一些上谕的内容，虽然在康有为的奏折中提到过，但并不是维新派独特的主张。例如裁军、练兵、推行保甲制度、

开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都是洋办派一贯主张的，在张之洞、王文韶、荣禄的奏折中也有详细的论述，而且大都是先于康有为提出的。就这些建议的内容来看，康有为同洋务派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作为百日维新的开端的“下诏定国是”这件事还值得说一下。据各种记载，这件事的直接发动者是翁同龢，他起草了两篇《请定国是》的奏折，然后交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端，用他们的名义送给皇帝。光绪皇帝在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后才下了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所以明定国是诏书的发出，虽然从总的形势上说，是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思潮所促成的，但是直接推动者却是翁同龢和徐致端这样的老官僚。至于杨深秀前面已说过，虽在政变后被杀，却不是个维新派。得到慈禧太后同意的“国是”，其实并不真是维新派所说的“国是”。

康有为在定国是的奏折中，先是大讲变法的必要性，然后指出：“非大举誓礼，明定国是，昭示圣意，俾万众回心，改视易听，不足以一人心而定步趋也”。至于定什么国是，他只扼要讲了两句话：“采万国之良规，先宪法之公议”。话虽少，是讲出了要害问题的。但是光绪皇帝的定国是诏书却是说：“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康有为说的“国是”，是效法西方，实行宪政；光绪皇帝诏书中所说的“国是”，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也说要“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时其目的只是“以救空

疏迂谬之弊”。

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所发上谕虽然有一百多条，但其重点和脉络很清楚，反复强调的主要是练兵和筹饷。筹饷是为了练兵，后以其实是一件事。定国是诏书中就指出：“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后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以后诏书又说：“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著”。“裁空粮，节饷需，为方今救弊之要图。……无论水陆各军，一律挑留精壮，勤加训练，俾成劲旅。并着遵照前降谕旨，力行保甲，诘奸禁暴，相辅而行；再能整顿厘金，严杜中饱，富国强兵之计，无有亟于此者”。这都是明确地把练兵作为“第一大政”，重点是很清楚的。这是洋务派的老方针。在光绪皇帝亲政后，洋务派在二十一年（1895年）就曾上奏认为“目前之急，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嘉奖。这是早已行过的，而且早已遭到失败的一条方针。

这条方针，同维新派所提出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主张是有原则区别的。都说兴办工商业，维新派的着眼点在发展资本主义，洋务派的着眼点在筹集军饷；都说兴办学校，维新派的着眼点在开民智，洋务派的着眼点在训练洋务人才；都说选拔人才，维新派的着眼点在“从事科学，讲求政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洋务派的着眼点在“杜绝滥保”，选用“体用兼备”的“通儒”；都说向西

方学习，维新派的着眼点在效法西方国体，洋务派的着眼点在练洋操洋炮，等等。在这些方面，光绪皇帝都站在洋务派一边，而同维新派是同床异梦的。

光绪皇帝究竟实行什么路线，从他对张之洞的《劝学篇》所采取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张之洞这篇东西是专门攻击维新派的，列举维新派的观点，逐条批驳，破口大骂。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两次发出上谕推广《劝学篇》，大肆表扬张之洞，称之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

光绪皇帝既然并不能采纳维新派的主要政见，为什么又重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呢？

光绪皇帝当时不可能区别维新派和洋务派，他是把维新派当做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的。维新派在强学会和保国会中的活动，使他看到这批人有动员社会力量的本领，他企图通过维新派利用这种社会力量，同慈禧太后对抗。

洋务派和维新派相互间也常常是划不清界限的。翁同龢和徐致端政治上都不是真正的维新派。翁同龢看中了康有为的才能，认为他有“经世之才，救国之方”，徐致端在《保荐人才折》中，推崇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是“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认为康有为“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他们引荐维新派，使维新派同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康有为也曾引张之洞为知己，光绪二十一年的《公车上书》中很推崇张之洞。梁启超也曾经向张之洞执弟子礼。光绪二十三年时，两派的政见分歧虽然已经明朗化，但维新派的有一部分变法主张，是同洋务派一致的。当时洋务派的内部，也有政见的分歧，联俄派和联

英派就吵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虽然知道张之洞和康有为有分歧，仍然可以把康有为看成是洋务派的同党。他同意维新派和洋务派相一致的意见，而否定维新派所提出的同洋务派有抵触的主张。维新派则从来一厢情愿地把光绪皇帝看作自己的“圣君”。

光绪皇帝之所以起用维新派，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廖之大臣，而用通达英通之士，不能变法”。康有为也提出破格扶用小臣的要求来为维新派争取政治地位。两个所说，表面上相同，实际的阶级内容并不相同。且不说光绪皇帝还不能区别这两种说法的阶级差别，即使他能区别，由于他企图实现一定程度的“变法”，由于维新派衷心地拥戴他，而且他面临着同慈禧太后争权的斗争，他仍然会把维新派引为同志，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实现眼前的目的。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光绪皇帝没有放手地起用维新派人物。卓有声名的康、梁两人虽蒙召见，却都只得到了六品衔的小官。光绪皇帝固然无权任命二品以上的大官，但有权至少给他们以谭嗣同同样的品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当时的人说：“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客中书”，康、梁所受到的待遇不是破格地提高，反而是破格地压低，可见光绪皇帝是不想因信用维新派人物而冒风险的。那么，谭嗣同的思想比康、梁的名声大；足以表现他的思想的《仁学》，秘不示人，还很少有人了解；他又是世家子弟，易为统治集团所接纳的原故。

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

慈禧太后并不反对洋务派的路线和政策。她历来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大臣。因此，对于光绪皇帝的四月二十三日的那个内容带有洋务派浓厚色彩的《明定国是诏》，她并不觉得有在原则上反对的必要。

既然如此，为什么慈禧太后又处心积虑地反对百日维新呢？

慈禧太后和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有这样的区别：慈禧既依靠洋务派官僚，也依靠极端守旧派的清室贵族和汉族官僚，这两派之间，前文已说过，虽然有政治主张和实际权益上的对立，但在维持封建统治旧秩序立场上，是一致的。慈禧太后按照时势的需要有时偏重于用洋务派，有时偏重于用守旧派，但总的说来，她是“公平”地对待自己营垒中的这两个派别，而使自己的统治权力建立在这两派势力的互相牵制与平衡之上的。百日维新中的光绪皇帝所企图实行的政策不但打破了这两派势力的平衡，偏到了洋务派一边，而且他还想利用维新派和他们所动员的社会力量。他抓起维新的旗帜，企图从慈禧太后手里夺取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这理会是慈禧太后和跟着她的守旧派所不能容忍的。

光绪皇帝在形式上亲政以后，实权仍为慈禧太后所掌握。对这种状况，光绪皇帝和他的父亲奕訢是极为不满的，曾作过多次夺取权力的尝试而未能成功。中日甲午战争中，慈禧

和李鸿章等丧权辱国，威信扫地，重新燃起了光绪皇帝争权的欲望。光绪二十四年春天，他对庆亲王奕诉讲：“太后若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并要奕诉把他的意见转告慈禧。慈禧知道以后发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奕诉竭力劝解，慈禧才表示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奕诉向光绪皇帝复命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皇帝就乘此机会搞起了百日维新。他想实行一定程度的变法，依靠张之洞等洋务派，利用维新派，并企图通过他们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摆脱太后这个事实上的太上皇帝，使自己真正行使皇帝的权力。

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国是的锣鼓一响，北京的政治形势就十分紧张。二十七日，慈禧采取了三项措施：一、命翁同龢“开缺回籍”；二、以荣禄为直隶总督；三、命二品以上大臣到太后前谢恩。二十八日，命崇礼署步兵统领；五月初四、初五，又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并使他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初六，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派刚毅管理健锐营。此时，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军，均驻扎京、津周围，由荣禄统帅。

慈禧采取了这些部署，就去掉了光绪皇帝最亲信的重臣（翁同龢）；由她的亲信荣禄直接统辖北洋三军，在军事上控制着京都，把北京城的军队指挥权抓到手中；加强了她的周围的警卫工作；亲自察看二品以上大臣的动静，使他们感到权力并不属于皇帝，而仍在她的手中。

当时既无洋人兵临城下，又无内乱威胁京师。慈禧太后采取那样严重的军事部署，担心的是什么呢？她是防光绪皇

帝利用变法把各省实力派争取到自己身边，并拉拢洋人同他进行斗争；她还防北洋三军，特别是在办洋务中崭露头角的袁世凯的一军倒向光绪皇帝一边；她也多少要防维新派在北京□动群众来威胁自己的地位。

慈禧在完成上述部署以后，直到七月中旬，就没有什么大动作了。她仅向光绪皇帝表示：“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辮发不剪，我便不管”。她住在颐和园静观。光绪皇帝隔一二次到颐和园一次，向慈禧请示。对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所发上谕，慈禧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有的上谕，如设商务局，还经过慈禧批示同意。有的上谕是慈禧用光绪的名义发布的。例如，七月二十二日，接连发了两道上谕：“派裕禄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敬信均著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历来有许多著作认为，这两道上谕是光绪皇帝发下的，由此引起了守旧大臣的恐慌，加速了政变的发生。梁启超也认为，光绪皇帝“逐敬信、李鸿章出总署，实有大明黜陟之力”。事实并非这样。李鸿章被调离总理衙门，是慈禧亲自下的命令。当时在卢汉铁路借款合同草约签字以后，英国出面干涉，英国公使窦纳乐到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要索山海关——牛庄等五条铁路的筑路权，以对抗俄、法、比集团控制卢汉铁路。此时，英国调动军舰到大沽口，以示威胁。“太后闻有英师，大惧，即日逐李鸿章出总署，悉许窦纳乐所请，英人始敛兵退”。在总理衙门接受英国的要求后一天，亲俄的李鸿章被逐出。这与维新运动中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关系。

慈禧采取这种静观的态度，以及她仍把持着任免二品以上大员的权力，皇帝还不得不经常向她请示的事实，在有经

验的官僚们看来，当然都不是有利于光绪皇帝的迹象。皇帝的新政的雷声虽然很大，但是跟着来的究竟是什么风雨是很可疑的。正因此，皇帝的新政上谕不能从各省督、抚得到积极的响应，他们都装聋作哑，观察形势，等待政局的分晓。刘坤一在颁发《明定国事诏》后一月（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有一段话可以代表这种态度：“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不暇究其所以然。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而其责成各督抚者，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其实他们是在等待慈禧太后的态度明朗化。张之洞就只对经过慈禧批示的办商务局的上谕起劲筹划，复奏条陈意见，对其他上谕则视若无睹。

在变法维新的口号已经空喊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光绪皇帝为了打破困境，在七月中旬大胆地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七月十四日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这些多半是无所事事的衙门，充满着尸位素餐的官员），并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这三省省城内既有总督，又有巡抚）；二是七月十六日下诏把阻挠主事王照上条陈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交部议处；三就是前面已提到的任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是七月二十日的事。

这三项措施都未涉及新政内容本身，只是组织性的措施。但正因为是组织性措施，对慈禧和光绪皇帝来说，是同权力有关的大事。慈禧可以容忍光绪皇帝颁发某些新政上谕，而绝不能容许光绪皇帝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许他在朝廷内

组成自己的党羽。

梁启超记载着，光绪皇帝处分怀塔布等的上谕发出后，“守旧者初而震恐，继而切齿，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这是说，在七月二十日左右，慈禧太后和他的亲信荣禄等人决定处分这个行动越轨的皇帝——把他废除。梁启超又说，早在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已决定在九月间带着皇帝到天津阅兵，乘机以兵力废之。但这种说法不全可信。何必一定要到天津才能废立呢？不过废立的打算可能早已在酝酿，而在七月二十日左右达到山雨欲来之时了。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见慈禧太后，慈禧明确表示她的态度，对皇帝施加了压力。皇帝从颐和园回宫后，当天就写了一道密谕交给四卿之一的杨锐：“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法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从这道上谕也可以看出，斗争的焦点仍在争夺用人权这一点上。

光绪皇帝执行的虽然基本上是洋务派的政策，但是有实力的洋务派大臣们对他态度消极，并不承认皇帝是可靠的中心。所以他到了危急时只能向康有为一派人呼救。不过他也知道这些书生赤手空拳，无权无势、是无能为力的。三天后，八月初二日，他又命林旭带出密诏一封，命康有为迅速出京。诏中说：“其爱惜身材，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

业，朕有厚望焉”。

康有为这一些书生倒不是没有采取一些办法来救他们的皇帝，他们的办法是两条：一是借用袁世凯的力量发动推翻慈禧太后的军事政变，二是请求外国帝国主义者出面干涉。

康有为知道维新运动没有武装力量支持不行的，并且看出京畿的兵力都在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控制下是很危险的。他设想的办法就是把荣禄部下的北洋军队分化出一部分来。在他看来，北洋三军中的袁世凯对他康有为很表钦佩，认为是可以拉到维新运动方面来的。他请徐致端和谭嗣同向光绪皇帝推荐重用袁世凯。光绪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令荣禄通知袁世凯到北京见皇帝。这还是在七月二十九日以前的事。袁世凯奉旨入京后，八月初一日见了皇帝，当日上谕宣布，授袁世凯以侍郎官衔。这是想使袁世凯感恩图报，脱离荣禄的控制，效忠于皇帝。

在接到皇帝求救的密诏后，维新派的书生们觉得可以依托的救星还是袁世凯。为此，谭嗣同实行了一个自以为直截了当的办法。他在八月初三日深夜，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的住处颐和园。并说事成以后，立即升袁为直隶总督（按康有为的说法是，要袁带领敢死队数百人把光绪皇帝拥上午门城楼，下诏杀荣禄，清除旧党）。谭对袁说：“你如果不答应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你的生命在我的手里，我的生命也在你的手里。我们至迟要在今晚决定，决定后我立即进宫请皇上办理。”袁世凯十分狡猾，当面并不拒绝谭嗣同的要求，而且激昂慷慨地说：“圣主乃我辈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

也”，又说：“如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是，他提出粮、械、子弹准备不足，须等到九月份慈禧和光绪皇帝到天津阅兵时才能执行。谭嗣同再三要求提前，他表示无法做到，欺骗谭嗣同说：“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谭嗣同无法，只好同意袁世凯的意见。他以为，这一下已经把袁世凯拉过来了。两天后，八月初五，袁世凯又见了一次皇帝，就回天津去了。

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书生们拉拢袁世凯的办法显然是不聪明的，即使袁世凯可靠，那样的做法只能引起慈禧和荣禄的警惕。

维新派的另一道妙计，求靠外国帝国主义，也是在七月二十九日以前已经想到的了。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皇帝在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认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这个办法同康有为原提开制度局的建议相比，多了一点，就是“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维新派显然是认为，有洋人在懋勤殿坐着，支持新政，包括慈禧在内的一切反对者都会瞠目结舌了。但这个办法没有来得及实行。维新派还曾向光绪皇帝推荐一向为英国侵略利益在华活动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大臣；当日本的伊藤博文来华活动时，他们又竭力主张光绪皇帝接见伊藤，想以此为震慑慈禧。七月二十九日以后，康有为还请容闳去向美国公使馆求救。康有为又找了李提摩太，由李提摩太同他一起去英国公使馆。接着，他又去拜会刚到北京

的伊藤博文，请伊藤向慈禧说情。及至八月初七日（政变后的第二天），梁启超还去找李提摩太，商量营救光绪的办法。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并不认为有必要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争权斗争中明确表示支持那一方面，维新派的这些活动都没有得到结果。

当维新派仓皇地设法营救他们的皇帝的同时，慈禧和荣禄积极行动起来了。

看到了光绪皇帝是在拉拢袁世凯，荣禄于八月初三日向总理衙门打了个电报，论称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各国兵轮游弋大沽口，要求迅速调袁世凯回津布防。同时，荣禄调聂士成的武毅军五千人进驻天津，切断袁世凯的新建军进入北京的通道（袁世凯驻天津东南的小站），又调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康有为记载这时的情况说：“京市人皆纷纷传八月京师有大变。米面皆腾贵，并董军纷纷自北门入，居民震恐，乃有纷纷迁避者”。同时，荣禄又支使杨崇伊等言官多次到颐和园请慈禧“训政”。

八月初五，袁世凯从北京一回到天津，立即向荣禄告密，全盘交待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当天荣禄就乘专车赶到北京，同怀塔布、杨崇伊等面见慈禧，会议至夜半方散。

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百日维新结束。这天黎明，皇帝还到颐和园去请安，慈禧却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她带人直达皇帝的住处，把一切文件都搜括拿走，又把皇帝召来训斥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皇帝好久才说出一句话：“我无此意”。慈禧又唾他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慈禧当即传旨说皇

帝生病不能办事，由她“临朝训政”。

当天，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查抄康有为的住处南海会馆，只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康有为已于前一天离开北京到天津。他由塘沽乘英国轮船“重庆号”到上海，捉拿他的命令已在上海等待他，如果不是英国领事馆帮他脱险而到香港，他大概是免不了殉身在这次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中的。梁启超也于八月初七日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从天津乘日本兵船逃到日本。

被逮捕的人很多，其中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在八月十三日被杀于菜市口。其余不少有牵连的人，或被流戍，或被囚禁，或被罢官。

政变发生以后，谭嗣同本来还有机会逃走，但他决定不走，静待逮捕。在他被捕前的几天内，他还同北京的镖客王五筹划，想把光绪皇帝劫救出来。他的一些日本朋友劝他到日本避难，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临刑时他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政变后第五天（八月十一日）慈禧下诏恢复詹事府等衙门；停止“不应奏事人员”上书言事；取消《时务报》；不久又下令恢复考试八股。但对向来实行的洋务“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她并没有全部取消光绪皇帝所举办的“新政”，只是压制了他想当真皇帝的愿望，扑灭了维新派。

政变中的失败者和胜利者

慈禧太后的扑灭维新派，可以说是轻而易举，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维新派志士们除了在政变后被杀的以外，有的流亡到国外，有的退隐到国内各地，有的政治热情已经衰退，悄悄地收起维新派的旗帜，甚至对过去言论的过于“激烈”表示忏悔了。

严复是维新派最早在政治思想上倒退的一个代表。他在戊戌的前一年（光绪二十三年）看到梁启超在《时务报》上鼓吹民权就不以为然了。他对梁启超说：西方各国实行民主是因为远古希腊、罗马时已有民主“胚胎”，中国是个没有“民主胚胎”的“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人民”。在这一年，他发表了《中俄交谊论》一文，大讲中国应当联合沙皇俄国，实际上是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进行辩护。当时，维新派一般主张联合英、日，固然也是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但是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已被社会舆论公认为卖国政策，严复公然给他帮场，这是明显的政策动摇。而且在这篇谈所谓“中俄交谊”的文章中，还插入一段反对民权的言论，说是“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这是连君主立宪的可能也否定了。严复在光绪二十一年发表的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辟韩》一文，次年为《时务报》转罢后，张之洞看到了大

怒，除叫人写文反驳外，还准备对严复进行迫害，经别人劝说才未下手。严复在二十三年写的这段反民权的文字是屈服于压力的表现。严复长期在李鸿章手下任水师学堂总教习，郁郁不得志，屡次想谄事李鸿章，以求夤缘上升。这篇文章又是为了这个目的。到二十四年春天，严复在《国闻报》发表《上皇帝万言书》，在这篇洋洋大文中，虽说要为富国强兵而变法，却根本不谈任何政治改革，更不谈民权主张，完全是为现行的君主统治作长治久安打算。百日维新期间，由于严复是个讲新学的言论家，光绪皇帝也曾召见他。皇帝问他有什么得意文章，他说，无甚得意者，有的只是这篇近作的拟上皇帝书。这时，他已讳言三年前写的《原强》、《辟韩》等生气勃勃的文章了。可见，当康、梁积极展开变法维新运动的时候，严复已经从维新思想后退了。在政变的风潮中，他没有受到较深的株连，但在行动上被监视，他主办的《国闻报》被封闭。这使他写出了“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来”这样悲愤的诗句。不过，此后，他也就洗手敛迹，“分份守己”了。

严复一生同洋务派有密切联系，生活依附于洋务派，所以当洋务派同维新派的分歧逐渐明朗，斗争甫见尖锐时，他就像丢掉一个烫手的烟头一样，丢掉了民主言论。严复在政治上退潮最早，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但整个说来，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禁不起阶级斗争的风浪的。动摇、变节、倒退是它的不易逃脱的命运。

康、梁跑到海外后的活动，将在以后去讲。他们所进行的政策活动渐渐变成了主要是反对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他们也倒退到了弃绝民主、膜拜君权的立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维新派的唐才常等还图谋发动武装起义，未遂失败（下文还要讲到），那是维新运动之火的最后一点余烬。

直到戊戌年，维新派思潮是中国社会中最先进的思潮，但毕竟它只是主要的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激动。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它再也不能起先进的作用了。维新派是付出了鲜血的，但付出鲜血的结果，并不是谭嗣同所设想的，维新变法运动能由此高涨而直到胜利，恰恰相反，倒是证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的变法维新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在维新派志士伏尸于菜市口的刑场上的时候，光绪皇帝被幽囚于中南海的瀛台。但光绪皇帝的失败同维新派的失败，二者的性质是不尽相同的。

光绪皇帝的失败是封建统治集团核心中的权位之争的失败。由于光绪皇帝利用维新派，又在争权斗争中被慈禧太后击败，陷入同维新派类似的境地，这就使人们很容易误认为他同维新派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前文又说过，光绪皇帝所执行的其实是洋务派的路线。那么他的失败是否表示洋务派的失败呢？不是的。事实上，政变以后，百日维新中所提出的带有洋务派性质的新政并未全部取消。

在当时，所谓变法是两种不同的含义的。一种是洋务派的变法，一种是维新派的变法。就前一种含义讲，慈禧、奕匡、奕訢、荣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并不反对变法，而

且是这种变法的主持者。荣禄的党羽陈夔龙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同孝钦（即慈禧太后——引者）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即颐和园）还京”。说慈禧太后不恨新法，那是指洋务派的新法。这个分析是不错的。政变后，临察御史王培佐上奏书作了一番“正名”的工作。他说：“今之乱者，窃变法之说，为作乱之谋，实则其人原不足与变法，其志亦不在变法，特借以谋乱而已。臣恭读屡次诏旨，罪其谋乱，并非罪其变法，使第以变法为罪，则彼转得未减矣。……今皇太后皇上于愆乱之余，取近所举行者，熟权得失，而更正之，一秉大公，断非以乱党曾经言及，遂概从薙除也”。这就是说，政变以后，还是要举起变法的旗帜来，不必一概反对百日维新中的新法。这个御史认为康有为之所以不可饶恕，是他假冒变法之名谋乱。他当然不懂得从阶级关系上来识别康有为的变法，但他主张对百日维新中的新法加以“更正”，也就是使其严格回到洋务派的轨道上来。

洋务派不但不是戊戌政变中的失败者，而且还是胜利者。这点是特别值得说一说的。

有的近代史著作沿袭康、梁著作作用过的说法，把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对立看成是维新党与守旧党的对立。这种说法是不足以说明当时的斗争形势的。第一，光绪皇帝并不是维新党的头头，而且被认为帝党的人并不都是维新派。第二，这种两党对立的看法中没有洋务派的地位，而洋务派是当时正当斗争中的一个要角。洋务派在阶级立场上基本上是同守旧派一致的，但因为

也讲变法，所以又似乎可以同维新派站在一起。洋务派插手于百日维新中，也可以说是参加了“帝党”，然而在“帝党”内部同维新派进行斗争，以后又站在慈禧太后一边参与了扑灭维新派。张之洞就是这样的左右逢源、两面三刀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张之洞插手百日维新，已见前文。军机四卿中的杨锐、刘光第就是他的人。光绪皇帝的许多新政诏书是按洋务派的精神写的，当然也和他们有关。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曾电奏请求把张之洞调到北京。他的电文说：“变法事体重大，必得通识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窃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忠勤识略，久为圣明所洞见，其于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讲求至为精审。似宜特旨迅召人都，赞助新政，与军机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筹，期自强之实效”。陈宝箴与张之洞关系密切，许多事仰承张之洞的意旨。这个建议不可能不经过张之洞同意，或者就是他授意的。张之洞是想利用时机使自己能够进入中央政策，掌握大权。只是北京的政变消息没有立即传到外省，陈宝箴发出这个电奏时已在突发的政变后一天了。

政变发生后，杨锐、刘光第被捕。张之洞曾急电军机大臣王文韶（此人也属于洋务派）营救杨锐，电文说：“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底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但同时，张之洞又电请慈禧太后重惩维新党人。这次政变固然有些洋务派的人受到牵连，如陈宝箴受到革职的处分，杨锐、刘光第且被杀，但这些人的后台张之洞不但稳如泰山而

且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

有人认为，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表现是一个看风转舵、依违两可的投机政客。康有为后来也对他作出“巧于观望，但求身安”的评价。如果从张之洞善于应付光绪和慈禧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来看，可以这样说；如果就他同维新派之间的关系来看，则并不是这样。在整个戊戌变法时期，他的思想和舆论上，在政治和组织上，积极反对维新派，毫不依违两可。他实际上是反对维新派的主角之一。人们往往认为，当时维新派的主要对手只是慈禧太后及其左右的守旧大臣，张之洞一伙洋务派同那些守旧大臣不同，还是赞成维新的，只是抱投机态度而已。这也是由于当时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人们容易把张之洞在权力斗争中所采取的投机态度误认为他在政治路线的斗争中采取了投机立场。

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对这次维新运动和这次政变采取什么态度呢？康有为在香港同一个从英国派到中国考察的贝斯福爵士谈过话，贝斯福在所著书中记载了这次谈话，表示他对康有为很尊敬，但又说：“我很遗憾，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维新者办事没有章法，过分急于求成，因而造成了他们的救国事业的失败”。这个看法大致可以代表英国官方态度。英国公使窦纳乐于政变发生二十天后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上说：“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上海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转述北京外交使馆对百日维新的看法是：“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

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

帝国主义者所说的“正当的变法”就是既使中国摆脱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而又能保持内部的统治秩序稳定的那种变法，也就是洋务派所要的变法。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的纲领和涉骤，尽管实际上是很温和的，既不是明确地反对封建势力，也不敢反对帝；匿主义，但是毕竟包含着要求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容，并且在客观上有激化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所以在帝国主义者看来，是“过份急于求成”，是“不合实际的”。英国的华官员还做出这样的判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说“太后敌视变法，是无根据的，或过甚其词的”。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只要谁能够维持中国内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他们就支持谁。

当时的《字林西报》还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当我们接到皇帝被废和太后重行听政的消息时，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又是窦纳乐爵士和巴甫洛夫侯爵的北京棋局中的另一个新动作”。这就是说，不久前李鸿章的被黜是英国公使窦纳乐对付俄国的一步棋，而这一次则是俄国的巴甫洛夫作出的一个答复。由于光绪皇帝趋向于接受维新派的“职合英日”的政策，沙皇俄国对于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当然是十分满意的。但是英国其实也不反对这次政变。因为慈禧太后并不是只能做沙皇俄国的工具，同样也能做英国及其他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在戊戌政变以后，英国带头施加压力，使慈禧太后不敢正式废除光绪皇帝，这就是为了使她不完全倒向沙皇俄国一面去。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及其左右的守旧派胜利的，洋务派跟着慈禧一起也胜利了。在中国的这些最反动的势力背后还站着帝国主义者，他们也发出胜利的笑声，满意地感到中国的命运似乎已逃不出他们的掌握。

但是所有这些胜利者，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又都是忧心忡忡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一出从维新到政变的历史剧中还有一个没有出场的角色。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他们在这出历史剧中并没有出场，然而所有的剧中出场者都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形象，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因为看到他们的形象，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心惊胆颤。

中华革命党始末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部分国民党员流亡日本，在孙中山先生的组织和领导下，于一九一四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本文作者原为中华革命党成员，他回忆了中华革命党这一秘密团体自筹备起至一九一九年正式改名“中国国民党”的亲身经历。读者可以从中较为具体地了解这一组织的成员、机构和党务、军事等活动的真实情况。

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正值反袁斗争是当时国内的政治中心。际此期间，我参与了一次活动，兹根据亲历和见闻，追述几桩历史事件。所撰以事件为主体，不全按时间顺序，是为杂记。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得以暂时巩固；遂变本加厉，排除异己。是年十四月四日，袁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议员资格；进而解散国会和各省的议会，通缉参加护法的有关人员。一部分国民党员逃亡日本，至一九一三年底，已有千人。唯十之八九神

情沮丧，黄兴、谭人凤等甚至有十年以后再谈革命之说。孙中山则意志坚定，且有组织中华革命党之准备。

这时，孙先生派居正、陈其美、周应时、廖仲恺、谢持等分别将亡命日本的党员调查清楚以后，于一九一三年冬末，在离东京约二十华里许的大森新井宿开办“浩然军事学社”（门外悬“浩然庐”），以培植青年党员。这是中国革命团体创办学校。训练党员之开端。浩然军事学社只办了一期，学生约一百四五十人。同学的名字，我还能回忆到的，只有熊黑士、李一球、吴先梅、李海秋、丁联英、胡景翼、杨益谦、李武、陆韬、吕超、赵铸之、陆初觉、华玉梁、一厂士杰、陈钧石、欧阳豪、赖成、邓柏年、陈冬青、徐桂八、钱大钧、黄天雄、周贯虹、殷汝耕等。全国解放后在大陆参加工作的，据我所知，有湖北省之江庆龄、江苏省之施方白、北京之李明扬、陈铭枢等四人。

“浩然”校舍是临时修设的，学生全部在校内膳宿。课程纯为军事。教员除了教筑城学的周应时，教日文的殷汝骊外，全自日本士官学校请来，讲义也是全部采用士官学校的。开课不久，学生分别宣誓入党。又过了两三个月，中华革命党开成立会。孙先生委派各省支部长为召集人。江苏省为吴藻华（号仲常，宜兴人），吴即召集已入党之“浩然学社”江苏学生陈钧石、李海秋、陆韬、施方白，以及非“浩然”生陈军亮、韩恢等在民加社开会，讨论江苏省党务的进行事宜。周应时（号折谋，启东人）以总部人员资格出席指导。结果决定分科负责办事，我被推任财务兼党务科长。这天在民国社参加中华革命党江苏支部成立会者共八人。其中韩恢于一

九一六年成仁于南京雨花台下；顾海秋于一九一七年就义于上海；余均病死，今仅存我一人。

“浩然”成立后不久，孙先生又在东京设立政治学校。课堂借设于日本法政大学，授课者多数是法大教授。“法政”学生也是一百四、五十人，解放后任内务部参事之于若愚，以及在台湾之广西人雷殷，都是那时政法学校学生。

当时在孙先生之侧者，有胡汉民、廖仲凯、陈其美、朱执信、许崇智、邓铿、居正、田桐、谢持、戴传贤、邹鲁、邵元冲、周应时、杨庶堪、丁仁杰、王统一、何天炯等多人。孙先生一面派人调查登记亡命之党员，重行办理入党手续；一面兴办政法、军事两校，选择青少年党员集中训练，以备再举革命。凡党员中之寒苦者，除制发衣服外，并月有初助。孙先生因鉴于国民党之组织不慎密，分子太复杂，非用严密方式吸收党员不可。所以规定凡人中华革命党者，不论新旧党员，一律要亲书誓约，宣誓加盟，其誓约如下（原文）：

立誓约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大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掬诚谨誓如左：

- 一、宗行宗旨；
- 二、服从命令；
- 三、尽忠职务；
- 四、严守秘密；
-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

民国×年××月××日

××省××县人×××（按左中指膜）

介绍人×××

在中华革命党未开成立会之前入党者，均亲写誓约，由介绍人引至孙先生前，高举左手，手心向天，立正宣读；读毕，按左中指膜后，捧呈孙先生，孙先生将誓约编次后，起立握手，告以入党号数（我为307号），并简单训示，或垂询数语而退。其后印有空白誓约，主盟人分派资深的同志担任。唯主张“非再过十年，不能谈革命”的，不同意誓约中“附从孙先生”等语的，反对按指膜的，纷纷离开东京转赴南洋各地及欧美，约有数十人。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华革命党召开预备会，到会者二百余人，一致票选孙先生为中华革命党总理。七月八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住地精养轩开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五百余人。签到时各发红白缎织别针一只，插在胸前，进入会场。会开时孙先生亦当众宣誓加盟，主盟人为胡汉民。孙先生的誓约内容，与一般党员略有不同，谨录于后：

誓 约

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

民

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
措国

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 一、实行宗旨；
- 二、慎施命令；
- 三、尽忠职务；
- 四、严守秘密；
-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广东省香山县孙文

民国三年七月八日立

是日孙先生演说，时间在两个小时以上，其记号略谓：
……文以三民主义号召革命，然国民久压于满清，感而从者，
多在狭义排满。一旦清廷既倒，革命之气，遂一落千丈。一
般人复惑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说，竟改革命党为政
党。继复合数党而成国民党，官僚政客，投机分子，纷纷挽
人，致质体皆为变化。故同盟会能以少数党员从事革命，不
数年而将满清推倒。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数十万军队举义
讨袁，不匝月而一败涂地。革命事业之不能一刻疏忽，不能
一步放松，于此可见。讨袁失败以后，袁世凯益肆无忌惮，
废约法、杀党人、逐议员、任宵小，更勾结帝国主义，不惜
丧权卖国以阴谋帝制。而党员之在国内者，贤者死事，不肖
者变节；即亡命海外者，亦多堕志丧气，甚有投降自首，或

创“十年后再谈革命”之说。文不忍置二十余年牺牲无数同志而缔造之三民主义于不顾，乃再举革命，所以组织中华革命党……孙先生未了说：“革命是要牺牲个人之一切利益而要替大多数人谋幸福……”这真是千古不易的革命原则。

中华革命党总章共三十九条，是孙先生手订的。其第二条：“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第四条：“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一、军政时期；二、训政时期；三、宪政时期”；第七条：“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第十条：“凡党员有背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并另规定，凡在革命军起义前进党者，名首义党员。施发表宣言及主要工作人员（略）。宣言中指出，国内之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当然已不能存在，所有海外之国民党，除在日本东京已宣布解散外，其余在美国南海各地者，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

各省市负讨袁军责任者：长江方面陈其美；江南吴藻华；江苏周应时、韩恢；广东朱执信、邓铿；山东居正；湖北田桐、蔡济民、吴醒汉；上海范鸿仙；江西夏之骥；湖南林德轩、林修梅、曾杰；广西刘崛；四川石青阳、吕超；贵州安健；皖北毕清波；皖中金维系；皖南张孟介。

规定中华革命党总理为中华革命军大元帅，监督指挥全国军事行动；负全省军事责任者为司令长官；负一处军事责任者为司令官，共同担任各省革命军事之进行。

中华革命党的言论机关

一九一四年春，中华革命党正在酝酿组织期间，孙先生令居正（笔名东辟）在东京发行《民国》杂志，主编者胡汉民，撰述者田桐、朱执信、戴传贤、邵元冲、邹鲁、杨庶堪、廖仲凯等。《民国》杂志社门站，悬版“民国社”，乃为中华革命党在日本公开的通讯处，也是一般党员的约会聚处所。

大约在一九一四年夏，美洲华侨同志也发行一种反袁杂志，名曰《民国》以响应中华革命党的活动。

南洋华侨同志陈新政等于一九一一年在槟榔屿办了《光华日报》，又在新加坡创办《新国民日报》，以壮声势。在香港方面，又有《香江晨报》和《大光报》的出版。

国内的言论机关，自讨袁失败后，被封禁得干干净净。即或从海外或香港寄至内地的反袁刊物，也都被检去，焚毁无遗，甚至将收受刊物之人拘去坐牢杀害。这是从一九一三年秋末到一九一六年夏，在袁世凯淫威之下，整个二年半内的情况。

一九一四年冬，孙先生先后派陈其美、周应时、吴藻华等率领同志回到上海进行党务军事工作。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帝国主义进行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中国国内又有袁世凯想做皇帝的机会，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五项二十一条款。五月七日又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卖国贼袁世凯除对第五部分声明“容日后协商”

外，其余四部分完全承认激起了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才未能实行。陈、周等以袁世凯丧心病狂日甚一日，非向国人宣布其罪状，发扬本党的主张不可，故即令施方白筹报一报，并指定以“五七”为报名。这张小小的《五七报》是讨袁失败以后，在上海以至全国第一张出世的党报。

《五七报》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日出版。编辑部设在当时称为法租界宝昌路贝勒路口的一间小楼上，施方白任经理，特约撰稿者张少屏、陈位五、茅祖权、施述之等十余人，主编者高穹庐。该报系四开版，初印二千张，后加印至五千张。因该报被袁政府禁邮寄，否则销场当不止此数。此时，上海有一张袁家机关报，曰《大共和日报》，日出对开两张，执笔者为李涵秋、张丹斧辈。报价和《五七报》一样，只售铜元两枚，但日售不满百份。当时上海市民同情反袁，于此亦可见一斑。

《五七报》出版后，对袁世凯丧权辱国，阴谋复辟帝制之伎俩，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因此，袁家党恨之入骨，始而禁止邮寄，继而通电全国不准阅看。但订阅者有增无减，有托民信局、轮船局作包裹送寄，代为发行者；有愿出重价加封邮寄者。于此可见反动统治钳制舆论与查禁书报等毒辣手段是无多大效力的。袁家走狗见《五七报》如此畅销，且仍流入内地，甚至北京市内也时有发见，于袁家帝制大为不利，遂在内地大捕《五七报》的读者，加以“乱党”的帽子。一面电飭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齐转电上海交涉员杨晟，请求法租界当局禁止《五七报》出版。终于在六月十八日的下午，法国捕房派探长沈德福来报社声称：因《五七报》常常骂总

统，并说总统要做皇帝，故定次日上午到公馆马路公堂审问。沈当即抽出一纸，于其上指定一角，要我签字。我即写“方天权”三字。沈去后，我即将被传情形告陈、周、吴等，并商讨到公堂如何应付。他们见我衣着破旧，头发太长，当即给我十五元，让我去购买衣鞋和理发洗澡。第二天我衣冠整齐去上公堂。被传到庭者除《五七报》外，另有三家报馆，即《公论报》：言论灰色，偶然也有不甚赞成袁世凯的言论。到庭者名贾公谔，听说后来在新民里炸弹案中丧生；《爱国报》：本由投袁党人何鸣出钱所办，不知何以也有些反袁。到庭教员名顾振黄，号息疚，阜宁人，时年约三十五六岁，后来同伏龙、龚士芳、万鹏等十三位同志赴南通举义，悉被土皇帝张某令镇守使张仁奎枪杀。《救亡报》：平日很同情反袁，到庭者名曾孟鸣，广西人，当时是一位热心革命的同志。后来做过大官，发了大财，一九二九年病歿于上海。

正九时，法租界公堂开庭。中外两官并坐，右为中国官，姓聂，忘其名，就是中国官厅委派的所谓陪审官。桌上堆了很多报纸。法官首呼《公论报》，态度尚平和；次呼《爱国报》，态度凶恶起来。再次呼《救亡报》，态度更加凶恶了。未了轮到我，中国官首先怒目注视我一下，然后审问一番。问毕，连声“哦！哦！哦！”一面翻阅《五七报》，唯管里“吓”的一响，右手一拍，喊叫道：“《五七报》太不成话了！竟敢把大总统骂到这步田地，并且说大总统要做皇帝！（手又一拍）简直是荒唐，法兰西也是民主国，也有大总统，你看法国的人民哪里有对大总统这样态度的？”我即申辩说：如果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总统也和法国一样，那我们还说什么话？

这就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的一个例子。说到做皇帝，那是事实俱在，可不必讳言。……只见中国官对外国官说的一句舒适话点了点头，在点名单上写了几行红字，立即宣布：“《公论报》从轻发落，以后言论要格外留心！《爱国报》、《救亡报》各罚洋五十元；无洋，各押一月。《五七报》罚洋一百元；无洋，改押三月，报馆封闭”。旋即退堂。照当时所谓法公堂的判词，明明是说《五七报》如不能缴一百元罚款的话，那是要改押三个月，并且要封闭报馆的。但我们当时即将罚款如数缴足，本应当三个月也不押，报馆也不封闭的。因此第二天《五七报》照常出版，且对于被传审、罚款一事，记录得非常详细，词句间对于袁世凯、齐耀琳、杨晟辈更加不客气了。谁知道发报不过一小时许，即有一个巡捕搜得《五七报》约百多张，神情紧张地来说：“《五七报》业已封闭，你们为什么仍然出版？捕房所以不来封馆，是顾全你们的面子，为什么你们反而和捕房作难起来？快搬走！快搬走！”这时我们才知道不论缴款与否，报馆是一定要封闭的。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我们立刻在门口贴一张“本报业已停版”的纸条。另由撰述员陈立五（高淳人，是当时一位热心服务的同志）写一个“天中报”三字报头，并且由他亲自送刻。次日《五七报》也只得停刊了。

当时资产阶级在上海办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照常出版。它们对于袁世凯的恶劣行为，既不同意，也不敢表示反对。到了一九一六元月一日，袁世凯通令全国改称“洪宪”，不准再称“民国”，如果报纸不印“洗宪”二字，即不准邮寄。因此，上海日报公会决议在报头下特用六号字

排“洪宪”两字以应付之，但不排元年字样而另以干支“庚辰”纪年。这可说是当时上海各报为对付袁世凯而用的策略，也暴露了自己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到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上海的《民国日报》和《中华新报》等相继出版。迨袁贼身死，各地的宣传刊物，又勃然而兴。

沪军镇守使郑汝成伏诛

一九一三年秋，党人兴师讨袁。袁世凯以江南，尤其是上海为“乱党”发源地，故派其忠实走狗、残杀党人之刽子手郑汝成率十余万人镇守上海，任“沪军镇守使”，任务是防制“异动”，残杀党人。仅就一九一四年九月份计，即杀害党人八十七名之多（据当时任职于镇守使署的皖人郑某统计）。所以当时谚云“镇守使署鬼门关，党人只去不再还。”在沪党人再三商讨，以为如欲工作进行，并为死难同志复仇，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经陈其美最后决定的。但是花了好久时间，费了好多心血，终无确实把握，而郑汝成的暴戾行为日甚一日。凡参与此项密谋的同志，无不焦灼万分，其中尤以消失人周淡游为甚。淡游和我时常见面，平日沉默寡言，处事周密，甚少激烈之言语。独对于杀郑汝成一事，主张最烈。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为日本天长节（即日皇生辰）。上海日本领事馆照例举行典礼，并招待外宾。郑汝成为当时上

海的最高级军事长官，而且为了追随袁世凯一贯的媚日态度，当然要亲往祝贺。陈其美事前已探听明确，即令周淡游、李海秋主办其事。因淡游主诛郑最力，且素与郑相识，当时中华革命党所有驻沪勇士，全部归他接洽招待，故此事由淡游指挥。时上海日本领事馆在外白渡桥北堍右转弯处。汽车过桥照例须缓驶。三策客（王晓峰、王明山二勇士及另一南方人）即候在外白渡桥北堍。十一时许，郑汝成的汽车开至外白渡桥北堍，正缓驶而过的时候，王明山故意闯至车前举手高喊，司机恐肇事，立即煞车。明山乘此机会，很沉着地连掷两弹。刹那时，玻璃与弹片齐飞，汝成与司机皆倒。晓峰恐其不死而遗后患，即登车向郑汝成射完预先装就的两梭子弹，郑立刻脑浆迸裂，当场毙命。两位王勇士见目的已达，放声大笑，弃枪举手，从容就捕，终至成仁。另有一人则安然归来。上述行刺经过，大半出于此人之口。

吴先梅剪除蒋士方

浩然军事学社会生中有一名吴先桥者，大约在一九一四年秋，我常见到他支颐凝神，若有所思。我一再问故，他总是闪烁闪烁，不肯具体回答，只说将来一定会知道的。一九一五年春，某晚，东京各报忽出号外，载称：有一支那人名蒋士立者，系朝世凯总统的特派员，于某时某刻在神田区某町某番寓所被刺，中三枪未死，已送某某医院医治。新闻中未提及事件的原委及行刺者。翌日各报普遍刊载吴先梅的照

片，并且说他是暗杀蒋士立的重要嫌疑犯。不过始终没有听到他被捕的消息，同志们也不知道他的行踪。直至这年冬季，我才知道他重现于沪滨。此时他的面容较前为瘦削，沉默寡言，每遇陌路人客，常避入他室，或作假寐而不愿与人交谈。

四十年之后，我任职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有同事于若愚与吴先梅及“蒋案”主谋覃振友善，后来又同访当时和覃振同寓日本的覃宋夫人，对这件疑案才算有较彻底的了解。

蒋士立，四川人，一九一四年春奉袁世凯的命令到日本侦探流亡在日本的党人行动，并行使其利诱和陷害的毒计。其利诱方法有三：（1）送回本国做官；（2）送入日本学校求学；（3）既不愿回国，又不愿求学者，每月发给生活费三十二元。但是得首先用书面承认过去的反袁是大逆不道的；每星期最少要报告党方消息及党人的行动一次；并绝对不许自由行动。其陷害的方法是到处探听党人的行动，随时密报国内，伺机拘捕屠杀。因之，在日本作亡命客者，人人自危，新华社密谋对付之策。尤其覃振（号理鸣）最为起劲。吴先梅自告奋勇，愿负除害具体责任。时有一岳阳人名周鳌山者，是蒋士立的狗腿子，曾拉拢若干党人人蒋毅中，故蒋视周如左右手。周鳌山向善周旋，与覃振为旧识。一日，访覃不值，留名片而去。覃得周片，喜甚，遂利用此片，仿效周的字体，介绍某人（用假名）见蒋。是日大雨之夜，吴先梅持片前往。蒋同他的秘书下楼接见。秘书在前，蒋行在后，秘书与先梅握手，伪说是蒋士立。但是先梅早已获得蒋的照片，已明见蒋士立立于其后，于是毫不踌躇地摸出手枪，对准蒋的胸部

开枪。蒋立而未倒，先梅又连发两枪，蒋方仆地。先梅见目的已达，就大踏步而出，隐匿于浅草某妓院特别室。

日本警局早已明了蒋士立的被刺，“亡命客”有重大嫌疑。于是全体动员普遍检查亡命客之住所。检查后发现独有吴先梅不知去向。遂将在吴寓所搜得的照片给蒋士立的秘书察看，秘书证实行刺者就是此人。因此，日本警局即确定吴先梅是刺蒋犯，将吴的照片刊载各报，通缉于全国。一面分别传讯平日与先梅有往还的党人二、三十人。林修梅、林伯渠、于若愚等均在被传之列。到了第三日，覃振被传。其雇用的十五岁的下女作证，说覃振是吴先梅的好朋友，时常和吴先梅游园观剧，小饮谈天，并且说吴先梅于蒋士立被刺的第二天清晨来过覃之寓所，在四五小时以后为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走。因此，覃振遂被拘禁。覃之辩护律师在辩护词上强调说，警局以未成年的下女作证，没有法律根据。因之，警局不得不将覃振释放，前后拘禁二十余日。

吴先梅行刺后，藏在浅草妓院。看到蒋士立未被刺死的号外后，心神不安，未待天明即赴巢鸭。扣覃振寓所之门。应门者正是作证的小下女。小下女见到先梅有些狼狈，急问：“吴先生你怎么了？”先梅故示镇静地说：“什么事都没有。”不片刻，覃振起床，先梅首先示以号外报，并耳语昨晚刺蒋的情形。覃旋即奔赴青山，请示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听了，立遣刘速到覃寓，传呼先梅。一面和他挚友头山满在民话中商定暂时安置吴先梅的方法，并立令先梅持函往见。大约在此案发生后四五天的光景，警局在二日内三次派人到青山“中山方”（孙先生寓所之名）探问吴先梅的行动。孙先生义

正词严地诘问警员说：“我问你们，吴先梅究竟到哪里去？他是因为革命失败而流亡到日本的。照国际法的规定，日本政府应该保护。现在你们警局放弃责任，不能保护吴先梅，弄到行踪不明，你们不知道反省，反过来问我，这岂不是大笑话吗？你从速回去，报告你们长官，要在短时期内查明吴先梅的确切消息来回复我。”警员无词以对，唯唯而退。从经以后，警局不再为蒋案到“中山方”噜苏了。

吴先梅在头山满先生的照顾下，安然息影了一个月。待空气缓和了些，他便设法在某国轮船上的广帮水手掩护之下，潜回祖国，继续做倒袁工作。不久秘密离沪赴湘，运动军阀汤芑铭的部属反正。不幸在常德被反动师长陈复初杀害，时在一九一六年春复之交。先梅又名星阶，湖南桃源县农家子，牺牲时年二十六七，因一心从事革命活动，未婚娶。

策反苏州独立的曲折

苏军第二师师长朱熙驻苏州，平日常与陈其美、周应时、吴藻华等周旋，并表示赞成孙先生的主张。一九一六年春，周、吴等劝他一致讨袁，他唯唯应许，并约定三月某日宣布独立。周、吴等信以为真，即拟定改编办法，镌刻各种关防，并派遣工作人员先期分批赴苏，寓居于约定地点，听候命令。周、吴改穿和服，与几个日本人同行，先工作人员一日抵苏，寓日本租借地青阳里，以避耳目。这时各地反袁师起，风声极度紧张，在袁世凯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无不特别戒严。我

当时受命负责将准备好的关防印信、委令计划等重要文物，由沪费往苏州。适有民国女子工艺学校邵平千、邵萍青、高文斌来访。邵、高等和我有师生之谊，平日知道我为革命党人而甚同情于我。我因时机迫促，即以急欲赴苏，并将赴苏任务以及特别戒严情况告之，且示有求助之意。三生不稍犹豫，均愿同去。且由高生邀其大嫂与侄辈偕行以掩护。高大嫂本苏州人，有祖茔在虎丘山麓，于是商定办法，装作全家赴苏扫墓模样，购冥镗三篓，将印信委令等件，分藏镗篓中，即雇马车赶赴北站，时距开车时刻只有三四分钟了。站内军警多于旅客，且荷枪实弹，状极森严。我们故示急促，立刻购票向月台奔去。军警见此状况，初不料为“乱党”，并在旁做我人的拉拉队，“快！快！快车要开了！”我们当然拚命前奔。上车仅隔数秒钟，汽笛一声，车即徐徐开动。我们一行男女大小工人，个个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车抵苏州站，已在晚间九时，下车者寥寥数人。因特别戒严，不准自由前去，只得逗留车站。约半小时许，有一查夜军官率枪兵十余名，前来盘问。我以赴虎丘扫墓对，并请设法使我们全家得达阊门旅舍。这位军官见我等并无可疑之处，于是点头说：“好！好！你们跟我们走吧！”我们好象奉到特赦命一样，当即携镗篓，由枪兵保护前进。途中唤问口令并盘诘来路者，均由这位带路军官代我回答。镗篓三只，遂安全运到了苏州。

翌日，是约定宣布独立的那一天。我于清晨即赴青阳里会晤周、吴，并问宣布独立的具体时间。周答：“有些小问题，不久即可决定。”正午我又往探究竟，他们面露愁容，频频摇首以示意。晚间九时，周嘱我速回上海向陈其美报告：

“朱师长表示苏州独立是可以的，唯须发饷二十余万元。”周提笔在一张不相干的名片背后写道“此间营业状况，请方兄面述，立候回音。”我到沪后，即与李海秋同赴陈其美处报告，并交周片。半晌，他哼了一声说：“受骗了！快请他们回来吧。”又看了看周应时写的名片，继续说：“你们想一想，我们党里怎么能够在短时间内筹集这许多钱？即使能筹得到，又怎样能够装箱运到苏州去？即使能将现款运苏交朱，朱是否绝对服从本党也是问题。总之，革命是要以道义为前提，而不是以金钱为中心的。你去答复周、吴诸同志，并转告朱师长，随他的便，不勉强。……”我和李海秋出陈寓时，已是凌晨三时半，略事休事，即乘头班车返苏回复。周、吴等听到我转达的话，立刻通知全体同志即时回沪。朱熙也派人间接传话，略云“此间近日谣言太多，恐怕有不逞之徒从中捣乱，定于本日下午二时后，清查旅舍与住户，如果没有重要事务的旅客，还以不要留苏为是。……”这显然是很客气的逐客令。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陈其美的补遗

宋教仁坚决主张本约法之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及各省选举正式国会议员，国民党党员占了大多数。旋宋又奉派赴北京代孙先生任国民党理事长职务，因此袁世凯益觉不安，而动杀宋之念。即命其国务总理赵秉钧，赵秉钧又命洪述祖，洪述祖又命应夔丞，应夔丞又命武

士英于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晚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北车站。不日，即将应夔丞、武士英先后拘捕，并且获得了赵秉钧等奉命刺宋的函电，真相大白。袁世凯更进一步施展毒辣手段，先密将武士英、应夔丞毒毙于上海狱中，继将赵秉钧毒毙于北京，妄图掩蔽其杀宋之阴谋。当赵秉钧人殁的时候，我的挚友京兆尹王治馨往吊，哭之恸，并抚尸曰：“老哥死得好惨呀！”当时在旁的探狗们，将王治馨痛哭情况报告袁世凯。袁世凯疑王已知内情，遂又将他残杀。洪述祖见势不佳，上已逃匿无踪。直至袁世凯天诛后才将其捕获正法。当时中国已废斩刑，故洪被判绞刑。刑具系新从美国购来，据闻曾试绞一狗，狗立毙而颈无损。继绞洪述祖，颈则断，迷信者以为神使。

陈其美本遭袁忌。后来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但陈其美仍力持倒袁，在上海活动甚力。故袁不惜悬重赏谋杀之。当时陈其美在沪，经济相当困窘。袁世凯利用此点，派许国霖、程子安伪设鸿丰煤矿公司于陈其美寓所（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附近，以便密谋暗杀。许国霖等探知李海秋与陈亲善，遂又雇一与李海秋相识的黄汉湘与之往还。黄汉湘托李海秋转达陈其美，如能为鸿丰公司介绍向日本押借资金，则可以十分之四抵助。经再三商议，陈其美允诺，并约期签订合同。岂时李海秋与许国霖、程子安、黄汉湘及另一人某同赴陈寓。甫入门，李海秋说忘携合同，启门外出，随即冲进暴徒两人，连发五枪，陈当即僵卧血泊中，时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十五时许。黄汉湘与另一人某在出事纷扰的时候，亦被人枪杀于萨坡赛路之侧。

究竟被何人击毙，至今尚为疑案，一说是鸿丰公司杀之灭口。李海秋当时被认为是陈案中的重要嫌疑犯，押捕房甚久，后因无谋杀之佐证，由人保释出来。旋又因他案被捕，引渡处死，时年约二十七八岁。李海秋，上海引翔港人，毕业于某教会学校，平日好诗酒，仗豪侠，当时国民党里有冒险性的工作，李常负其责。其夫人亦好诗，笔名炼石室主。李海秋死后，我曾访炼石室主于湖州旅沪公学。问李之致死原因。她说：“海秋本姓周，名云，号栖云，因奉陈其美命，处死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受租界通缉，遂改名李海秋。陈其美之所以要诛夏瑞芳亦有一段公案。缘民二年陈在上海举兵讨袁，组司令部于闸北之时，夏带头联名请租界当局派兵逐陈，并许驱陈后，将闸北地区划为租界。夏瑞芳是袁世凯的走狗，杀之者即为李海秋与丁联英等。陈案李涉嫌，而无确证，但有人大不以为然，暗中以“李海秋即前暗杀夏瑞芳的周云”而必欲死之。海秋因夏案被捕，竟被杀害。

辛亥革命杂记

沈钧儒是浙江人。谈到辛亥革命在浙江的情况，还得从我在日本的时期说起。

清光绪末年，我留学日本，就跟在日本的革命党人有所接触，特别是和光复会往来较多。光复会著名人物如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余锡麟等，都是浙江人，其中也有参加同盟会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但由于我倾向革命，跟光复会领导人章炳麟过从甚密，所以他们的活动我是知道一些的。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在日本学军事，准备回国后参加到军队里去，有计划地进行武装革命。后来就发生了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和秋瑾在绍兴被害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当时是震动全国的。

我回国到了浙江的时候，由于革命遭受挫折，表面空气沉闷，但实际上光复会中的重要人物都在秘密分头活动。他们跟浙东的台州、处州、金华各属的秘密会党有联络，在新军里面进行革命工作（当时浙江编练新军两标），新军中有不少官兵参加革命。那时候，我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教员中颇多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其中就有周树人即鲁迅先生。

宣统元年（1909）阴历二月间，清廷下诏书表示决心要实行宪政。十月间，各省成立咨议局。浙江咨议局议长是陈黻宸，陈时夏和我当了副议长。清廷的所谓筹备立宪，给了立宪

派一种纪想。于是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发起联合各省的咨议局，在上海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派代表向清廷请愿召开国会。宣统二年（1910）正月间，各省请愿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时也到了北京。当时革命和立宪两派对国是争论不休，大家要我到北京去看看形势。我在北京呆了一个时期，跟各方面接触的结果，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权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回来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讲了。

辛亥阴历四月间，清廷下诏书要把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实际上是把路权送给帝国主义者。沪杭甬铁路原是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来，由江浙人民集股筑成的。一听到要收归国有，群情激昂。那时候各省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向清廷力争，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这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不久，武昌起义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革命情绪高涨。当时杭州驻有满人旗营，有相当实力。新军中参加革命的官兵跃跃欲试。革命党人从外地纷纷来杭州，秘密设立机关，日夜会商，着手准备。到了九月初十左右，一切布置都已就绪，决定十王（阳历11月6日）拂晓开始发难。在家分配工作，我和陈时夏担任政治组织方面的设计准备工作，草拟浙江光复的通电和布告等。十四日夜半，新军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配合了革命党人所组织的敢死队，先向扶署和军械局的驻军进攻。巡抚增韞由后门逃走，当被擒获。攻军械局亦已得手。两标部队在城站会合后，各拨一部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上午，出安民布告，通电全国，宣告浙江独立。

革命军顺利地推翻旧政权以后，接着就是建立新政权，

首先是谁来当都督的问题。革命军发动进攻时，只推定原宪兵司令部的军官童保暄为临时司令官，后来就由他用临时都督的名义出安民布告。至于正式都督，当时我们考虑到汤寿潜。汤寿潜是沪杭甬铁路局总理，住在上海。他在争回沪杭甬铁路的时候，在群众中建立了一定威信，但是他并没有参加革命，后来我们知道了他跟旗营的协领满人贵要（贵翰香）有深厚的交情，像这样一个人，原是不适宜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我们——主要是咨议局方面的人，竟认为非汤不可，在光复前两天（阴历九月十三日），我们就派陈时夏赴上海欢迎汤杭州。十五日早上，我们又打电报给他，由陈黻宸、褚辅成、马叙伦和我四个人具名，报告浙江光复情况，催他赶快来杭州。下一天，火车通了，汤寿潜于下午偕陈时夏等乘火车到达杭州，直赴咨议局，跟大家商议一切。

那时候围攻旗营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满人将军德济虽然主张投降，但是实际掌握军权的协领贵林仍然主张顽抗到底。这里有一件动人的事：有一个参加洪门会的工人张子廉（一说姓王，名不详），把旗营大炮的炮闩偷偷地拆了下来，使大炮不能施放，因此杭州城内避免了炮战的破坏。到十五日下午，贵林等又探得巡抚增韞已被活捉，革命军声势浩大，眼看无法顽抗了，才在营门小城垛上竖起白旗，贵林带了两名随从，向我军接洽投降。他要求我们纳降后不杀一个旗人，革命军首领在咨议局讨论结果，准如所请，约定十六日中午正式呈交军械清单。本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到了十六日，贵林听说汤寿潜回到杭州，就说投降条款中不杀一个旗人的那一条须得到汤先生的保证，才能呈缴军械

清单。原来那个贵林同当地豪绅有勾结，跟汤寿潜、陈黻宸都有交情，所以他有恃无恐，居然坐在咨议局里等汤寿潜到来。汤寿潜一到，他就对汤说了许多话，汤从他手里取过那张写满条款的纸来草草看了一遍，就答应了他。

十七日上午，才正式集会讨论推举都督。褚辅成提议推汤寿潜为都督，多数赞成，王金发（他是光复会会员，带领敢死队，配合陆军八十一标攻军械局驻军的）等小人数反对，以为汤寿潜过去怂恿浙抚捕杀秋瑾，不应该推他作都督。最后仍然通过以汤寿潜为都督。汤于当天正式就任，以旧劝业道衙署为都督府。当天发布四个文告，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本年九月起，蠲免全省钱粮厘金一足年。现在看起来，蠲免全省钱粮厘金，只对地主豪商有利，贫农佃户得不到什么好处。

浙江光复的头几天里，一切都是乱哄哄的，社会秩序还没恢复过来。贵林表面上投降，仍住旗营里，想乘机叛变。经人告发，浙军司令部立派部队驰赴旗营，起出私藏枪支二千余支，子弹无数，还有好多箱炸药。贵林和他的儿子量海当场被捕，解送司令部，受军法会审。当时我担任临时警察局长，参加了会审。我们问贵林：“投降条款中不是写的明白不得私藏一枪一弹，日后如发现所报不实或私藏枪械的，应处极刑吗？现在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有何说？”当即判决贵林父子死刑，就在咨议局的广场上执行枪决。当时人心大快，社会秩序也渐趋安定，过去携着避往外地的，都纷纷搬回来了。

枪毙贵林父子的时候，汤寿潜适因事去上海，他一得到消息，第二天就回杭州，质问当时担任总司令和我，何以不向他请示。我们回答他说：此案人证物证俱体，用军法紧急

处分，是我们的责任。汤听了，也就无话可说了。

十月十二日（阳历12月2日），苏浙联军攻下南京。十一月初六日（阳历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自海外归国，到达上海。十一月十三日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那时候，汤寿潜已经辞职，继任的是蒋尊簋。一月间，浙江成立了临时省议会，临时省议会制定了浙江省临时约法。议决了军政府官制及本省预算。我在那时候担任了教育司司长。蒋尊簋是浙江人，在广东做新军标统，广东光复的时候，他以新军标统暂任临时都督，后来粤省军民正式举出都督，他就辞职离粤。汤退蒋继时在辛十月中旬，即1911年12月上旬。但其时朱瑞（他是光复会会员，原任八十一标代理标统）攻克南京天保城有功，凯旋归来，受到热烈欢迎。他那时候已经做了浙军军长，跟蒋有矛盾。以后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那时候在浙江已经可以看出苗头来了。

我记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事实。我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当时对于革命的认识是模糊的。今天想起来，浙江光复所以那么快地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迫切要求和热烈支持。但是，当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又不依靠广大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那么，人民胜利的果实仍然会被夺去，革命势必逐渐变质，以至于完全失败。这是我们所应当接受的历史教训。今天纪念辛亥革命50年，回想我们在过去所走过的这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看看当前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新中国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真是既兴奋，又高兴。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我于1904年10月到日本东京，在振武学校肄业。是年12月，我和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欧阳振声、曾继梧、陈强、仇亮、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罗佩金、郑开文，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伍崇实、河南曾昭文等共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翌年8月，同盟会成立，我因仇亮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我加入同盟会不到几天，仇亮引导我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金弥宅，谒见孙中山先生。先生态度和蔼可亲，与同志谈，谆谆不倦。我请面示革命方略，先生指示三点：

一、首先打倒自己脑海中的敌人，抛弃富贵利禄的观念，树立受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

二、革命军占领地区，必须立即成立政府，以为号召，即使占领地区小至一州一县，亦应如此。

三、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

孙先生言犹未尽，我插问一句：

“中国如此广大，选择革命基地，究以何处为宜？”

他诘谟在胸，不假思索地说：

“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人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础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

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缩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在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现在时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

此外，他还讲了许多有关革命的道理与经达，我都能有所领会。自从我亲聆这次教诲以后，一时思想大为开朗，从此衷心服膺三民主义，并心悦诚服地敬佩先生。此情此景，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怀。

不久，我到姬路野炮兵联队入伍一年，随即转入陆军士官学校，至1908年12月毕业。适川督赵尔巽调我和姜登选、舒和钧、王凯成四人入川训练新军，于是受同盟会委派，我担任了和江上游联络员。

我们到达四川后，赵尔巽派我充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谋，姜登选充任工兵营管带官。就职一个月后，我同盟会少数同志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研究了四川的情况，认为要在四川革命，就应立个行动纲要，以为守则。当时拟定的行动纲要，大致有如下四点：一、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二、稳步发展组织；三、切实把握军事实力，应付事变；四、联络一切力量，共策进行。我们当时认为，只要这个纲要能够切实做到，那么，他方一有动作，我们可以立即响应；

他方未有动作，我们也可以掌握时机，随时发难。我们商妥后，即邀集林修梅、杨瑾、季雨霖、舒和钧、梁达沅等同志开秘密会议，讨论行动纲要，得到一致同意，当场并推我主持其事。这是1909年2月的事。

那时协统是旗人钟颖，我们对他很为警惕。到了3月间，川督调他带兵入藏，协统一职另调东三省道员朱庆澜接充。在朱未到差前，钟颖把混成协的事务交我代办，他专筹划入藏事务，有时也同我商量调动军队与安排人员的问题。入藏军队约2000余人，编为三营。第一营由防营改编，管带官陈庆；二、三营均陆军合编，二营管带官为张葆初，三营管带官为林修梅。5月间，钟颖所部队成都开拔入藏。钟走后一个月，朱庆澜才到成都接事。

朱庆澜素有廉洁勤敏之名，有虚心好善之意，同我相处，亦颇融洽。赵督打算扩编新军为一镇，交朱筹划。朱问计于我，我说：“由协扩编为镇，要解决五个问题。其一为总方略。其二为迅速设立讲武堂以训练干部。其三为购买枪炮器材服装。其四为加紧建造营房。其五为增购马匹。除第一项属于国防，须经我们拟定后呈请军谘府核定外，其他四项，应有一年半的准备。才能成镇。”朱以为是，属我草拟计划，交赵督批准。朱推荐我担任购买枪炮器材服装的任务，并得督练公所总参议黄忠浩的同意，于是赵尔巽委我为主任，派兵备处杨瑾、曾广开为随员。我本不乐意担任这个工作，经姜登选力言，到长江中下游走一趟，多多联系同志，以革命大有好处，我才决意担负起来。

这年11月，我们一行三人从成都出发。到了武昌，见到

了统制张彪、协统黎元洪。我们在武汉三镇，参观了兵工厂、纺纱厂和陆军三十二标。三十二标训练甚好，士兵体操技术也很高明，为各地所少见。协统王得胜、刘韞玉，统带曾广大、李襄邻，将湖北建立陆军的经过情况，向我们作了详细说明。与这些高级军官接触，给我一个印象：我认为他们都是循规矩、怕惹是非的人，一旦军队有事，他们是不会从中作梗的。

在武汉逗留期间，我特别着重对下层情况的了解。经过考察，得知党人在两湖一带活动最力，革命空气十分浓厚，许多青年学生都投入新军，以展其救国的怀抱。上年冬，湖北陆军中，即有蒋翊武等组织群治学社（文学社的前身），社员如李六如、杨玉鹏、廖湘芸等，都是思想进步、才能出众的人物。杨瑾与蒋翊武是旧交，我这次到武汉，因杨之介，得与蒋见面。我们两人谈话的内容，多为有关革命运动的进行问题。翊武说：“在湖北一镇与一混成协的新军中，有许多军革命志士；不过因为禁网严密，侦探密布，我们文学社未便在他们之中磊事发展，只能稳步前进。宪兵方面已有联系，所以我们的活动得以安然无事。”我当即告以四川方面的情况，并谓只要军队训练成熟而又为我们所掌握，只要切实执行我们的行动纲要，我想四川虽暂时落后于两湖，不久也可以迎头赶上的。翊武又说：“孙武、居正等领导的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得还好。听说谭人凤、焦达峰在湖南也有共进会的组织，今后亦应联合一致，共策进行。”我对他的意见极表赞同。接着他又问我：“你看革命何时可以成功？”我说：“三年五载不为多，不过不能专就湖北一省的情形来下判断。因

为在湖北，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快的。且主义已渗透到了军队下层，只要人心不死，成功是会很快。”翊武深以为然。我们相约各自努力而别。

我们一行三人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时候，正是1910年的新年。听说同盟会正竭力策动广州新军起义，倪映典率领新军进攻省城，已战败阵亡。消息本不好，但这一次究竟是军队革命起义的开端，所以闻之也很兴奋。我这次到沪，虽为购械而来，不过更重要的还在留心物色革命人才，其中尤以物色联络员为最。有一天，我在马路上散步，得遇上年同船人川的但懋辛。此人精悍明敏，最适宜做联络工作。他这时正在中国公学教体操，彼此来往颇密，因将我的打算同他商量，他同意回川。我当即电请朱庆澜转请赵督优予录用，复电照准。至于购械，经过调查，决定向上海制造局订购七生五管退山炮，向泰来洋行订购马克沁机关枪，向日本太平洋洋行订购工兵器材，其他马鞍、皮带、服装等军用品，也同有关洋行签定了合同，定期交货。

我在沪任务完成之后，又抽空到南京一趟。南京陆军第九镇成立在湖北第八镇之后。第九镇的高级长官，多半是日本留学生，个个赫赫有名，在训练军队方面，形式上模仿日本的一套，实际上用处并不大。不过从前赵声等人对革命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坏。所以革命思想已深入到中下级军官的头脑中。但自1907年端方屠杀了革命党杨卓林等人，逐走了军队将领赵声、柏文蔚以来，禁网森严，致使军队中一般官长对革命工作多采取过于稳健的态度，惟革命潜伏力量仍然不小。好在南京离上海很近，将来南京一旦有事，是可以得到

上海方面支援。这就是我在南京期间经过与各方接触所得的印象。不两天，我回到了上海。

4月间，在沪购械事务已告结束，便命杨瑾、曾广开先行返川，我个人告假一个月，回湘省亲。路过长沙，与文斐见面，交换了彼此所知道的情况。其时长沙抢米风潮刚好结束，巡抚藩台庄赓良受到撤职处分，劣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也受到严厉处分。我听到不少奇闻和新诗，都是描绘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与老百姓铤而走险反抗政府的情形的，写得有声有色，奇趣横生。我认为，这次抢米风潮，乃是群众自发的暴动，事前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但仍然收到了同革命不相上下的效果。不能说不是一件十分可喜的现象。“万里云程初发轫”，革命前途，大可乐观。

我在醴陵老家住了半个月，于6月间回到成都，仍供原职。四川陆军扩大为镇的准备作业已完毕，估计12月可以成立为镇。因再与姜登选分析国内外形势与四川情况，认为形势于革命十分有利，问题在于国内我们的工作，谈话中，我把这次出川考察的情形告姜，大意是：长江中游革命力量在日益发展，长沙抢米风潮尽管是群众自发的暴动，但足以说明革命条件业已成熟。长江下游各省也有进展，上海为下游各省的中心，同盟会已派人在沪主持。今年广州起义虽告失败，但影响甚大，并且尚在再接再厉的奋斗中。四川居长江上游，应与滇、黔联络一气。留日云南同学大多参加了同盟会，这是一股很大的革命力量。两湖对军队宣传主义、组织力量的工作做得好，特别着重中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比四川侧重军队中上级要好得多，我们应该向两湖学习。我

这次在沪遇见但懋辛，四川会党最多，已约但回川联络会众，姜登选听了我的汇报，觉得分析恰当，因而增加了大家对革命的信心和勇气。

1910年冬，四川陆军第十七镇正式成立，统制为朱庆澜，我任正参谋官，两位步兵协统由五十五、五十六两标统带施承志、陈德邻升任。步兵中有一位统带叫叶荃，是同盟会会员，与炮兵统带、工兵管带一起，均同我们有联系，一旦有事，可以运用自如。惟姜登选没有升任为步兵统带，是缺点。过了年，即1911年正月间，接但懋辛来信，大意是，“近得异人传授法术，要往广州学道，无法分身回川，有负盛意”等语。这是暗语，不久果有广州3月29日之役，但懋辛是亲自参加这次起义的，但既不能回川，我们只好另外找人来代替他做联络工作。

4月间，川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川边大臣赵尔丰接充川督。此时全国人民正受着黄花岗烈士死难的刺激，义愤填膺；复有铁路国有风潮，川、粤、湘、鄂四省人民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各派代表赴京呈请清政府收回成命。闰6月中，按家电，得知父亲病故，只好请假回籍奔丧，把我担负的同盟会的工作交给姜登选接办。我于闰6月23日动身，取东大路返湘。朱庆澜送我至成都东郊，以时局演变甚剧、究应如何应付相询。我因简略进言，大意是：“老百姓与士绅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越来越扩大，十七镇新军是为捍卫国家而设的，以不介入这次风潮为好。我闻新督性情急躁，统制似应多方进言，总以不激起大变为妥。去年长沙抢米暴动，庄赓良受到撤职处分，连新军协统杨晋也牵连受累，可为前

车之鉴。此次风潮远远超过长沙抢米暴动，希望统制相机行动。如有紧急，姜登选沉着勇毅，胜我十倍。遇事请与他商量。”朱颇首肯，互道珍重而别。

我从成都急行七天，到了重庆，其时川南、川东各大城市已纷纷罢市。从渝坐和船东下，7月20日抵达长沙。在长沙，见到了文斐。他说：“自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胡汉民已不能在沪露面。但宋教仁、陈其美等已奉命从港到沪，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联络长江各省同志，指导各地工作。”我说：“这个组织极为重要。我们近年来，各省工作都是为各自为政，既无联系，又无统一计划，徒然使工作受到损失。现在有了这个组织，今后工作定会大有进展。”此外，又谈了一些有关湖南反对铁路国有的情形，彼此预感到革命时机行将成熟，遂互相勸勉努力革命工作而别。

7月底，我回到醴陵，安葬好父亲，已是8月上旬了。其时接朱庆澜来电，大意是：四川首派我为永平观操员，须于20日赶到北京报到。我因于14日从家动身来长沙，又会见了文斐。他们：“浏阳人焦达峰在湖南组织了共进会，对新军士兵有联系，对会党也进行了不少工作。”我说：“四川会党极盛，我竟对之束手无策。我认为，会党流品很杂，运用这种力量，如不能操纵自如，以后必致发生流弊。我是着重在军队方面进行工作的，对会党，我不甚重视。我现欲借观操机会到北方看看，你以为如何？文斐很赞成我北上一趟。恰好在长沙碰到程子楷由广西省派赴北京观操，正好同行。

8月16日，我与程子楷到了汉口，到武昌寻找蒋翎武，没有碰到。18日乘车赴京。19日车抵彰德，得知武昌起义。

是日午后到南京，始知秋操停止举行。因与程子楷商量，最好立即南下，参加革命，以遂平生之愿。时京汉路已停止客运，只有赴津航海南下一条路。其间因子楷得病，稽留至 27 日才到天津，候至 30 日搭商轮南行。沿途在各港起货上货，直到 9 月 7 日始抵上海。从津至沪，沿途所见，截然不同。京津两地，熙来攘往，仍然一片昏昏沉沉。上海则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尤以工、学、商三界表现最为热烈，令人兴奋。计算武昌首义，至 9 月 13 日上海独立，不出一月，全国即有七处起义，声势之壮。为前所未有的。

在沪得到黄兴已于月初从港经沪转赴武汉。我与程子楷商量，决定同赴武汉。同路还有邓希禹、黄子伟二人，他二人均系清廷文官，愿意弃职从军，真是难能可贵。我们一行四人，于 13 日从沪乘轮赴武昌，轮船准期到达汉口附近，停泊洪山江山。我们雇了民船登陆，面见洪山防守司令，说明我们是随黄兴来武汉助战的。防守司令立即写出介绍信，让我们进城。这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雨，泥泞载道，我们冒雨步行 30 里，到了武昌，城市紧闭，守城士兵验看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城。城内人人精神焕发，意气轩昂、确有一番革命新气象。又见市上间有青年，身着青缎武士袍，头戴青缎武士巾，巾左插上一朵红绒花，足穿一双青缎薄底靴，同舞台上武松、石秀一样打扮，大摇大摆，往来市上。我想，这大概是“还我汉家衣冠”的意思吧！

黄兴得悉我们到了武昌，即于当晚派唐桂良前来，把我们招待到客栈住宿，并表示欢迎我们参加汉阳战事。第二天，即 18 日，唐杜良带路，由鲇鱼套过江，到汉阳昭忠祠总司令

部。克强见我来了，十分高兴。我们谈论了当时两军对峙的情形，得知湖北陆军自起义后，破坏了原有建制，原有管带以上官长，由于士兵不服，多已离开军队；因此，汉阳军队虽有三协和一标步兵，但由于统兵官不够，或者统兵官军事水平不高，所以力量显得有些单薄。不过士兵为革命精神所鼓舞，士气尚好。至于敌方，此时业已起用袁世凯，并派冯国璋率军两镇南下，与我作战；惟山西、陕西先后独立，清廷需要设防，所以除冯部两镇外，要再派兵南下，也很困难。又自13日上海宣布独立，15日苏、浙宣布独立后，为张勳所窃踞的南京已成为一座孤城，则革命形势即可稳定。

以上就是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这次见到克强同大家谈话后所总结出来的。克强并说“湖南已派王隆中率新军四十九标和巡防营数营援鄂，我们革命声威益振。”言辞对战局殊为乐观。当时谈话在座的，我记得有谭人凤、参谋长李书城、副参谋长吴兆麟和同学曾继梧等。谭白发皤皤，语言耿直，给人印象最深。总司令部组织异常简单。克强留我们吃便饭，饭后继续谈话。克强说：“湖南关系甚大，在焦、陈（作新）遭人暗算之后，问题颇多，最好我们有同志前往联络，共策时行。汉阳战事，我已派曾继梧指挥炮兵国才，颂云来得及，就请你帮助凤岗（继梧字）。”我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对革命有利，我们都是应该做的。凤岗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谈至此，即辞出。

从总司令部出来，我与继梧随亲至龟山下选一古庙作为指挥部，并委派邓希禹、黄子伟任秘书。接着又上龟山察看炮兵阵地，见有日本30年式七生五野炮六门、汉阳防造克鲁

森五生七山炮 18 尊，炮位布置合法，还构筑了临时掩护工作。询问炮兵，得知是第八镇炮后团的老兵。是训练有素的。惟山炮口径小、射程短，不能发挥多大作用；所幸野炮虽已陈旧，尚属可用。我在龟山望汉口，得见租界处的房屋，大都为清军焚毁，情状异常凄惨，平时万船云集的襄河，也空无一般。一幅战时景象，呈现在眼前。我认为，既有这样的阵地，而清军却纵火焚毁人民房屋，甘与人民作对，可以说，我们既得地利，又得人知，器械虽窳朽，只要发扬革命精神，是可以战胜的。

22 日，汀军统领王隆中率军到了汉阳，这是武昌起义后首先得到的援军，人心为之大振。王隆中与我，是日本士官同学。湘军将领卿衡、鲁涤平、胡兆鹏等都是湖南武备或陆军速成学生，尚能团结一致。只是湘军五十标自杀害焦、陈，拥护谭延闿后，势力有所扩展，而四十标奉命援鄂，反而不免向隅，所以四十九标官兵咸感不平。不过自从平开汉阳后，由于大敌当前，大义所在，大家也就没有什么议论了，军心仍很坚固。22 月夜晚汇报，是谭人凤、李书城、程子楷、呈兆麟、曾继梧和我几个人。这晚集中讨论进攻问题，谭人凤首先说：

“湘军已到，正好从速进攻，不能拖延。”

克强接着说：

“许多同志都与谭石老所见相同，这是个重要问题，请大家多多讨论。”

我对此有不同意见，即说：

“我军士气昂扬，胜敌百倍，这是不待言的。但就现时情

况论，我军兵力单薄，建制已破，新旧兵参差不齐，这也是事实。我认为，最好是利用长江天堑和各省响应独立的声威，作防御中的攻势准备，使敌人不敢越襄河一步。再派得力部队渡过襄河扰乱敌人侧背，牵制敌人，使之力量分散，不敢一意向我进攻，这也是用兵的通常办法。只要再坚持一月，援军日多，北方定有变化。”

克强不同意我的意思，他说：

“你这办法十分稳妥。不过以今日情形论，即使扼守汉阳不动，也嫌兵力单薄。”

程子楷插一句：

“防守汉阳，必须巩固蔡甸。蔡甸巩固，汉阳万全。”

李书城立即接上一句：

“蔡甸已派得力部队防守，且与此地相距很近，亦可随时策应。”

谭石老迫不及待地大声说：

“现在我军士气旺盛，正好进攻，无须迟疑，还是趁热打铁，不必‘刻舟求剑’的好。”

我看谭石屏的议论，跟我针锋相对，因而我说：

“石老的话必有所本，能够代表多数同志的意见。我意力主速攻的同志，因为受压迫太久，怀恨甚深，屈蠖求伸，自是热血灌顶的表项。但这个敌军，非有坚强的实力或革命的内应，是不可能一击即破的。事关重大，值得再三思考。”

王隆中初到汉阳，勇气百倍，也力主速攻。我看主速攻者太多，孤掌难鸣，最后只好说：

“必须就敌我情势、兵力多寡、训练优劣，作通盘打算，

最好请总司令作出最后决定。”

至此，讨论中止。是日各方传来消息，如桂、闽、粤三省的独立，海军的起义，都足以振奋人心。尤其是海军起义关系特别重大，因为有了海军巡弋江面，首义的武昌便可解除许多顾虑。

24日汇报，同志们莫不意气昂扬，兴高兴烈。有的说：“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即使进攻不利，但因海军在我们这一边，敌人也无法飞渡长江，更何况各省都在陆续响应，宣布独立，声威之大，足以寒敌之胆。”我对进攻虽持不同的意见，然大势所趋，我也不能独执己见。克强因作最后决定，准备进攻。当时总司令所辖各军兵如下：

鄂军：

步兵第一协协统蒋肇鉴

步兵第四协协统张廷辅

步兵第五协协统熊秉坤

步兵第四标统带胡效騫

炮兵团

司令曾继梧

工程第一营管带李占魁

湘军：

步兵第一协协统王隆中（四十九标全部）

湖南巡防营四营统领甘兴典（约干二百人）

总司令部兵站司令王安澜

为了过河进攻，总司令下令工兵营在琴断口附近架设便桥。总司令于26日下令，定于27日指晓进攻汉口大智门之

敌，企图一举突破，收复汉口。关于攻击目标、各军攻击部署和任务以后各部队渡河时刻，命令中均有详细规定。总司令亲率幕僚，于26日夜随同各军前进。我指挥龟山阵地炮兵，准备射击，以掩护各军前进。各军遵照命令渡过襄河。湘军为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博爱书院堤岸前进，与敌前哨线发生了冲突，惟枪声不密。我在龟山上看得大智门一清二楚。我想，我们这样堂堂正正的进攻，敌人当然早有准备。我自到汉阳后，渡河后即向博爱书院堤岸前进，与敌前哨线发生了冲突，惟枪声不密。我在龟山上看得大智门一清二楚。我想，我们这样堂堂正正的进攻，敌人当然早有准备。我自到汉阳后，每夜听到敌人机关枪声通宵达旦不停，而今晚却万籁俱寂。由是我才悟到：敌军官长平日为了睡得安稳，不惜牺牲子弹，乱放一阵，表示有备；今夜不同，官长不睡了，各自站在火线上，是准备要跟我们拼一下的。

当前哨战开始时，离拂晓还有两小时。我命令向大智门发炮十余分钟后，敌炮才对我回击。在昏天暗地中，敌人的炮弹全落在龟山后面。我们的炮更处于劣势，也没有命中目标。经过前哨战一小时左右以后，遥望博爱书院堤岸一带，始而大火熊熊，继而步枪声啪啪作响，又继而机关枪声砰砰齐鸣，最后则炮声轰轰震动。不到一个小时，这些声浪渐来渐稀，知道敌人前哨已撤回本阵地了。于是我又下令大小炮位，向大智门猛轰。敌炮不稍示弱，也向我阵地反击。正在炮战激烈中，东方渐渐发白。在龟山上，我看到两军的动作，历历在目：剧战经过三个多小时，敌军总在原阵地胶着不动，这就说明我进攻部队遇到了顽强抵抗。敌人能够顽强抵抗，

必有工事与地形地物的障碍，阻滞我军不得进展。回忆数日前，我谍报报称：大智门一带，地形复杂，障碍甚多，敌火焚汉口市后，又利用残垣破壁，做了许多工事。我想这些工作，如无重炮对直摧毁，是不易攻破的。如今战斗呈胶着状态，我军不得进展，势必要受到挫折。果然未到正午，忽见我军有一部分队伍，从博爱书院堤岸后退，未几影响全军，各部队都急先恐后地纷乱溃退。这场暴风骤雨战斗不终朝而风消云散。从军语上说，我军在这场战斗中，收做攻击不奏效。不过敌军始终居于被动地位，当我军退却时，并未跟踪追击。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战的经验，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验。

这天午后4时，克强回到昭忠祠。他跟平日一样，仍然态度雍容，意志坚定，真不愧是个革命领袖。他从来就不以失败归罪于人、成功引为已有，而是遇事引咎自责，所以能够博得同志们的敬仰。这次进攻受挫，他的态度还是如此。有人说：“这次进攻，攻败垂成，是因为湖南防营要吃中饭，一部分后退，才牵动全局的。这虽于总司令声名有损，但作战命令对动用携带口粮已有明确规定，防营不照命令办事，岂能归罪于最高长官？”也有人说：“军队复杂，未经整理，即上阵作战，受此挫折，也是责有攸归的。”平心而论，克强抵鄂不过十余日，湘军到汉阳亦不过数日，各军官兵都急于要迅速进攻，革命意志高昂，气氛紧张，也是不能让克强从容加以整理的。总之，在这样情急势迫中，能够指挥进攻，取得主动，即是一种胜利。人们不察其时实情，事后论长道短，不是历史家应有的观点。何况此一点，影响所及，实际

上结束了清廷 269 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自有其一定的价值，事实俱在，岂容抹煞！

克强因进攻汉口失败，某日找我谈话。克强认为，我军进攻失败，汉阳岌岌可危，要我迅速返湘，联络湘省当局，准备一种持久力量。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建议克强，在中山先生未回国以前，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及早摆脱汉阳前线指挥任务。驰赴上海，设法攻下南京，作为革命根据地。克强深以为然。越数日，我即回湘；克强旋亦离鄂赴沪。

我回到长沙不久，南京即告光复，从此转入停战议和阶段，因此我回湘后的活动，就没有在汉阳作战时的那么紧张了。此时同谭延闿的接触则很频繁。

辛亥革命后，谭延闿（组庵）以一咨议局议长一跃而为湖南都督，应该是心满意足、笑逐颜开的。但他终日坐困愁城，眼红脸黑，感到很苦恼，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有这么四点：一、他好用权术，联甲制乙，用丙控丁，使之互相牵制，彼此猜疑，而皆倾心于一己，不过以此却使内部意见分歧，不能团结一致。二、革命后，人事安排最不合理，投机者捷足取得高位，有功者依然屈居下僚，以此咸感不平。三、湖南六个师，系由焦达峰、陈作新执政时缩编而成，其中许多干部为革命元勋，动辄恃功集会要挟，以致纪律荡然。四、各师有名无实，兵多械少，虚糜国帑，经费异常支绌。组庵面对这个局面，一筹莫展，所以烦恼起了。1912 年 5 月间，他听到黄兴在南京大刀阔斧地一次解散了十几万军队，风平浪静，安然无事，使他景慕不置。有一天，他找我密谈。他说：

“克公在南京，仅仅两个月时间，遣散了十几万军队，没有发生事故，不知他采用什么方法，而收功如此神速？”

我针对组庵的弱点，对他说：

“克公公忠体国，解散南京十几万军队，不是靠留守地位，而是靠他平日革命的声望取得成功的。”

他紧接着我的口气说：

“湖南经费支绌，养不起许多军队，你看，能否假克公的威望，来一个大裁兵？”

谈至此，我对湖南军队情况作了点分析，便说：

“凡是爱国的人，都认为湖南应该裁兵。比如第三师，程子楷和我，便心同理同，具此愿望。第一、二两师，实力较薄，裁兵亦较易为力。应当注意的，反而是四、五两师，如能得到这两师同意，问题可迎刃而解。”

组庵高兴地说：

“第五师，我可与梅馨商量；但一、四两师则非你去说服不可。”

同时，他并请我到上海走一趟，向克强请求援助。我即说：

“此时一旦泄漏，诚恐发生意外，还请你另派委员办理的好。我能力办得到的，无不尽力帮助。”

他认为妥善，乃于6月中派机要秘书筹赴沪谒见克强，请求克强对湖南裁兵事作出主张。克强不选成裁尽，主张留两师或三师以应缓急。吕用电报将克强的主张告知组庵，组庵回电，大意是：裁汰改编，必致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一支新军，较为妥善。但组庵手无寸铁，要实行这个方

案，甚感棘手。适当时第八师赵恒惕一旅，原系从广西带来的新军，器械精良，因赵与第八师将领不甚融洽，从南京返桂，路过湖南，如组庵截留用则湖南裁兵得有监视的部队。而第八师也可以新招一旅补充，以解除上述不融洽的矛盾。广西英劳廷平素厌忌新军，赵不回桂，亦足以解除陆之顾虑；而于赵旅则得到安身之所。一举四得，皆大欢喜。经过与有关方面的协商，组庵的裁兵方案就决定了。8月中，赵恒惕率旅回杜，道经长沙，借炎暑为名，假长沙休养。至是赵旅为组庵截留调用，即开始裁兵运动。组庵求我对第四师说服工作。我和王隆中是学友，交谊很好，前后与王商谈两告知组庵，组庵闻之大快，并亲自与王亲谈一次。经过以上的酝酿与协商，才正式组织裁兵委员会。委员会开过几次会，我主张每师留二营，加以训练，作为今后成立新军的干部，退伍年金。计共裁撤官兵四万几千人，跟南京遣散军队一样，没有遇到阻碍。只有各师学生出身的军官，事后啧有烦言，惟因兵心安稳，也鼓不起什么风波。到10月31日克强回到长沙时，裁兵已将办理完竣。

克强回到长沙，全省各中大城市居民欢喜若狂，长沙举行了空前盛大的欢迎会。组庵对他推崇备至，事事都听他指示。克强主张：革命党人应该团结一致，政治上展开民权运动，经济上振兴实业，教育上培养人才，多派学生赴欧美留学，军事上训练一支新军，并推荐张孝騫任军事厅厅长。张曾在德、日学习军事，学识很好；担任过留守府军事厅厅长，经验丰富。如张出任厅长，湖南可望建立一支新军，以为全国楷模。其时，组庵心广体胖，安心做个文治都督，把所有

师长，如余钦翼、赵春霆、王隆中、梅馨、蒋国经、向瑞琮一起送赴北京授官给禄。从表面看，湖南局面一时好像海晏河清，于是专于致志筹办第一届议员选举。至于训练军队工作，同盟会的同志都属望于我；不过我有志兴办实业，在岳阳已筹办一所制革厂，所对于练兵的事不感兴趣。那时，湖南原武备、兵目、速成各学堂及两标学兵出身的军事人才很多，裁兵后他们失业了，而政府却以为发给了退伍年金，即可安然无数事，詎知事实正相反。到1913年新年，渐渐议论纷纭，局面开始出现动荡状态。张孝騫建立新军的计划，在4个月中并无若何进展，一岂由于组庵优柔寡断，托延时日，二同由于张孝騫人缘不熟，无法推动。而大多数失业军官，则已由口头议论，进而结党成群，企图推翻张孝騫。至于政治方面，议员选举结果，国民党虽取得多数，实则全无根柢，许多人不仅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并且醉心利禄的官僚分子亦多摇身一变，混入国民党。幸因宋教仁回湘，一番欢迎伟人的热闹气氛，暂时掩盖了上述的矛盾。

宋于2月17日回湘，到处演说，力倡责任的内阁制，企图以议会为武器来制服袁世凯的专横独裁。我和宋在欢迎会和宴会上，几乎每日见面，可惜无法深谈。因私人设宴招待他，我其间向他提出三点：一、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内部复杂，即令将主义与政纲降低水平，意志亦不能统一；二、起义各省，其属于同盟会者，有名无实，同志间精神涣散，并无中心力量作为国民党核心；三、袁世凯依靠武力，专横独裁。目无法律，安问政党。有此三点，而欲实行责任内阁制，不能无疑。宋答以实行责任内阁制正所以制服袁之专横，

如政治不能上轨道，再作道理。我又劝他，工作应以训练党员为中心。他认为有此必要，并说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谈话并不投机，草草收场，此后便没有再谈了。

宋离湘后，省内骚动即日趋紧张。到3月13日，退伍军官以兵目学生易堂龄为首，假反对张孝骞为名，运动少数巡防部队，围攻都督府，当经卫队击退。翌日查出主使人犯，组庵大起恐慌，请我到府会商处理办法。我建议：将主谋拘禁，其余从宽，只要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可迅速解决。组庵深以为然，即将易堂龄拘禁，其余从宽一概不究，一场风波，归于平息。

风波平息后，孝骞辞职，组庵要我继任。我早看到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必将尖锐化，湖南关系甚大，即令此时迅速练兵，亦势难挽救危局，我若陷入军事机关，实在用非其才。但组庵坚持要我担任，并谓：“这回风潮虽已平息，但人心浮动，非你出来不足以镇定人心。”至是我乃推荐陈强、程子楷以自代，组庵均认为不可；组庵反挽程子楷与赵恒惕劝驾，再三怂恿，我始应允。我于3月15日就职，打算首先成立两团，严格挑选干部，加强训练，作为模范。詎知20日即有宋案的发生。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中枢一面坚持由法律解决，一面准备实力以应付事变。4月底，由李烈钧发起赣、皖、粤、湘四督秘密联盟，并以黄克强为中心，进行反袁斗争。四省反袁的实力和情况，大致如下：

克强上年在南京解散军队后，又另外编成了四个师，以陈之骥（第八师）、章梓、章驾时分任师长。四师靠苏、皖两

省财力支持，不虞匮乏，器械也比较精良。假使从建军起，克强能慎选将领，严加训练，则到宋案发生时已有一年之久，南京四师应该业已成为劲旅，足以应付任何事变。无如一年以来，领导无人，致使军队有名无实。例如陈之骥系冯国璋女婿，官僚气味浓厚，旅长黄恺元为湖北富商之子，两人虽具有爱国反满的热忱，却少推倒袁氏的本领。王教绩（第八师另一旅长）算是耿介之士，但亦非济变之才。章梓虽富于革命性，却为一纯粹文人。其他自郗以下，不足深论。这些军队领导不得其人，所以训练并无成绩，组织亦甚复杂，正如一盘散沙，并无作战能力。南京之外的四省，如皖省军事力量，即包括在南京四师之内，此外别无军队；而在政治上，又意见分歧，尔虞我诈，实实堪虞。江西军队号称两师，实则只有留守府拨给的林虎一团可以作战，其他皆蹈言过其实之病。广东僻处岭外，亦无训练有素的军队，而胡汉民与陈炯明同床异梦，更是致命之伤。至于湖南，已如前述，一兵一卒未练，仅恃赵恒惕一旅，倚为长城。由上所述，可见四督联盟，军力异常脆弱，内部团结亦有问题，只不过在政治上提出反袁的号召而已，而四督联盟之不足以抵抗袁氏的进攻，却早在意料中。加之，黎元洪倾向袁氏，论地利与政治影响，均对四督联盟十分不利。原来宋案发生后，黎元洪即力主和平，甘为反袁路障。不仅如此，他并利用组庵依违两可、反袁不坚决的弱点，先后派金永炎、程守箴来湘作说客，企图破坏反袁联盟。金、程以同学之谊、首先以我为游说对象，经我严词拒绝，晓以大义，黎的阴谋遂不得逞。组庵在湘，也因反袁派势力占了优势，只好跟着反袁的道路，而未

为黎氏游说所动；但只要局面不好，组庵还很有可能发生动摇的。

当时形势对反袁联盟不利的因素，还有一点应当提一下。那就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已被袁利用为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工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蔡锷才以同乡同学的关系打电报给我，对我们表示格外关怀，并劝告我勿走极端。经我复电辩明是非，力言湖南只有与国民党同进退、共始终，不能另作主张，事势如此，只有各行其是。

在袁世凯一方面，自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即着手准备武力统一全国、消灭国民党的计划，宋案只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及见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四督有不稳之势，于是不顾一切，投靠帝国主义，竟向五四银行团贷款 2000 多万镑，作为消灭异己的费用。袁以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率第二、第六两师及毅军屯驻豫、鄂边境；以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率第四、第五两师及张勋、雷震春、倪嗣冲各部，分由淖浦路与河南两路向宁、皖推进。军事布置既妥，才转而从政治上向国民党采取攻势，其步骤有四。第一步，非法杀害《民主报》主笔仇亮，并于 5 月 6 日下所谓“除暴安良令”。第二步，暗使北洋将领联劬通电，痛责国民党利用多数捣乱议会、反对大借款。第三步，恶毒毁谤黄克强，捏造去年委雨霖的“叛变”为黄所指使，张勋、张作霖均指控黄运动军队并争为大总统候选人。第四步，授意北洋各将领呈请“枕戈待命，讨伐有罪”。然后，第一军由豫入鄂，黎元洪敞开大门，任北洋军队通行无阻。6 月 9 日，袁下令免李烈钧赣督职，以黎元洪兼赣督。14 日袁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派陈炯明为粤

督。30日袁下令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派孙多森为皖督。四省都督，独对湘督谭延闿未加处理，仅下令缉拿湖南“叛乱”首犯程潜及附逆程子楷、陈强、唐蟒等人归案惩办，同时阴使向瑞琮、唐乾一、杨宏图等于7月7日火烧湖南军械局，湘省所储军付之一炬。

当李烈钧被袁免职的时候，我曾电李力主抗不交代，联合四省尚可一战。乃李因受内外压迫，竟于6月10日遵命免官，交卸赴沪。他至沪后，大受国民党急进派的谴责，而李又不敢明言江西实力有限，无力抗拒北军。他迫不得已，乃于7月12日返回湖口，起兵讨袁。袁亦于同日任李纯为九江镇守使，率第六师入赣，战事由是爆发。时林虎一团已扩编成旅，惟战斗力已大减。所以当李纯部队从东北向南昌进攻、敌海军进入鄱阳湖以后，李烈钧、林虎就被迫率部退到赣西。

当时南京各师见湖口起兵讨袁，亦跃跃欲动，尤以八师下级军官与士兵义愤填膺，鼓噪特甚。王孝缜、黄凯元两旅长见时机紧迫，乃于14日赴沪，向克强请求。克强即于15日偕同两旅长驰赴南京，被推为讨袁军总司令，宣布起义。而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反于此时逃往上海。战事开始时，第一师与第八师一部，在徐州附近与张勋部队交锋，迭见胜利。嗣以苏皖战线过长，乃于7月22日放弃徐州。克强命前线各军在临淮关构筑工事，令第八师刘建藩团增援前线，以柏文蔚为临淮关防守司令。柏文蔚因安庆内部不稳，不能赴临淮关执行任务，于是主帅无人，再加以江西战事失利的消息影响士气，于是军心涣散，各师相率自由撤退。29日，克强得悉江北岸军队溃乱情况，在前线既无可战之兵，

在后方又因苏督程德全等不与合作，致无可靠之饷，迫不得已，只好乘日本军舰而去。

柏文蔚在安庆，因内部受到袁世凯的策动，胡万泰、洪承点等从中捣乱，安庆一夕数惊。柏无力应付，终于8月6日一逃了局。倪嗣冲不折一兵，安然进入安庆。从此长江北岸国民党势力丧失殆尽，仅剩南京孤城一座，坐待北军攻陷。

湖南方面，我接任军事厅厅刚刚5天，宋案就发生了。我默察当时局势，认时终必出于一虞，所以我的唯一任务，便是抓紧时间，训练军队。计在四、五、六三个月间，成立了三个步兵团与一个炮兵营。进一步拟以巡防营改编三个团，合赵恒惕所部桂军一旅，共为两个师。假使战事能延缓三个月爆发，我在军事上就有相当把握。但时不我与，战事终于在我尚无准备之时就发生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袁世凯其时也无兵力进攻湖南，但他收买湖南败类向瑞琮、唐乾一等火焚荷花池湖南军械局，却使湖南军队断绝了军火来源。湖南当时有以上两方面的困难，但国民党人反袁的斗争并未因此稍衰。例如谭人凤、蒋翊武等由沪由汉连袂来湘，领导反袁运动。又对刘崧衡、邹代藩、周名南等，组织公民联合会，公开揭露袁世凯的罪恶，集会反袁，对湖南讨袁运动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只因估遭军械局的大变，必须等到粤、赣两省接济的军火运到，湖南才能发动，所以迟至7月25日才宣布讨袁。讨袁军成立，以程子楷为第一军司令，赵恒惕为副司令。湖南作战，主要是集中力量援赣；至于湖北方面，袁氏既利用黎元洪为盾牌，我亦可利用黎元洪为缓冲，以此只派一部分部队防守边境。这时，江西方面因湖口已被攻破，

赣军苦战兼旬，已到精疲力竭的地步。至敌海军驶入鄱阳湖以后，南昌告急。我因派唐蟒率军从萍乡进入新喻，掩护赣军主力集中。无如赣军节节败退，渐成瓦解之势。最后李烈钧、林虎仅率残部千余人，于8月8日退保赣西，幸得我军支援，并收容其逃散士兵，兵，林二人才得从容入湘，并由我军保障他们离湘赴日。赣军战败，已使谭延闿心神不定，至8月8日得到陈炯明弃职潜逃的消息，他更感不安。他此时又眼红面黑，大起恐慌了。于是跟我密商，他说：

“湖南在上月25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担保，可免生灵涂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

我深知组庵的意思，因说：

“我很谅解你的苦衷。黎元洪的代表金永炎来长沙时，我对金说过，湖南宁为玉碎，不愿瓦全。今日事势如此，玉碎不能，瓦全亦难。但黎元洪倒在袁氏怀中，他无实力，其本身已是‘皮之不存’，湖南以他为护符，真所谓‘毛将焉附’。你的办法，只不过暂时避免危险而已，将来演变，仍然未可乐观。我决意马上辞职，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个人身上，这样做，你对袁氏也有话说。”

组庵甚是高兴，但仍装出一副共患难的样子，说道：

“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你身上，所以罪恶皆归于我。”

谈至此，再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于是组庵于8月12日通电取消独立，待罪查办。我呢，一面设法保护同志离湘，

一面办理移交。当时如谭人凤、蒋翊武、程子楷、陈强、周震麟、唐蟒等，都是由我设法，使他们潜往上海转赴日本的；其中只有蒋翊武一人，不愿经过汉口，改走桂林转香港，竟为陆荣廷所害，迄今回忆往事，仍感痛恨。组庵宣布取消独立后数日，公民联合会刘崧衡等，因痛恨谭氏二三其德，遂组织一部分党员进攻都督府，遭到失败，刘亦为谭所杀害。我掩护同志离湘的任务完成以后，办好移交，也就于8月底离长赴沪，一路改作商人打扮，得以混过密探耳目，安全抵沪。在沪流离月余，十月底便到东京作亡命客了。后两月，谭延闿由黎元洪、熊希龄担保入京待罪，黎亦被迫离鄂入京，过其“瀛台生活”。

广东方面，胡汉民与陈炯明不能合作，前面已经提到。再加上内部情形复杂，派系门户之见很深，更难以团结一致，全力讨袁。如新军有陆军、海军，旧军有防营、绿营，各自为政，不相统摄，东江潮油，南路琼崖，可称军队如林，土匪亦如林。上年姚雨平率一军开赴南京，实际上只有一混成旅，调回广东后也未加整理训练，使之成为可以统摄各种杂牌军队的中心力量。所以坐令地方杂牌军队为袁世凯所收买，到7月18日陈炯明为势所迫宣布独立之时，汕头莫擎宇、南路陈德春、惠州钟鼎基等部，从暗中反对，根本也就动摇了。到8月6日，陈炯明见大势已去，只好一逃了局。

癸丑讨袁之役，就我所知，已知上述；至上于海战事、福建孙道仁、许崇智和重庆熊克武的宣布独立，因我未亲历其境，不敢深谈。